纽带

东学西鉴四百年

纪录片《纽带》团队 著





一场跨越东西的文明对话
一段推进人类发展进程的文化传奇

汇聚全球180余位专家学者
全面梳理四百年海外汉学史

严绍璗
张西平
杨煦生
李明滨
共同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

作者:纪录片《纽带》团队

ISBN:978750865821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一
在《纽带》开播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在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中的主旋律之一，是一个须臾不能或缺的宏大篇章。《纽带》从西欧、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四大区域的文明史发展中，采用以特定时空中的相应事件和人物与中华文明复杂的认知关系，突破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世界文明史发展的“一元论观念”，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参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层面价值意义”。本片以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外传矫正了所谓“世界纯粹是由欧洲启蒙运动推进到近代社会”以及“日本文明是由海洋为主体构成”等许多失实的“文明史观”，使今天的中国观众知晓了自己的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感到鼓舞。本片更有价值的是，它为我们当今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考。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即国际“汉学”或“中国学”）原本是一门理性思维很强的学科，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和表述，至少会涉及两种国别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三层关系，至今国内外大学在本科阶段都没有能力设立相应的学科专业，只能在硕士或博士层面中展开。本片的编辑与播出，以生动的“形象故事”，提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模式形态”和“价值内涵”，以及实现“走出去”必须构建的“中间通道”以及在“中间通道”中必然发生的以对象国“本体哲学”和特定时空中的“内在需要”对中国文化做出“特定的解读”（马克思把这样的解读称为“不正确的理解”），从而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对象国提升和推进自身文化需要的“文化材料”，构成在随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元素”。大型文化纪录片《纽带》以生动的故事和科学的表述展现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

本片提供的生动的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互动”的“文化学学理”，以我从事“国际中国文化”这一学术50余年的体验，以及它对于我们实现伟大梦想中的“文化战略”提供的历史性的思考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严绍璗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序二
开拓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新领域
不断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

《纽带》首次系统介绍了海外汉学的发展历史，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要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唯有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那么，为何这样看待海外汉学（中国学）呢？

第一，海外汉学（中国学）是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了解中国的窗口。由于语言的问题，中国绝大多数学术成果不被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所知，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但此时他们所借助的基本材料、基本文献仍是海外汉学家们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掌握在这些汉学家手中。这个道理不复杂，正像中国学术界和民众对美国的了解、对俄国的了解、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依靠的就是从事美国研究、俄国研究、中东研究的学者一样。因此，了解国外的中国学，团结知华、爱华的汉学家，不仅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大的文化战略和重要的学术文化政策。要想改变世界各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就要找到为我们说话、理解中国、同情中国的人，这些人首先当属海外的汉学家。所以，了解和熟悉海外中国学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第二，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或许有些人会说，这些老外，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中国学者的学问好，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看总不如自己认识得清楚。这话有一定的道

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根本上是靠我们自己，但是也要知道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所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正如《纽带》在片中所记载的那样。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尤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科举废除，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被打断了，而在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是很重要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学或者汉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崛起后，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也要了解域外汉学（中国学），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当然，海外的汉学家水平也都不尽相同，好的有，差的也不少，对其既不要鄙视，也不要仰视，我们要知道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中国学。

如何展开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呢？《纽带》这部片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当代的中国学家也是在他们老师的带领下进入这个领域的，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学展开了

初步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出版的《国际汉学》已经连续出版了20年，学界也出版了国别汉学史系列丛书，建议大家注意关注一下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但对很多具体学科来讲，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外对中国的现当代研究十分活跃，国外对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等的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都需要国内的学者关注，摸清其基本情况。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学的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学术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学要特别注意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在中国历史、人文研究中是要特别注意的。从社会科学的学科来说，西方许多对中国的研究都是在智库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的，一方面，他们有一些实证性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会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一些成果。这样的方法论是要有的。《纽带》中也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介绍日本中国学研究一集，严绍璗先生讲得很好。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都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学术论争也可能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中国学研究者打交道中，

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趋势肯定是有问题的，尤其在中国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此，既要结交国外的中国学家，又要和他们展开学术对话、学术交流。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对话的中国学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双重任务。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学术重建的过程。

从《纽带》这部片子我们看到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海外中国学界的对话与合作，才能逐步拥有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发言权；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表达我们中国学术的理想、中国学术的立场、中国学术的传统与文化，才能在中国重新肩负起文化大国的使命。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了解汉学，尊重他们的学术成果，积极与汉学家展开对话，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纽带》用生动的画面、形象的语言，第一次从电视的角度向民众介绍了海外汉学，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当下重商主义成为社会主导，“娱乐至上”弥漫电视节目的时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纽带》，说明了中央电视台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视野。在中国成为大国的今天，在我们走出西方中心主义、重建中国当代学术体系和理论的伟大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学术纪录片。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国际汉学》主编

序三
汉学与全球化时代的共在

大型纪录片《纽带》的播出，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事件、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我意识的成熟历程相关的文化事件。“汉学”这一以研究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性（Chineseness）为使命的生僻的海外学术方向——当代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自觉关注，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这种关注还是学术圈里极其小众的事情——借此不期而然地进入了公共视野。

一部宽泛意义上的汉学史，曲折地折射着中国文明与世界的文化关系和对话关系。大而化之，这种对话关系呈现为看似平常、实际上却各个奇特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发生于汉字文化圈的模式：汉字文化圈中的东亚、东南亚的近邻们，早自东汉时期起，就追慕、学习，也创造性地化用着这个以天下自居的文明——从语文的假借、经典的传播、制度的模仿到审美意趣的趋同等。这种在很长历史阶段都甚为全方位的追慕，其实是一场由追慕者们发起的、对中国文明的长期对话。而作为“文化宗主”的中国文明，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对这种对话其实是很少严肃、平等地投以一瞥的。第二种是发生于中西之间的对话模式：发端于来华耶稣会士文化努力的西方汉学，究其实质，是一场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迄今已逾4个世纪的有关中国文明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中国人又常常或则缺席，或则成为被对话者，尤其自19世纪以降为甚。

总而言之，这两种对话模式，恐怕都还不是完整意义的对话。当对话双方还缺乏同等的自觉程度和关注程度，还不具备一颗禅家所说的“平常心”的时候，真正的对话其实并没有达成。可是，无论这种对话

的成功程度如何，二者分别都构成了东亚精神史和世界近代精神史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维度。

《纽带》的意义恰也在此：它以公共传媒的直观形式，传达了发生于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的一些精神征兆——这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这个征兆昭示着，一个比较正常的对话时代可能正在走来。大而化之地说，成功的跨文化对话有赖于平等的、互主体的对话者的出现，因而有赖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文化上主体意识的充分醒觉。文化自觉是因文化自信而得以奠基的，而文化自信又是奠基于文化自性（Cultural Identity，通译为“文化认同”，此译法问题颇多）之上的。你是、我是、大家都是的问题，与你在、我在、大家如何共在的问题从来都息息相关。这是一个不仅涉及社会文化心理更直接关涉人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共在的大问题。在此权且蜻蜓点水，无法充分展开。

学术形态的汉学自身，是一种“他者”的学术，冒充“汉学家”的中国人只能令人哑然失笑。而在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这种“他者”的学术的研究，大略都可从属于学术史这个大领域。在各种学术门类日益条分缕析的学界，汉学研究的系统化、专门化的浪潮，还只是刚刚兴起。

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性的角度，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共在的角度，今天正走进公共视野的汉学问题，对我们的启迪，毋宁在另外一个更为深远的层面——中国思想的普世性问题：经过一代代带着自身问题意识的汉学家们传译和研究的中国思想要素，如何经由汉学家母体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家们的深度诠释（甚至过度阐释），进而转化为人类性的，或人类为之焦灼的问题？

耶稣会士汉学家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关系最为人熟知，正是经由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年）所构造的中国精神图景，进而经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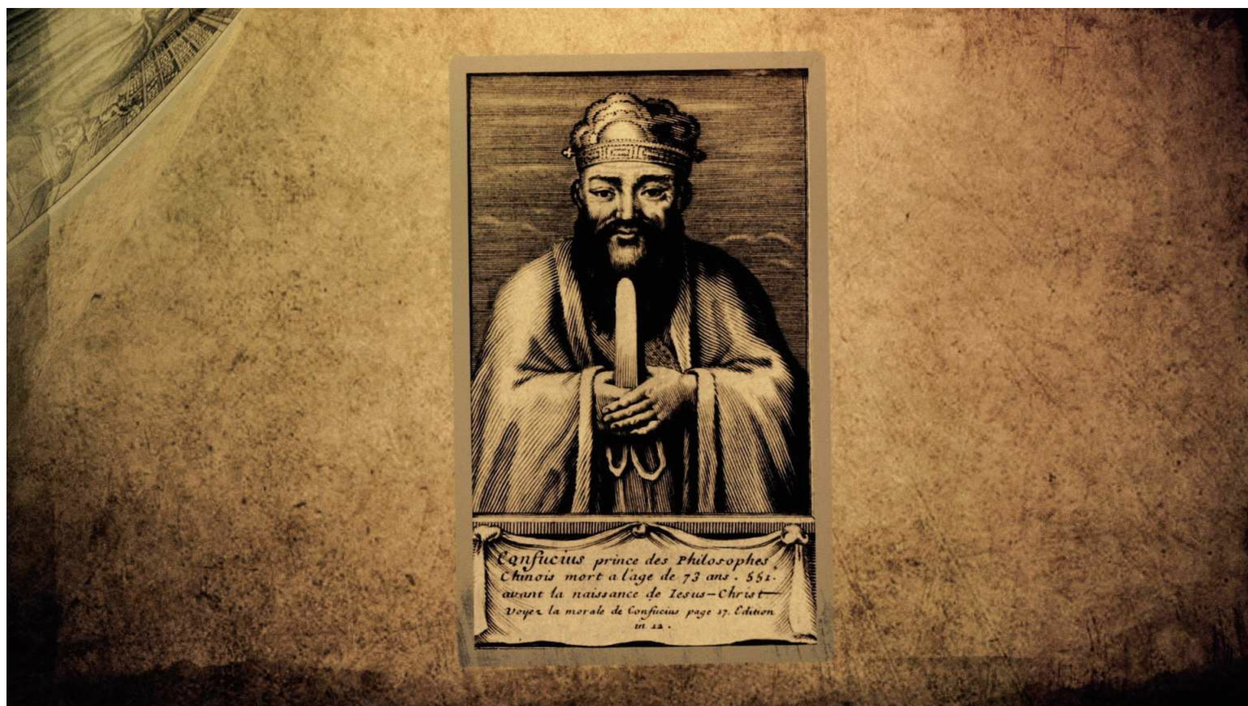
农学派诸君，德、法启蒙运动中自然理性、自然宗教、世界主义等革命性观念方才成为可能，世界近代精神史的这一页才如此波澜壮阔。正是经由高延（J. J. M. de GROOT，1854—1921）所营构的中国宗教体系和“普适主义”（Universismus）的观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关于世界宗教的理想类型方得以完整。而今天，当代神学思想家孔汉思（Hans Küng，或译汉斯·昆，1928—）所提出并全力诠释的“世界伦理构想”（Projekt Weltethos）也一定程度上得之于他数十年来对中国思想的高度尊崇和迷恋……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特别省思和沉吟。正是这些汉学家和思想家的“共业”，使汉学不仅仅关乎一个人类“共是”的知识论问题，而更成为一个与人类“共在”和共同命运攸关的、常新的、鲜活的存在论问题。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经从比较极端的诠释学角度断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可以进而言之，所有对异文化，以及异文化中的自我映象的超常关注，都是一种文化自我关注的特定方式，都是自我意识成熟过程的一种必要的纠结。而只有充分成熟的自我关注者，才能成为一个人类共在的共同建构者。这已经是我们今天讨论汉学问题时的应有之义。

杨煦生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

第一章
诞生，当西方遇见东方



▲儒学西传的奠基之作——殷铎泽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扉页

汉学或中国学，是世界各国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问。

几百年来，它像一根飘逸的纽带，若即若离，把中国和世界衔接在一起，使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向世界，成为滋养全人类的智慧。用心观察，在西方文化所有发生转折和突破的节点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哥伦布不会发现新大陆。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不会在瞬间席卷西方世界。如果没有火药，中世纪的堡垒不知何时才能被摧毁。如果没有指南针，人类甚至很难验证，地球是个椭圆形。

如果换一个视角看，正是在发现东方、走近中国的过程中，欧洲人，才一步步发现了西方，发展了西方，进而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那么，这一页，是如何掀开的呢？

沙勿略的上川岛之盼



▲方济各・沙勿略

上川岛，广东人的度假胜地，纬度与美国夏威夷大致相同。

当地人自认，这里的风景不输海南岛半分。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一处圣地。公元1552年，在葡萄牙人登占澳门之前，荒无人烟的上川岛，成为欧洲人在中国唯一可以短暂停靠的贸易点。

12月，海岛迎来了冷冽的北方季风，46岁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向隔海相望的大明疆土喊道：“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但“岩石”尚未裂开，他已病逝在这片荒凉的岛屿上。

澳门利氏学社社长 万德化

我们知道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的创始人。耶稣会士并没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在用其他语言表达自己观点方面的能力不强，所以学习的过程很艰难，但他们的个性、好奇心、对他人的态度，帮助他们打开了很多扇门。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刘元龙

方济各・沙勿略当时到日本传教，应该说他是当时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感觉到日本的整个文化，包括他们的宗教，受中国传统的影响非常大。佛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包括儒家文化，在他们整个观念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持一种排斥态度。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周振鹤

很多人就表示疑问：中国人是不是信了天主教？沙勿略说中国人还没有，人家就说，你要先说服中国人信天主教，我们也可以信，为什么你们的教那么好，而中国人不信？

面对这样的质问，沙勿略无言以对。这使他意识到：基督教要进入东方，必须先进入中国。但当时的大明帝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其他一切外国人，都禁止进入中国。

沙勿略想尽办法，也只能魂断南海，至死未能踏入中国大陆半步。

“岩石”，何时才会裂开呢？

罗明坚：会编字典的仙花寺主人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标志。每个站在这里的人在惊艳之余，都会浮想联翩，想象着它在被火灾烧毁前的气派与辉煌。

1579年7月，当罗明坚来到这里时，圣保禄教堂还没有最后竣工，鸦片也还没有成为商品。不过，大三巴旁的码头上，已然呈现出忙碌的景象。

欧洲人对东方产品的渴望，给葡萄牙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26年前，在明朝皇帝的允许下，他们以晒货为名，开始在这荒凉的半岛上定居。



▲澳门大三巴牌坊

对西方人来说，即使在今天，方块字也犹如天书一般。

刚到澳门的罗明坚，既听不懂中国话，也找不到一个懂得葡萄牙语的中国人。在写给耶稣总会的信中，他说:“因此，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语言，如画一匹马，就告诉我这个动物的中国话叫‘马’。”

此举在无意中，成了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

澳门利氏学社社长 万德化

罗明坚非常认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汉语，对中国的伦理道德也非常好奇，并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中国人。

意大利罗马传信修道院博士 马诺

所以他一入境，广东的高官，一发现有一个能说好中文的外国人，就跟他交朋友了。

罗明坚被破例允许在广州的岸上过夜，因为明朝的海关官员认为“他是一个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而在此之前，所有从澳门到广州进行贸易的葡国商人及传教士，仅被允许在所属船只上交流和居住。

1582年8月，罗明坚出版了《天主圣教实录》，这是欧洲人用汉语写就的第一部布道书。就在此刻，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汉语学习者——利玛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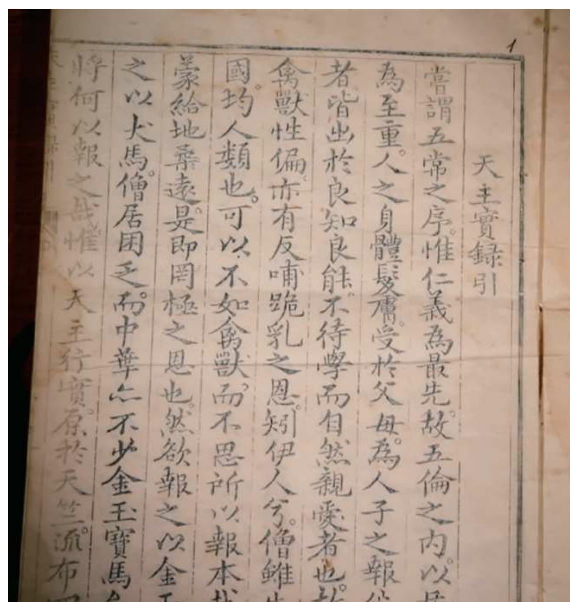
北上中国的道路，变得不再孤单。

1583年冬，广东肇庆，中国内

地的第一所天主教堂出现在这里。此时距离沙勿略去世，已有31年。

这所房子，最初是按欧洲风格设计的二层小楼，为避免当地人生疑，后改为中式。肇庆知府王泮亲自题写了两块牌匾：一块悬挂在院门的门楣上，题为“仙花寺”；另一块是“西来净士”，悬挂在客厅上方。

每天早晨，梳洗罢，罗明坚和利玛


天主實錄引
嘗謂五常之序惟仁義為最先故五倫之內以
為至重人之身體髮膚受於父母為人子之報
者皆出於良知良能不待學而自然親愛者也
禽獸性偏亦有反哺跪乳之恩矧伊人兮僧雖
國均人類也可以不如禽獸而不思所以報本
蒙給地棄遠是即罔極之恩也然欲報之以金
之以犬馬僧居困乏而中華亦不少金玉寶馬
將何以報之哉惟以天主行實原於天竺流布

▲天主圣教实录：欧洲人用汉语写就的第一部布道书

窦都要一丝不苟地穿好袈裟，逢人便双手合十，自称是来自西方的僧人，希望以此拉近与中国百姓的距离。

两个洋和尚，成了肇庆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自鸣钟、三棱镜，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器物，在当时，却成了献给中国官员最高端的礼物。而当利玛窦向众人展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时，文人士大夫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竟然不是世界的中心！

法国国际科研中心研究员 詹嘉玲

有人建议他把这幅地图翻译成中文。于是，他不仅翻译了大多数的国家名称，并重新绘制，让中国处在地图的中心。

与此同时，为帮助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这里还编写了一部辞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语与西方语言对照的辞典。

1934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这份手

稿，并为其命名《葡华辞典》。“虽然手稿没有封面也没有署名，但根据对纸张笔迹和以南京话为基础的明代官话翻译来考证，可以推测为罗、利二人合编。”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开建

因为利玛窦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开始学习中国古典经典。学的时候他说学得很困难，很多书都读不懂，这时候找中文的老师找不到，中文老师有的教一下就不想教了，有的教几个月就走了，所以很难找到老师。我想这些传教士的老师肯定是罗明坚，而不是别的人。

当传教士们依靠字典咿呀学句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他们就此拉开了西方汉学新的一幕——传教士汉学。

中国，也从这一刻起，慢慢进入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去年小弟别离兄

兄在广城弟去京

今日弟回思别久

请兄舟内话离情

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着430年前由罗明坚创作的34首中文诗，这是西方人用汉字写下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但在日记中，罗明坚常自谦是个“笨拙的人”，相比正值青年的利玛窦，他的中文学得不够好。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钟鸣旦展示罗明坚中文创作

1588年底，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做出决定，派45岁的罗明坚返回欧洲，请求罗马教皇派使者访华并赠送大明王朝礼物，以拓展中国的事业。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开建

罗明坚把这个局面打开以后，他有个更大的想法，就是真正打开中国的局面。当时肇庆知府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其他的外国人不能进来，只有两个规定的名额，就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多一个都不行。

在归国前，罗明坚特意以教皇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大明皇帝的书信，并请人刻在了木板上。他希望能得到教皇的认可，然后再带着印刷的书信返回中国，想办法与中国皇帝建立联系。

但遗憾的是，这封书信永远地留在了木板上。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由于多种原因，几任教皇不断地病故，教皇最终也没有接见他。只留下这个枣木板子，他最后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回了老家。

朝读四书暮诗编，

优游那觉岁时迁。

时人不识予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罗明坚小诗

返回中国，变得遥遥无期。这个“笨拙的人”只能在书籍中触摸中国的温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宗旨，在于弘扬崇高的品德，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在于永无止境地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

等待的过程中，罗明坚将四书五经中《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这是东方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此时的欧洲等级森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罗明坚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1607年5月11日，满怀遗憾的罗明坚在故乡病逝。他将最后一次祷告，献给了遥远的东方，以及他孤独的伙伴——利玛窦。

利玛窦：用科学叩响中国大门的使者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在高楼大厦的挤压下，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南堂的气派和庄严。四百年前，这幢建筑在北京南城显得鹤立鸡群。这里是利玛窦的家。

就在罗明坚去世的这一年，1607年，利玛窦与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中文译本。我们今天使用的“点、线、面、角”等专业术语，都是受益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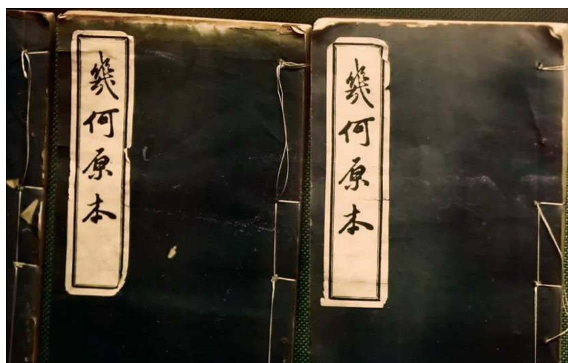
▲位于北京南堂的利玛窦像

不过，当时已被中国文人所熟悉的利玛窦，在西方，还默默无闻。不是因为一本书和一个人，欧洲人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利玛窦。

这本书，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这个人，也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名叫金尼阁。

意大利汉学学会教授 史华罗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

在利玛窦之前，很多西方的旅行家来到中国并把中国的信息带回欧洲，但利玛窦最先清晰阐述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所以，如果说汉学有着四百年的历史，我想我们应该感谢他。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朗宓榭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用意大利语写的，金尼阁将它翻译成了拉丁语。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批评之处，利玛窦所写的很多批判中国的地方，比如朝廷腐败等，在拉丁语翻译版中都被删掉了。


▲金尼阁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1610年冬，在利玛窦去世半年后，金尼阁来到北京。无意中，他发现了前辈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这本回忆录，如获至宝。

此后，他一直将之随身携带，并抽空整理、完善。

1615年，金尼阁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出版。同时，为引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金尼阁每天身着中式服装周游列国，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在华传教士的功绩。



▲金尼阁素描像，鲁本斯绘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麦克雷

金尼阁在比利时碰到了一个艺术家，就是鲁本斯。鲁本斯说你可不可以穿一件中国衣服，我来画一幅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所以这变成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欧洲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画中是一个欧洲人，却穿了中国那个时候的儒家学者的衣服。

一个从九万里之外归来的传教士，身着奇异的服装，从一个富裕而繁荣的国度载誉归来。这一切，震惊了1617年的西方。而更让大家感到好奇的是，一个欧洲的传教士，单枪匹马，竟然在那个遥远神秘的国度闯出了一片天地！

利玛窦28年的中国生活经历，就此，在欧洲人面前，徐徐展开。

1592年7月，广东韶州，好奇的乡民拥挤在公堂之外，看洋人和当地人打官司。罗明坚返回欧洲后，利玛窦从肇庆搬到了韶州。

这已不是利玛窦第一次遭受袭击了，在这里，“洋和尚”是新闻也是挑衅。从1589年起，韶州又遭遇罕见的旱灾，于是，“洋扫把星”的传言满天飞。

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副会长 余三乐

当地的（百姓），多次袭击他们，偷他们的东西，或者拿石头砸他们什么的。有一次，为了躲避袭击，利玛窦还扭伤了脚。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刘元龙

当时肇庆的知府叫王泮，就是负责处理肇事的官员，但是利玛窦却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替这些肇事者去向王泮求情。

事后，本地所有的重要人物纷纷前来拜访利玛窦。

南雄的知府大人还专程送来了上好的疗伤草药，但利玛窦的脚伤并没有痊愈。以后，只要是走远路，他就得一瘸一拐。这似乎成了传教士在这个儒家统治的国度艰难前行的预兆。

十年，没有发展一个信徒，问题究竟在哪里？

一个叫瞿太素的中国朋友告诉利玛窦，如果长期以“洋和尚”的面目示人，只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的误会，甚至反感。

利玛窦茅塞顿开。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 詹嘉玲

一开始，利玛窦想要打扮成和尚的样子，因为神父立志清贫一生。但是，逐渐地，他意识到，要想被文人和官员们所接受，最好还是锦衣华带，以文人自居。

改变，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效果。

正如利玛窦在日记中所写的：“这并不是出于尊重，主要是为了改变地位，让人知道我们是神学家，是文人墨客。如此一来，儒士们也允许我们到那些体面的地方去了。”

1595年，带着崭新的形象，利玛窦又上路了。一只脚拖着希望，另一只脚拖着失望。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大明帝国的首都——北京。

1601年春，一个晴朗的早上，紫禁城平静如常。

一个儒生打扮的人正急匆匆地赶往钦天监，他的金发碧眼，引起了太监和侍卫们的格外注意。这个外国儒生，正是奉命进宫替万历皇帝修理自鸣钟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为了这一天，利玛窦已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

意大利罗马大学副校长 马西尼

一方面是准备了一些机器，比如说自鸣钟，因为就可以看到，这是个可以计时间的机器，而且是自动的，所以肯定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另一方面就是，准备了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

汉学家 施舟人

我把科学给你，你就得把你的灵魂给我。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全部，来得到中国的信仰。

科学知识没有打动皇帝，因为此时的万历皇帝，早已放弃了励精图治，而且隐居深宫，沉迷于享乐。不过，正因如此，他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将利玛窦留在京城。理由是：必须每年进宫四次，以维护自鸣钟的正常运转。

利玛窦不仅获得了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朝廷发的俸禄。他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堂。

皇权的认可，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利玛窦的朋友。“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来访的客人，许多地位显赫的人都来拜访我。”而最令利玛窦高兴并获益良多的是与故友徐光启的重逢。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这位学术畅销书作家这样写道：“即使我们不能确定，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最先在1600年将上海学者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固了。”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史景迁

徐光启中过进士，同时他也是明朝政府官员，后来还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中国经济、农业和数学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徐光启是

一名杰出的学者。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钟鸣旦

当这两人相遇时，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原本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他们把这称为“心理位移”。他们不得不考虑两人的文化存在着什么区别，以及该如何把自己的原则和想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徐光启认为：需要摸清对方文化的底细，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双方的新文化。

在日记中，利玛窦充满感情地记录：“徐公用清晰优美的汉字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实在是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挑战之人。”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史景迁

我想，在16世纪以前，大多数中国人都从未听说过欧洲，从未听说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官僚主义社会。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1603年，利玛窦开始着手修订罗明坚所著的《天主圣教实录》。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在书中，他正式提出，中国的“上帝”和基督教的“天主”是同一个概念。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蓝莉

利玛窦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说服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渴望能拉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距离。证明两者之间没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反而是相辅相成的。

但频繁的应酬，加上超负荷的工作，终使利玛窦积劳成疾。

1610年5月，58岁的利玛窦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身边人说：“我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

临终前，利玛窦曾试图在中国为自己买一块墓地，决定接受中国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并成为中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是利玛窦努力要做到的事情。他的愿望是成为“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然而，墓地因故没能买成。

一切，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家龙

史景迁教授早年曾写过西方对中国认知的书：《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这本书书名很好——西方人去中国以改变中国，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显示，那些西方人最后是被中国改变。

美国乔治敦大学东亚系主任 魏若望

但利玛窦为什么要为自己在中国买墓地呢？他很清楚，哪怕有一丝机会去理解中国人，他都会去做，而有一块墓地，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他想要买墓地的原因。他的坟墓，日后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的一座桥梁。

一年后，利玛窦按照中国的规矩，被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明朝万历皇帝亲自许可的。

正如利玛窦所期望的，他的墓碑，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和路标，

指引着后继者们前行的方向。

金尼阁的遗憾，更是中国的遗憾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登上了探索中国的大船。

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动力与灵感，大多来自于马可·波罗那一代人的“契丹传奇”；而欧洲人驶出大西洋，靠的是来自中国的指南针。但熬过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究竟什么样，当时的欧洲人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利玛窦用自己的一生，向欧洲人澄清了一个几百年的争论：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就是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统一、富强、公正的国家，代表着一种优越的典范性的文明。这对于正饱受分裂之苦和宗教战争折磨的欧洲人，无疑充满了诱惑力。

1620年7月，金尼阁一行抵达澳门。由于船舱内瘟疫传染、海上风暴以及海盗的侵袭，22位传教士仅有5人幸存。

与他们一同到达中国的，还有7000多册在欧洲募集的科学书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

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不知道，或者我们掌握得很不足。机械、数学这种东西，传过来很多。这是我们所缺少的。传教士之所以能够留在宫中，要他们做什么？就是看上他们的手艺了，他们的手艺实际上就是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或者说是物理学、医学、机械学。

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新知识、新思想的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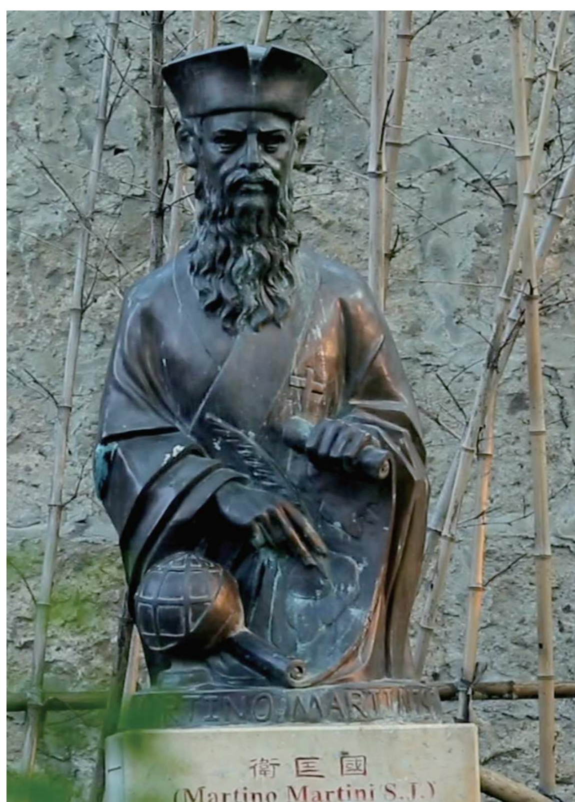
1938年，北京天主教堂在整理藏书楼时，意外发现了金尼阁带来的

7000多部书籍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竟然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科学典籍。

但遗憾的是，在这些书籍的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积累了300多年的、历史的尘埃……

这是金尼阁的遗憾，更是中国的遗憾！

卫匡国：17世纪撰写中国史的最佳撰稿人



▲卫匡国

当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慢慢传播的时候，中国文化，也经过这条纽带，随着一封封书信和一艘艘帆船越过大洋，传入了西方。

直到今天，欧洲的图书馆、档案馆仍然小心翼翼地保留着西方最早的汉籍译本，以及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手稿。

“鞑靼人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南京，本来他们可以轻易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剃发令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而抗争。”

这段亲历见闻的描写，出自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笔下，他曾被当代学者评价为“17世纪撰写中国史最成功的人”。

意大利罗马大学副校长 马西尼

卫匡国比利玛窦到中国晚几十年，他把一些中国的内容，主要是地理、历史、语言，介绍给西方。

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博士 陆商隐

卫匡国第一次到中国是1643年，那个时候（正值）明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他的名字“卫匡国”，很可能是“匡扶保卫大明国”的意思。

1646年6月，清军南袭，进入江浙。曾号称“匡扶大明国”的卫匡国神父，悄悄地收藏起了南明隆武帝赏赐的高官蟒服。默默在住所门外贴上一张大红纸，上面写道：“泰西天学修士寓”。

果然，这7个大字，保了他的平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卫匡国在杭州的经历比较神奇，他之所以能得到清军的礼遇，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泰然处之，而且摆上中国的书，喝着茶。这样表现了一个传教士在面临重大事件时，那种泰然的态度，使清军感到很震惊。第二个原因，应该也是更为重要的，清军多尔衮入关以后，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坚守阵地，归顺了刚入北京的清军。

短短几个月之内，卫匡国就从反清复明的阵线，转而站到了清政府一边。他甚至还穿上清军士兵的衣服，把头发梳向脑后，因为这样看上去更像新政权的支持者。转变的理由也很简单：清政权越稳固，就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而面对江南地区的遍地烽火，虽然一己平安的卫匡国，也在为淳朴的中国百姓的命运而担忧。

“汉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装束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习俗。”

与中国政局同样走向混乱的，还有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

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继任领导者认为，利玛窦的做法是在迎合儒家，他们不仅反对用汉语里的“天主”表示西方的“上帝”，而且禁止中国信徒祭祀孔子和祖宗，认为这些都是迷信。

另外，道明会、方济各会等其他教派也纷纷进入中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传教权，他们开始向罗马教廷投诉耶稣会的所作所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当道明会士在福建的乡间小道，在沿海看到中国对民间信仰如此崇拜的时候，他觉得利玛窦简直是胡说八道，认为利玛窦解释的不是中国，而是充满了宗教崇拜。

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 成中英

所以教皇就下了命令：不准祖先敬拜，甚至不准举行任何一种儒家世俗的礼仪。这就造成一种后果，你要信基督教就不能做这些事情。

消息传到中国，愤怒的百姓拥进教堂，捣毁了教堂设施，并赶走了传教士。危急之下，1650年，耶稣会决定派能言善辩，并深谙中国文史的卫匡国神父赴罗马申辩。

又一个中国衣冠的洋人出现在欧洲。像金尼阁一样，卫匡国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巡讲，他将自己对中国地理和文化的认识，灌输给了欧洲人。

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博士 陆商隐

卫匡国1654年在欧洲出版了《鞑靼战纪》，这是一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儒生、传教士、官员等提供的大量清军入关和下江南战事的实况而撰述的一部明清战争史。从1654年一直到1706年，一共用9种不同的语言，在欧洲出版了211个版本，让欧洲人准确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

中国。

1656年3月，宗教裁判所同意了耶稣会士们提交的呈文，教皇颁布法令规定："如祀孔和祭祖的礼仪，真像卫匡国所说的，属于社会礼仪，教皇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

卫匡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不过，对于欧洲汉学来讲，卫匡国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如果用酒来比喻卫匡国的汉学著作，那么，畅销的《鞑靼战纪》只能算是淡淡的开胃酒，重头戏和真正的烈酒则是《中国上古史》。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钟鸣旦

卫匡国写的书对像他这样的传教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来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他们有什么发现呢？他们发现中国历史实际上比欧洲历史更悠久，或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悠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吴莉苇

那么，假如这种观点被反对基督教的人拿到之后，他就可以把它作为证据，来证明说《圣经》讲得不对，《圣经》不能够解说全部的人类历史，因为我们至少看到中国人的历史，比《圣经》所讲的人类历史要长久，所以这就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去动摇天主教会的《圣经》解说体系。

一个令西方人胆战心惊的信号，从《中国上古史》中隐隐透露出来。《圣经》记录的历史，并不是完整的历史。"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树上摘果子的时候，东方人早已创造了成熟的文明。"很快，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会用东方的智慧，重塑西方的现代世界观念与自我意识。

1657年4月4日，罗卡角，与那群大航海的勇士们一样，卫匡国和16

位耶稣会士一起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



MARTINI MARTINII,
TRIDENTINI,
E SOCIETATE IESV,
SINICÆ
HISTORIÆ
DECAS PRIMA,
Res à gentis origine ad Chriſtum natum
in extrema Aſia, ſ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ſtas complexa.

AMSTELÆDAMI,
Apud JOANNEM BLAEV.
M. DC. LIX.

▲令天主教会不安的《中国上古史》

前路崎岖，九死一生，但卫匡国早已是归心似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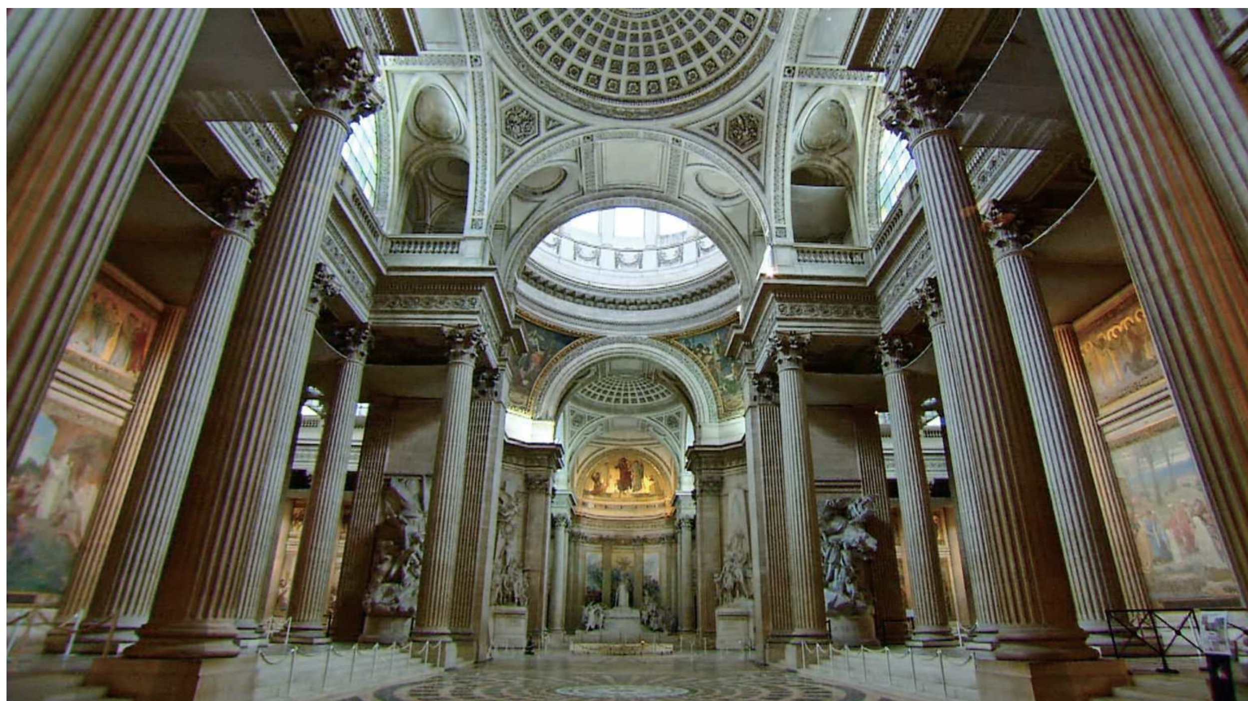
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卫匡国，“对他来说，本国就像是一块流放地，如果不能再去中国，那他很快就会死的。”随着卫匡国的远离，欧洲的汉学中心也从意大利向法国转移，教廷已经不能再容纳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了。

帆船驶离了码头，与卫匡国同行的，还有即将成为清朝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南怀仁，以及后来将儒家经典详细介绍到欧洲的传教士殷铎泽。他们都是被卫匡国的传奇经历和口若悬河的演说才能深深吸引，并改变了人生方向。

风越来越大，陆地也越来越小，但他们已经把一颗巨型的炸弹、一颗思想的原子弹，留在了欧洲。

爆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二章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法国先贤祠

这是一个几乎被世界彻底遗忘的事实。

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急于冲破天主教会及封建专制的束缚，却无从下手。而天主教内部，各个教会之间因礼仪之争而钩心斗角。

无心插柳柳成荫。基督没有征服中国，而这些传回欧洲的中国消息，不仅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的中国，更制造了一颗思想的炸弹。启蒙思想家们欣喜地发现，正好可以利用它向专制的教权，发起致命的一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汉学，就是一柄权杖，谁掌握了中国

研究的制高点，谁就能看到教会黑暗专制之上的那一丝光明。

南怀仁：来自西洋的二品大员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冬，紫禁城内，巨大的轰鸣声打破了这里惯有的宁静。18岁的皇帝和身边的几位大臣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目光，被一个神奇的玩具“马车”牢牢地吸引。



▲“汽车始祖”：南怀仁与康熙完成的蒸汽动力实验

这辆“马车”，长60厘米，虽然有4个轮子，却根本不需要马，它的动力来自蒸汽。这是世界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用蒸汽做动力的实

验，它比瓦特制成复式蒸汽机早115年，比斯蒂芬孙的火车早150年，比卡尔·本茨的汽车早214年……

这辆“汽车始祖”的制造者，是时任清朝工部侍郎兼钦天监监正的正二品大员——南怀仁。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钟鸣旦

南怀仁是一位比利时传教士，他比利玛窦要晚很多年。他的知识体系是古典天主教耶稣会的，包括了哲学、神学以及科学，因此他在皇宫任职。他非常关注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康熙皇帝的数学就是他教的，但同时他们也会一起讨论宗教问题。

不过，与耶稣会的前辈利玛窦一样，南怀仁努力钻研的动力，也不只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的虔诚。

“欧洲天文学给康熙皇帝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西洋机械师给他带来的快乐，一定会使他的目光转向科学背后的信仰。”南怀仁曾这样讲过。

从此话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先影响皇帝，进而改变一个国家的信仰。科技，只不过是手段。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汉学系主任 金丝燕

欧洲的传教士到中国目的是单一的，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中国以后，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融入问题，不像去非洲传教，去拉美传教。这个融入问题，就是你如何融入中国的文化。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刘元龙

后来耶稣会有一位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叫范礼安。他曾经给这个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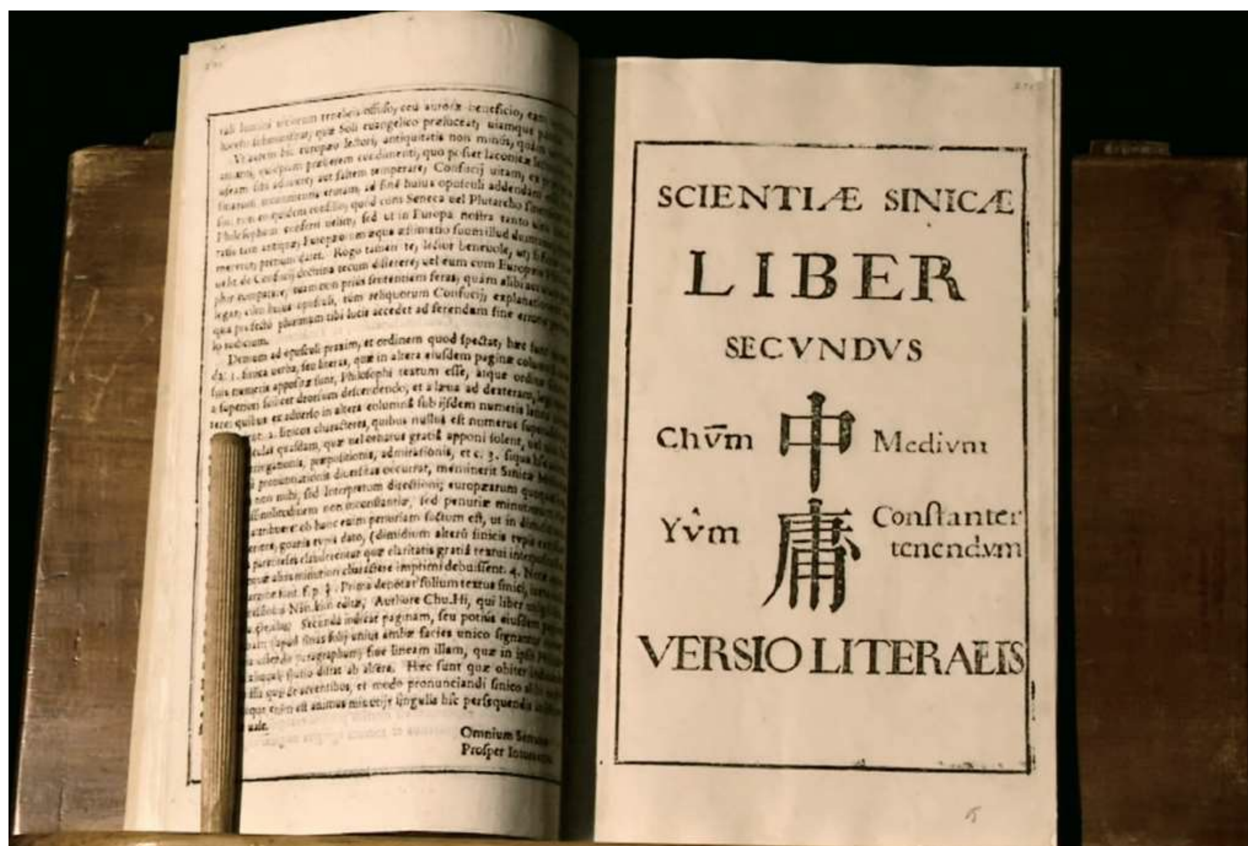
稣会会长写信说，如果进入中国，必须改变在其他地方的传教方法；与其让中国人葡萄牙化，不如让传教士中国化。因此他说，你们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不但要会读、写、说中国话，还要遵从中国的风俗习惯。



▲南怀仁

孔夫子的“乌托邦”

2010年8月，上海世博园，意大利馆内每天人头攒动。诸多的珍贵展品中，一册写满拉丁文与中文的泛黄手稿格外引人注目。



▲《中庸》的首份拉丁文译本

这是《中庸》的首份拉丁文译本，1672年出版于法国巴黎，当时的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这本书的译者，是与南怀仁乘坐同一条船抵达中国的耶稣会士殷铎泽。不过，殷铎泽没能够进入京城，而是长期在杭州传教。这部《中庸》译本，只是他翻译中国经典的开始。

1687年，一部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著作，在巴黎问世。

这本书是由以殷铎泽为代表的4位传教士汉学家共同翻译的，包含《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它是17世纪欧洲人对孔子形象及其著述介绍得最为详备的书籍。

孔子——以“天下先师、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博学的学者和预言家”的形象，被隆重地介绍到欧洲。

意大利罗马东方语言学院博士 陆商隐

他希望通过他的翻译工作，向教皇和全欧洲证明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政策没有违背教义。其他的教会由于不懂中国文化，才会产生误解。

书的序言中写道，“他们介绍的中国，不是他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中的中国，而是那些古老的典籍中思想的中国，所谓孔夫子的哲学中国。”殷铎泽甚至自信地说：“如果孔子再世，他一定是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



▲用黏土动画模拟殷铎泽

但孔子自然不可能改信基督，而一些基督徒却开始“改信”孔子。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评论此书时说：“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长 君特·斯托克

20岁的时候，莱布尼茨就写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那时主要是理论认识。但是他可能感觉到了，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思想和理念全新

的世界，这让他一辈子都没再放弃。

1679年，莱布尼茨利用来华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编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版再版，受到了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希望，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因为，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当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近事》。

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秘书长 李文潮

莱布尼茨生活的时代，恰逢欧洲的30年战争刚结束，这30年战争主要是一种宗教引起的战争，而耶稣会士传播给欧洲的信息，就是中国是具有三千年和平文化的国家，欧洲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李晨阳

这等于是发现了一个精神上的新大陆。忽然发现了在外面有这么一个比较成功的、有灿烂文化的，又与西方那种教会系统完全不同的一个体制，当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位早已不满欧洲的专制与混乱的哲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为欧洲重建秩序的办法。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思想虽然无法超越宗教，但他却从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找到了重建欧洲秩序的参照——理性。

理性的光芒照向人间之时，就是启蒙运动开始之日。

也就是在这一年，1679年，一位刚刚从中国回到欧洲的传教士汉学家看到了《中国近事》后，表示非常钦佩。从此开始了与莱布尼茨密切的通信，为他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中国资料。

这个人，就是白晋。

去中国，寻找上帝的足迹

又一批传教士即将前往东方。

三百多年前，因为南怀仁的呼吁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白晋和其他4位耶稣会传教士，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遗憾的是，当他们千辛万苦抵达北京后，却只赶上了南怀仁的葬礼。不过，康熙皇帝按照皇亲国戚的规格，将南怀仁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这给白晋，留下了完美的印象。

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秘书长 李文潮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皇帝，特别是康熙，以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科学的兴趣，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和土壤。比如说水利，还有军事、地理、地图、天文，传教士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的基督徒们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是诺亚一家在大洪水之后繁衍的子孙，唯有《旧约》中保存了对大洪水前世界的部分记忆。但来华传教士发现，在中国，有记录的历史远早于《圣经》中所描述的时间。

这样的记载，不仅不利于传教，更有可能动摇基督教的根基。于是，这些传教士们开始努力地从中国的典籍中寻找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哪怕，这些证据是多么牵强附会！

北京大学教授 孟华

比方说贪婪的“婪”，上面一个林，下面一个女，他们就说通过这

个汉字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然后再如船，他们把它拆成舟（左偏旁部首），然后一个八，一个口，他们认为这就说明中国人其实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

学者 柯兰霓

“索隐派”认为，中国人忘却了中国经文的真正意义。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是错误的。所以“索隐派”来到中国，向他们正确阐释这些东西并帮助中国人过渡到基督教。这其实是“索隐派”的主要目标。



▲《易经》八卦图

这些被称为“索隐派”的传教士们宣称，中国人丢失了理解古书的钥匙，他们要为中国人找回那把钥匙。根据对《易经》的研究，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太极”即上帝，为万物之源，《易经》是中国人最上乘的道德与自然哲学的浓缩。

这成为索隐派研习中国文献的共同基础。

康熙大帝："哲人王"的现世楷模

1692年冬，紫禁城内一片慌乱。

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冷时如入冰窖，热时似进烤炉，御医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见好转。最终，白晋等传教士进献了金鸡纳霜，药到病除。

为表感谢，康熙颁旨，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传教，并任命白晋为特使，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49册，前往欧洲招募更多的传教士。

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太阳王"路易十四听说康熙的特使回到法国后，亲自接见了白晋。借此机会，白晋将自己写的《康熙传》交给了路易十四，书中他描述道："他是中国臣民一个十分优秀、十分温和的统治者，他关心自己的家庭、担忧自己臣民的幸福，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保护自己国家的伟大勇士，他是具备所有好统治者素质的人。"

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两个帝国，就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

北京大学教授 孟华

启蒙时代绝大多数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理想的都是一个政体，并不是像后来的这种共和，而是一个由哲学家国王来统治的国度。那么康熙的形象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哲学家国王的形象。所以说白晋写的《康熙传》等于是为这样的形象划了浓重的一笔。

1698年，莱布尼茨再版《中国近事》时，特意增补了白晋神父寄给他的《康熙传》。在遥远的东方，启蒙思想家不仅找到了一种孔子的思想，还找到一个康熙皇帝作为实现这种思想的榜样。几乎是“哲人王”的一个现世楷模。



▲路易十四

1704年11月，罗马，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发出禁约，认定孔子的学说为异端邪说，希望就此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特聘教授 于连

罗马教会为什么不接受儒家学说呢？显然，他们在儒教里找不到宗教特有的末日恐慌，儒教也并不用等待绝对神灵的降临。儒教里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类似《圣经》的历史，我认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受阻的根本原因。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康熙画像。杜赫德

但事与愿违。争论，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扩大化。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一个政治清廉、道德纯正、宗教宽容的帝国，此时成为批判欧洲的教权与王权最好的武器。用教会的话说，“这些危险的哲学家不过是以中国为幌子，扒出教士的肠子，勒死国王”。孔夫子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将人间的权杖交给哲学家，使暴力强权服从理性，建立哲学家的统治。

一盏明灯，即将点燃另一盏明灯。

用理性照亮世界

1721年7月，在德国哈雷大学一次两千余人的集会上，一个题为“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演讲者，是一个被莱布尼茨多次赞扬的青年学者——哈雷大学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

沃尔夫指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都取决于一种深奥的哲学，它植根于人类理性中的自然性，是一门真正的、关于幸福的科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沃尔夫就强调从自然神论角度，万物存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应该接近这个万物，而且他主要是强调中国并没有宗教信仰。他所以被禁教的原因是中国并没有宗教信仰，儒家并不是一个宗教，但这个国家生活得很好，吃得很好，过得很好，实际上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反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

他认为中国人不相信天主教，不等于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有神论者，什么神？就是自然神，这样使得中国的文化移植到西方去，或者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就起了一个类似桥梁、台阶的作用。

演讲在热烈掌声中结束，但沃尔夫，却因为宣传中国思想被哈雷大学解聘了。两年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下令：沃尔夫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国境，否则将被处以绞刑！

迫害成全了英雄。为宣扬“中国思想”而被驱逐的沃尔夫，很快得到

马堡大学的聘请。彼得大帝还邀请他出任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沃尔夫不愿意离开马堡，沙皇还是给了他一笔年金。

1728年，沃尔夫在另一次演讲《哲人王与哲人政治》中，集中讨论了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如何塑造开明君主：哲学赋予统治者以道德理性，作为他们统治的原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成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

沃尔夫大声疾呼“他们的国王都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国王”。这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场景，在中国成为现实。



▲沃尔夫

时间流逝，启蒙运动逐渐解放着人的思想。中国思想也从自然哲学，开始进入政治哲学。

1740年，四辆豪华的马车风尘仆仆地来到马堡大学的门口，来者是普鲁士新任国王腓特烈大帝的特使，奉命迎接思想大师沃尔夫重归普鲁士。这位受启蒙思想熏陶的国王，在写给沃尔夫的信中表示：“哲学家成为世界导师和王公顾问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巴黎第四大学名誉教授 西尔万·莫南

18世纪涌现了一场旨在摆脱基督教的戒律和信条的大规模运动，该运动的主导者是贵族阶层和与贵族结交的哲学家们。打破这种宗教观念束缚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证明即使没有宗教，或者说没有基督教，我们一样能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伟大民族。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特聘教授 于连

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个全新的事物，用官僚制代替贵族制、代替血统、代替世袭。科举考试，用知识、才华，即所谓的才能来进行选拔。中国由此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化从神学家的旗帜，开始变成哲学家的旗帜，甚至是哲学对抗神学的旗帜。在哲学家看来，用理性改造社会，将人类从迷信与恐惧中解放出来，最大的障碍就是基督教传统。

另一盏明灯，迸出了火花。

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1769年，一本名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的书籍，站在了欧洲思想论战的风口浪尖上。书中强调，“中国的制度，建立在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

书的作者，是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为了显示神圣和权威，他特意将书的出版地，标为“北京”。

魁奈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的观点，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另一位重要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魁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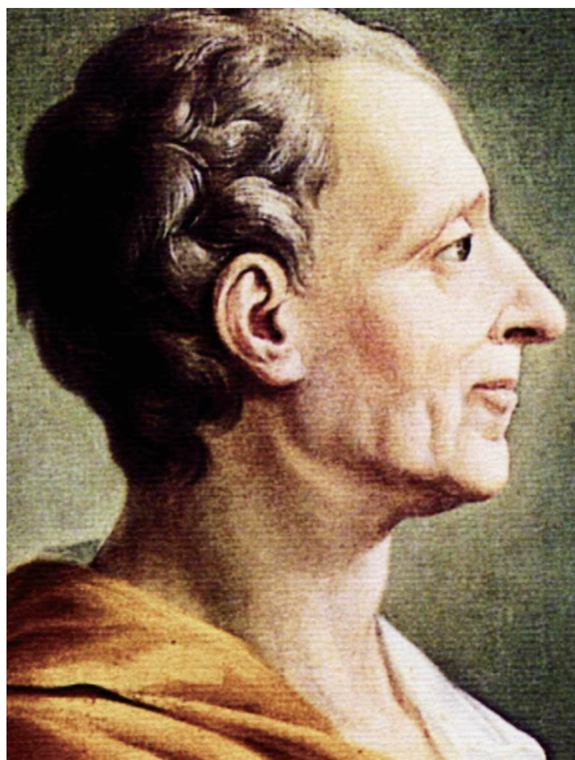
1713年10月，法国巴黎，在盖内戈街边的一间小公寓里，一个叫黄嘉略的中国青年正在埋头翻译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书籍。

此时，他不得不暂停手中的工作。一名法国青年在朋友的引荐下，特意前来拜会他。这名法国青年，是拥有男爵身份的贵族，后来，他被称作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这个人，正是孟德斯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

黄嘉略是18世纪初到法国的一个教徒，他在1713年和孟德斯鸠相识。根据有关资料考察，他们交往将近三个月，其间他们见面不下于八次，他们每次见面谈的，我不敢说唯一内容，但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


▲孟德斯鸠

黄嘉略，1679年11月出生于福建莆田，由于家庭传统，早早便接受洗礼成了基督徒。1701年底，他被回罗马述职的传教士带到了欧洲。

之前，孟德斯鸠对中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更谈不上有多么大的兴趣。黄嘉略和他谈到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信仰，介绍了中国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行政、司法和科举制度，甚至还分析了汉语的特点。

对这几次谈话，孟德斯鸠非常重视，他曾先后整理了3次记录。最长的那份记录，多达20余页。

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卡特琳娜•沃尔皮拉克

他阅读了法国汉学界最基础的著作——神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并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和摘抄。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他渐渐对不同政府体制产生了兴趣。

1748年，经过20年的潜心研究，孟德斯鸠的巨著《论法的精神》问

世，随即震动世界。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的权力应该一分为三，分为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互相独立、互相牵制，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三权分立”的理论，后来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



▲用黏土动画模拟黄嘉略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当时的中国当作了反面例子，并展开猛烈抨击。“中国的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臣民的生命财产均由君主任意处置……中国刑罚骇人听闻。犯有大逆罪的人被株连亲属。”

正是这样的论断，遭到了魁奈的猛烈攻击。

与孟德斯鸠相反，以“中国捍卫者”自居的魁奈，对中国制度极为推崇。他所主张的重农主义，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这些都与中国的制度相契合。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贾永吉

魁奈说过商业并不重要，我们知道中国虽然跟外国做生意，但更看重的还是国内贸易。魁奈吸收了这一思想，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

魁奈也是最早把中国思想家老子介绍到西方的人，他把“无为”翻译成了“自由放任”。而当这一思想，被他的好友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消化在《国富论》中时，就成了那只调节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雕像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传教士创造了一个革命性的“中国”，成为欧美现代文化的灵感。

巴黎第四大学名誉教授 西尔万·莫南

我们不能说中国哲学孕育了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和欧洲的哲学家的思想，因为他们只了解到中国哲学的只言片语。但是我们可以说，法国和欧洲的哲学家从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哲学思想当中寻找到了进一步例证，从而构成自身的思想体系。

“一部《论语》，就可以打倒希腊七贤。”魁奈的论断，也揭示了孔子在18世纪启蒙学者们眼中“守护神”般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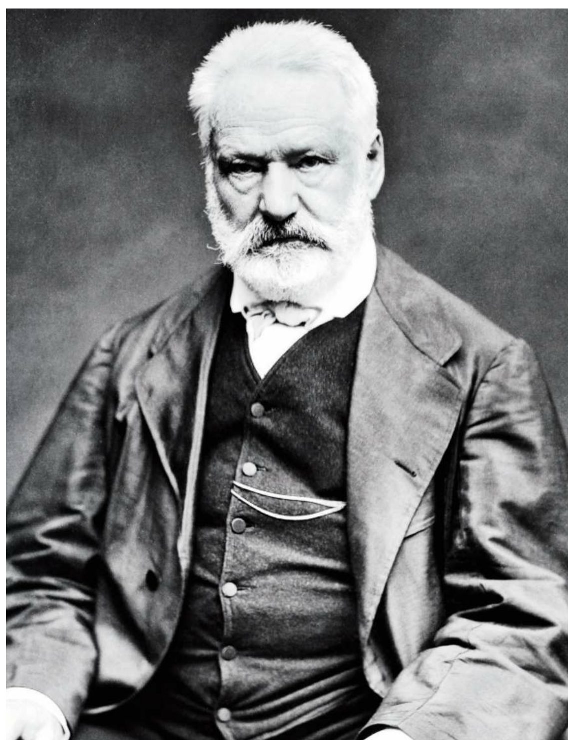
这群启蒙运动的旗手们把孔夫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是“天赐的礼物”，是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兰西的骄傲——伏尔泰。

伏尔泰：欧洲的良心

这是位于巴黎四区的一幢普通的公寓。而与众不同的是，这幢公寓的大厅，无论是摆件、桌椅、装潢，无一不是货真价实的中国货，甚至连墙上挂着的中国风绘画，也是主人亲手绘制的。

他的主人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



▲雨果

作为19世纪法国社会的精神领袖，雨果创作中秉持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正是来自于“欧洲的良心”伏尔泰。

“伏尔泰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个社会一切丑恶力量的大联合，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雷电——一支笔。”

这段话出自雨果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的演讲稿。

正如雨果所评价的，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思想，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并奋力为此而抗争。他用一篇篇深邃而犀利的文章，向教权和皇权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

瑞士日内瓦伏尔泰研究所所长 弗朗索瓦·雅各布

伏尔泰很早就关注儒学思想了。那么，为何伏尔泰对儒学思想感兴趣？因为儒学思想使他在日后提出了自然神论的理论，那就是不需要神的启示，只需要一种简单的伦理哲学。



▲伏尔泰

1733年，伏尔泰的《哲学通信》问世，这本书被誉为是“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但粉碎一个旧世界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那么，新世界又该如何建立呢？

今晚的诗兴，

乘着雄鹰的翅膀高翔。

向着东方中国，

太阳升起的地方，

向着清新的德行，

将孔夫子的道德带给观众，

带回不列颠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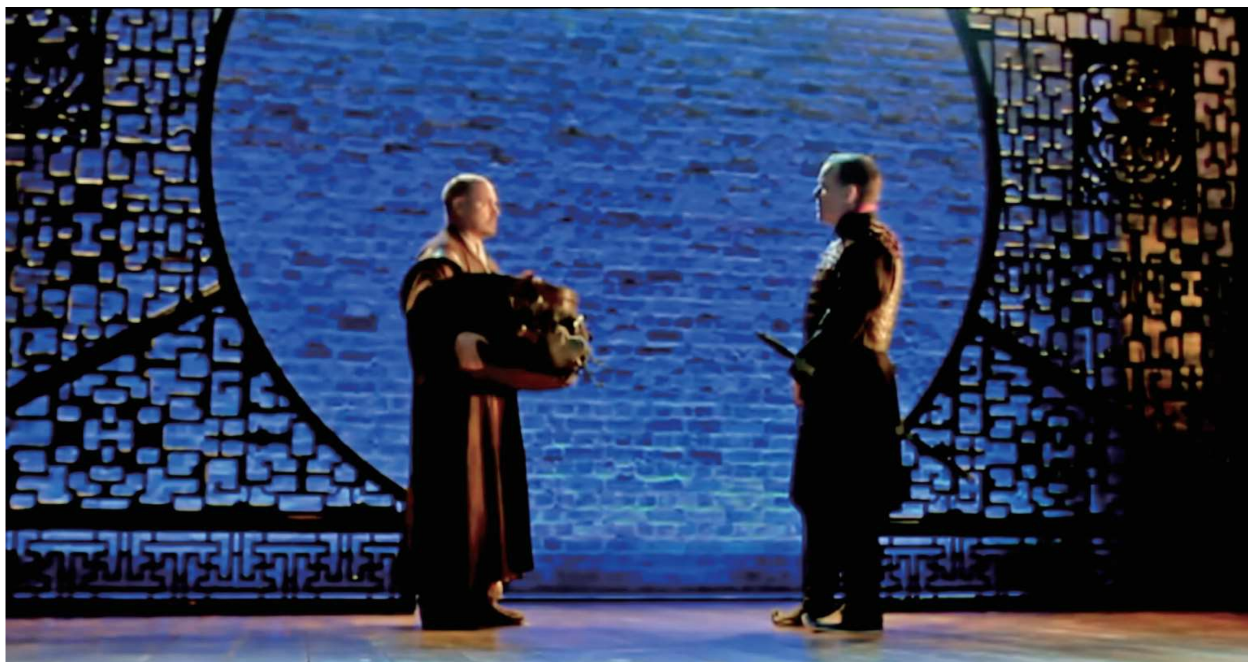


▲伏尔泰著作《哲学通信》

1755年8月20日，法兰西大剧院人山人海。由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创作的《中国孤儿》在巴黎首次上演，并大获成功。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夏尔·古戴尔

这部戏剧除了带有异域风情外，还充满哲理。只要你握有真理、保持尊严、拥有友情、真诚待人，总有一天会战胜当初的胜者。这也是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获得成功之前就传达出来的信息。因此，即使是弱者，只要握有真理，也会有所向披靡的力量。



▲《中国孤儿》在英国剧场上演

最早把《赵氏孤儿》介绍到西方的是英国汉学家马若瑟。

这位被白晋带到中国的传教士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所编著的《汉语札记》，打破了前人拘泥于拉丁语法研究汉语的枷锁，力求用汉语本身的特征来分析汉语语法，被认为是此类著作中“最佳之品”。

1732年，马若瑟在广州把《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他之所以会在上百部元杂剧中挑选出了《赵氏孤儿》，有他隐藏的动机：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能够观察到中国的文明程度和道德观念。

显然，正是中国的伦理道德打动了伏尔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

当时法国的这个理念，我们现在叫作“专制主义”，实际上他们并不这么讲，而是绝对王权主义，也就是国王的王权，有无限膨胀的趋

势，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小，同时又受到神权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找到法国的出路，是他们当时感到比较困惑的问题。

在仔细阅读了殷铎泽等人编纂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后，伏尔泰从中看到的是最纯洁的道德。“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

伏尔泰自称“孔门弟子”，他曾感慨地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曾对世界宣布过比孔夫子宣布的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此，将无耻之徒击垮在中国之下，便成了他的信念。

1756年，经过16年的创作和修订，七卷本的《风俗论》付梓。

在书中，伏尔泰明确地将中国的历史起源，确定为基督纪元前2602年。他以理性为出发点，创造性地把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历史扩展为真正的世界史；将政治、军事史推至人类文明进步史。



▲用黏土动画模拟马若瑟

法国巴黎第四大学名誉教授 西尔万·莫南

正如伏尔泰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在他对抗无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1755年左右，他在信件的结尾总是写道：“我以孔夫子的名义向您致敬。”此举就是为了证明在法国，反基督教人士都是孔子的信徒。

瑞士日内瓦伏尔泰研究所所长 弗朗索瓦·雅各布

因为在当时每个上层社会家庭的卧室里，都会摆放一个小的祭坛，用来祈祷，既恭敬又私密。而在伏尔泰的房间里，没有这类祭坛，却摆放着孔子画像，他对着画像进行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究。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摆放孔子画像相当于给了当时的宗教一记耳光。

进行没有宗教色彩的新型的世界史的撰写，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然而，问题是，伏尔泰和其他哲学家们传颂的中国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冲破黑暗的革命。比起那些因为被处死而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先驱者，无论是曾被关到巴士底狱的伏尔泰，还是因写了《盲人书简》被关到巴黎郊外的狄德罗，他们的命运都幸运得多。

而此时，他们理想中的那个“中国”正在大兴文字狱，惶恐度日的中国文人随时都面临被满门抄斩的危险。

关于这一点，启蒙哲学家们不知道，或许，他们也不愿意知道。

1778年2月，84岁的伏尔泰回到了他阔别29年之久的巴黎。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喜剧院都为他打开大门。老百姓争睹伟人风采，他的五幕诗剧《伊雷娜》的上演更把伟人回归推向高潮。“伏尔泰万岁”响彻云霄。

一个月后，“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逝世于巴黎。临终前的遗嘱居然是：“请永远不要与我谈基督！”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永远地铭刻在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中。

“中国热”在大革命的火光烈焰中，逐渐降温。

进步使人从野蛮进入文明，而停滞则使人从文明退化到野蛮。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同样悠久的暴政与愚昧中，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

在点亮另一盏灯后，中国，已鲜有人问津。

而汉学的发展，也即将走入一个更理性的时期。

第三章
抽刀断水水更流



▲维克多·雨果收集的中国艺术品

18世纪末，亚欧大陆上，两位皇者的两封敕令，把传教士汉学——这个垄断中西交流长达一百多年的纽带，彻底撕裂。

在西方，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耶稣会，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在东方，康熙皇帝颁布圣旨，禁止洋人传教，封杀了他们的前程。夹缝中的耶稣会传教士只能自生自灭，艰难复苏的中西方交流再次变得气若游丝。

但汉学研究，此时却置之死地而后生，从教堂转入了象牙塔。

传教士们积累了几百年的游记、信札、典籍被重新发酵，欧洲的一些学者开始通过文献触摸中国。职业汉学家们不用再背负传教

的包袱，这让汉学从神话和谣言的扭曲中解脱出来，成长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雷慕沙：汉学世界的“鲁滨逊”

1829年5月8日，巴黎，王家印刷厂外热闹非凡。

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在不停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但主题其实只有两个：中国人长什么样？巴黎真的有人懂中文吗？

中国太远了，近乎另一个星球！不久前，有4位中国基督徒来到巴黎，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新闻。但比这个消息更让人吃惊的是：巴黎，居然还有人声称自己懂中文！这个人，就是阿贝尔·雷慕沙。



▲法国王家印刷厂

于是，一场备受瞩目的会面，被特意安排在王家印刷厂中举行。

在好奇和怀疑的目光注视下，雷慕沙被学生们簇拥着走进了王家印

刷厂。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多年来闭门造车的成果。

巴黎《箴言报》对这次会见进行了现场解说式的报道："雷慕沙和中国人说话的情形，就和我们之间说法语一样，只不过手里拿着笔。他的动作优雅而轻快，脸上还不时露出喜悦的微笑，雷慕沙先生令人嫉妒地展现了一种我们还完全不了解的文学品位。他写的中国字非常漂亮。"



▲雷慕沙

转瞬间，雷慕沙成了巴黎耀眼的文化明星。

汉学家教授 沃尔文斯

在他的传记中曾提到，他小时候在他家门口，也就是帕利亚街玩耍时，摔下来受了重伤，一只眼睛失明。因此和其他的小孩相比，他的行动比较受限。

但行动受限的雷慕莎，却因此在书海中徜徉。

有一次，他在一位学者家里看到了一本漂亮的植物书籍，上面写有奇特的文字，那就是中文。但当时却没有人看得懂。

汉学家教授 沃尔文斯

传说，当时这个小男孩就想着以后要看懂这书上所有的字。

法国国家图书馆，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今天的法国公民，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自由借阅其中海量的藏书。



▲拿破仑大帝

两百年前，一位18岁的小伙子，多次来到这里，希望借阅耶稣会士马若瑟编写的《汉语札记》，却始终被拒之门外。而理由是拿破仑大帝正在编纂一本汉语大词典，征用了与中文有关的所有书籍。

雷慕沙只能辗转柏林和圣彼得堡，借阅传教士们留下的零散书籍，以此制造自己学习汉语的工具。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当拿破仑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被世人牢记之时，他的汉语大词典却早已被遗忘。而一个鲜为人知的学者，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汉学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法国巴黎第四大学名誉教授 西尔万·莫南

如果我们说：“这是中文。”意思就是：“我什么都没懂，因为您说的是法国人最难懂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法国人学中文很难，极少有人能掌握中文。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蓝莉

在老一代的传教士纷纷离世以后，欧洲已经没有人懂中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慕沙此举有过人之处。他将一个已经灭绝的事物从乌有中复兴，或者说拯救了一个在法国灭绝了的知识。

1811年8月，雷慕沙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汉文简要》，同时他给自己起了这个地道的汉语名字。

这部著作，标志着一个23岁的学生已成为一名一流的汉学家。遗憾的是，因为周围没有中国人，即使他满腹经纶，也不会说一句汉语。

两年后，雷慕沙以研究中医舌诊的论文获得了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而此时的巴黎已是一片狼藉。一代枭雄拿破仑无法抵挡俄国、英国、普鲁士、西班牙等反法联盟军队的进攻——巴黎陷落，失败的英雄被放逐。

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但雷慕沙仍然无法逃避服兵役。幸好有爱惜英才的法国学界领军人物德·萨西教授的帮助，雷慕沙被任命为巴黎军队医院的军医副官，他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伤兵减轻痛苦。

但苦难，何时才是尽头呢？

巴黎繁华的市区里，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建筑。它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更融入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它，就是法兰西公学。



▲“普教一切”

“普教一切”或“有教无类”，这句包含着法兰西学者们最高理想的警言，被深深铭刻在法兰西公学的校徽上。从1530年创立之初起，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任何人走进校门，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

1814年12月11日，在德·萨西教授的建议下，法兰西公学创办“鞑靼—满文、汉语言与文学讲座”。年仅26岁的雷慕沙，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整个西方汉学界都把这一天，作为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部项目主管 裴程

1814年以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法国的汉学界，和以前有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已经脱离了宗教，和宗教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比如雷慕沙，以及后来的儒莲，这些都是职业的研究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顾钧

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应该说整个西方汉学中心就在法国，就在巴黎。



▲黑格尔

雷慕沙的公开课，听者如云。这一天，教授正在认真地阐述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道德经》。台下，有一位听得出神的“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正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雷慕沙虽然没有改变黑格尔对中国的整体看法，但却直接影响了黑格尔对老子和道家的认识，也影响了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这是一个与耶稣会传教士所宣扬的截然不同的道家，一个与形而上学及思辨有关的道家。

1814年在法国，汉学和哲学两个学科几乎同时进入大学体制。但此时，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却开始分裂。黑格尔的弟子把中国哲学排除在哲学王国大门之外，而雷慕沙对中国文明仍旧充满了尊重。

马礼逊：用性命编纂《华英字典》

1824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柔和的灯光从雷慕沙的家里映照出来。教授正在与一位贵客开怀畅谈。

这是一位让雷慕沙期待已久的贵客，早在他编著的《华英字典》第一次出版时，雷慕沙就曾感慨道：“他的《华英字典》与其他字典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

这位贵客，就是刚刚从中国返回欧洲的马礼逊。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慧玲

马礼逊是英籍传教士。他到中国的时候困难重重，因为当时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华居留，所以他是以美国人的身份拿着美国国务卿以及政要的介绍信来到中国的。

1807年9月的一天，夜深人静，广州美国商馆内，一个英国人小心翼翼地将灯光遮蔽，开始学习中文。而在他身旁，好不容易高薪聘请的中文老师却随身装着毒药，准备一旦被官府发现，就服毒自尽。

这个人正是马礼逊。

两年前，嘉庆皇帝重申，广东省务必禁止一切传教活动。鉴于国内的动荡局势和越来越严峻的外部形势，清廷颁布禁教令：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这是“整风饬俗之要务”。

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再

到嘉庆，两百多年过去，“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最终，清政府将传教士彻底拒之门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慧玲

1834年，马礼逊又被任命为新的英国商务监督……他在中国前前后后生活了27年，最后也是死在中国，葬在澳门。



▲马礼逊



▲嘉庆皇帝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马礼逊留下遗嘱，希望在伦敦也建立一所汉语学院，并愿意将自己的15000册中国书籍全部捐献给学校。因为此时，在汉学这条路上，英国人的老对头法国，已经走得很远了。

三年后，1837年，其生前挚友小斯当东作为遗嘱执行人，通过多方奔走，终于同伦敦大学达成协议，创办了为期五年的汉学讲座。小斯当东，也因此被称为“英国汉学之父”。

但正是这位“英国汉学之父”，很快却又把中国推向了深渊。当然，

要想厘清恩怨，我们还得把历史的车轮倒转30年……

小斯当东：被乾隆接见过的汉学家

1792年初，即便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两亿英镑，英国政府还是决定挤出七万英镑用来支持一项出使任务。任务的目的地是大清帝国。因为，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人急需这个广阔的市场。



▲马戛尔尼勋爵

但被委以重任的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却迟迟不愿起航。因为他尴尬地发现，偌大的英国竟然找不出一个中文翻译。而他的副手老斯当东男爵更是跑遍了欧洲各国，也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

小斯当东故居管理员　克里斯·贝利

最后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找到了两个华人抄写员，经过协商，这两名抄写员被送到了英国，并且加入了前往中国的使团。

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一行经过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后，被获准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83岁的乾隆皇帝。

为叩开中国的大门，也为了向曾经的榜样展示自己的文明，英国人精心挑选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礼物都是最新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不料，礼品变成了贡品，外交变成了朝贡，马戛尔尼在莫名其妙之间就已

经失败了。



▲马戛尔尼勋爵一行觐见乾隆皇帝图



▲马戛尔尼勋爵一行为乾隆皇帝挑选的礼物

这个幸运的儿童，是副使老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

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中国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你们的东西我不稀罕，赶紧走。

幸好有一个孩子吸引了乾隆的眼球，否则，这次觐见必将因一事无成而载入史册。当乾隆得知使团中竟然有一个洋孩子会说中文时，龙颜大悦，不仅赐给他一块翡翠，还从腰间解下了自己的荷包送给了他。

小斯当东故居管理员 克里斯•贝利

小斯当东很有语言学家的天赋，在这段为期11个月的旅途中，他向这些那不勒斯来的中国人学到了一些中文口语和书面语。

无功而返的马戛尔尼后来总结这次出使时，认为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合适的翻译。语言，成了把他挡在大清朝之外的鸿沟。

如果说整个使团里，还有一个高兴的人，那肯定非小斯当东莫属。


▲小斯当东觐见乾隆皇帝

回到英国后，小斯当东便一举成名。他与乾隆交谈的故事以及他受到的赏赐都让他的身上笼罩上了一层“中国光环”。

1798年，年仅17岁的小斯当东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出任文书。随后，成为东印度公司唯一的中文翻译。

从1800年起，深感西方对中国制度不了解的小斯当东，十年如一日地将《大清律例》关于律文的436条全部翻译成英文。他认为，中国法律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很多地方是可取的，“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幸运的、开化的国家，也许也是值得效仿的。”

澳门利氏学社社长 万德化

阅读这本书的主要是哲学家、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欧洲人，他们不仅对中国的外在感兴趣，还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及运作，社会不同阶层、皇帝如何工作感兴趣。

1810年，《大清律例》英文版正式出版，随后转译为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版本在欧洲大陆发行。它标志着英国从欧洲大陆文字转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历史的结束和中英之间直接的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开始。

1816年，英国人战胜拿破仑，终结了欧洲大陆近20年的战事。

松了口气的国王马上决定，再派使团前往中国。虽然，中国正在堕落成“半野蛮人”，但欧洲人对茶叶的依赖已经催生出一个发财的良机。为避免重蹈覆辙，国王钦点了一位“中国通”——小斯当东做副使。

得知英国又遣使来朝，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特意召见广东巡抚孙玉庭，希望这位以“悉夷情”著称的大臣，能为自己答疑解惑。

嘉庆皇帝问：“英国是否富强？”孙玉庭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由于富，而富则由于中国。”嘉庆皇帝问其原因。孙玉庭解释说：“英国富是依赖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而且，“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

君臣二人哈哈大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慧玲

第二次来华使团，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如果看一下马戛尔尼使团和第二次阿美士德使团他们使华的目的的话，会发现即使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最后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



▲小斯当东

权，都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使华时候的全部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对于使华寄予的希望太大。

嘉庆皇帝写给英国摄政王的信，让英国人感到绝望，“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意思是，大清王朝不欢迎英国人，你们以后不用再遣使来朝了。



▲英国国会大厦

出使失败的消息，在三个月后就传回了欧洲，必须以武力征服中国

的声音也逐渐出现。但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拿破仑皇帝，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认为鼓动和中国战争的人是国家当前最危险的敌人。”

“你们开始无疑会获得成功，俘获他们的船只，摧毁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被迫想方设法反抗你们，保卫自己。”

拿破仑着眼于未来的论断，可谓真知灼见。但在英国人看来，眼前的问题似乎更为重要。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一场激烈的辩论正在进行，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

辩论中，有一位议员特别受人尊敬，他的发言自然引人注意。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

这位议员就是两次出使大清、两次遭遇失败的小斯当东爵士。回到英国后，他花重金买了一个下议院议员的职位。与汉学的擦肩而过，也许只能算是个美丽的误会；政治，才是他真正渴望的舞台。

最后，小斯当东坚定地说：“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志平

在人们的想象中，中国还是很强大的。但是，斯当东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见闻证明，实际上，中国是很虚弱的，外强中干。他们的做证，直接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林则徐像，地点：虎门销烟池

此时的大清朝，还沉浸在“茶叶国防”之中。人们对英国的了解依旧停留在：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不好消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禁烟大臣林则徐刚到广州时，也称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还上奏道光皇帝“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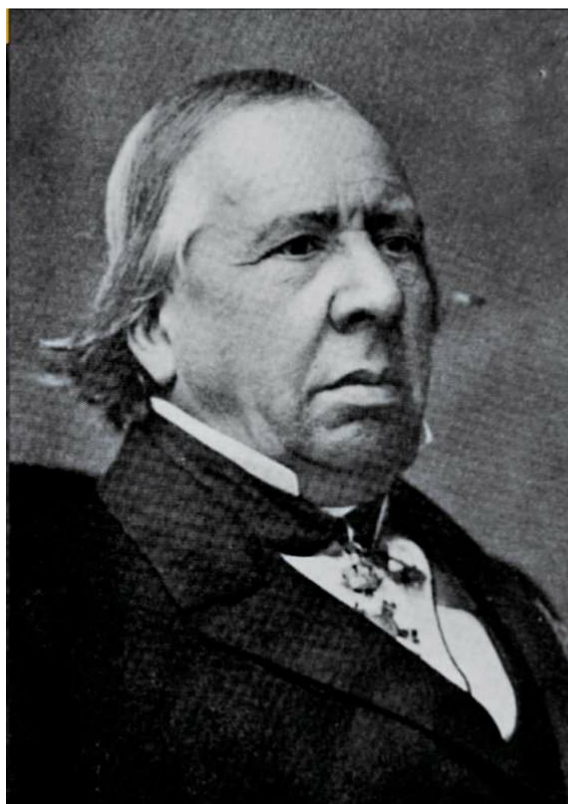
然而，英国人来了。当坚船利炮沿着烂熟于心的中国海岸线一路从广州杀到天津之时，中国还没有几个人能确切地说出英国究竟在哪里？

一开一合之间，胜负已成定局。

儒莲：汉学界的诺贝尔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英国人对汉学研究的热情也随之降到了冰点。枪炮比汉学更有效地撬开了中国市场。

英国的汉学讲座也一度中断。对此，著名的英国汉学家道格思曾痛心疾首地说："国人除了跟中国人做生意外，对与他们有关的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当英国人进口中国货物时，法国人却把自己的思想带到了那儿……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出于真正的学者天性，致力于汉语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



▲儒莲

为了证明法国职业汉学的成功，道

格思还举了一个例子，1823年，儒莲在巴黎开始学习汉语。两年后，他就出版了一本关于孟子哲学的拉丁文译本。

波尔多第三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安必诺

我认为雷慕莎的最大成就就是为自己培养了继承人。因为他的继承人是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儒莲。

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教授 戴仁

在雷慕莎去世后，从1830年直到1870年为止，他的继承人儒莲，一直担任法兰西公学的“鞑靼—满文、汉语言与文学讲座”的教授。儒莲被认为是他那个年代最佳的汉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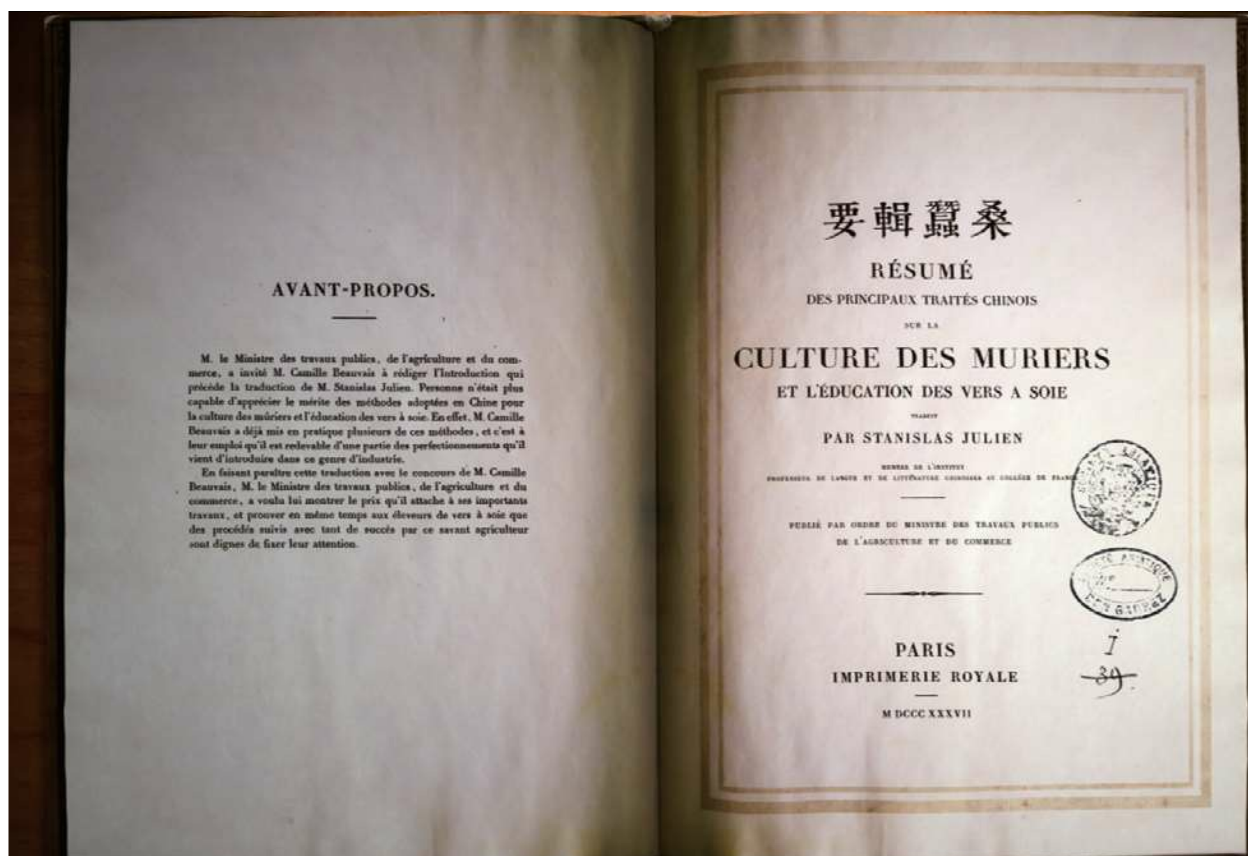
在成为一名汉学家之前，儒莲曾经是法兰西公学的古希腊语助教。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一天，儒莲路过一个同伴的宿舍，恰好发现他正在课本上写一种方块字。瞬时，儒莲就被这种神秘的文字所吸引。一个小时以后，同伴已经将所学内容尽数道出，而儒莲却意犹未尽。

最后，他只能带着这篇《孟子》踏入了雷慕沙的课堂。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部项目主管 裴程

因为在当时的法国，一个年轻的学生来上中文课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大家都认为汉学圈子是非常小的，所以雷慕沙就点着儒莲的名字说，你给我讲讲这篇文章的意义。儒莲用非常流利的拉丁文把这篇课文翻译出来了，雷慕沙一下子就觉得这个青年前程远大。



AVANT-PROPOS.

M. le Ministre des travaux publics, de l'agriculture et du commerce, a invité M. Camille Beauvais à rédiger l'Introduction qui précède la traduction de M. Stanislas Julien. Personne n'était plus capable d'apprécier le mérite des méthodes adoptées en Chine pour la culture des mûriers et l'éducation des vers à soie. En effet, M. Camille Beauvais a déjà mis en pratique plusieurs de ces méthodes, et c'est à leur emploi qu'il est redevable d'une partie des perfectionnements qu'il vient d'introduire dans ce genre d'industrie.

En faisant paraître cette traduction avec le concours de M. Camille Beauvais, M. le Ministre des travaux publics, de l'agriculture et du commerce, a voulu lui montrer le prix qu'il attache à ses importants travaux, et prouver en même temps aux éleveurs de vers à soie que des procédés suivis avec tant de succès par ce savant agriculteur sont dignes de fixer leur attention.

要輯蠶桑

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

SUR LA

CULTURE DES MURIERS

ET L'ÉDUCATION DES VERS A SOIE

TRADUIT

PAR STANISLAS JULIEN

PUBLIÉ PAR ORDRE DU MINISTRE DES TRAVAUX PUBLICS

DE L'AGRICULTURE ET DU COMMERC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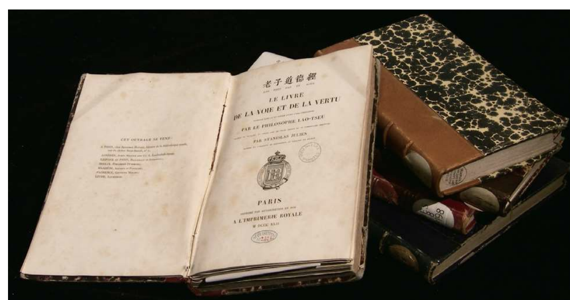
M DCCC XXXVII

▲儒莲翻译的法文版《桑蚕辑要》

法国里昂，欧洲的丝绸之都。这里坐落着大大小小上千家缫丝厂和纺织厂，集中了三万多名纺织业员工。

然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场危机，却险些让繁华幻灭。

19世纪初，欧洲的蚕桑技术已经有一定发展，但因为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了生丝的大量减产，严重影响了欧洲丝绸的产量。



▲儒莲翻译的法文版《道德经》

1837年，一本叫作《桑蚕辑要》的书一夜之间轰动欧洲，其中记载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书籍出版后迅速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英文和俄文，在欧洲各地加印出版，一时洛

阳纸贵。

这本引发了欧洲蚕桑业技术改良的书，并不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是来源于两部中国古籍《授时通考》和《天工开物》。

书的译者正是儒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耿昇

《桑蚕辑要》是我们中国古籍的译本，原文叫《中国的养蚕术和织桑术》。达尔文曾经承认过这本书对他研究物种的起源，特别是对于丝绸类的起源是很有帮助的。

没有了拿破仑的法国，处于一片动荡之中。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内外交困的经济，让人民对生活无望，但却给了法国汉学一丝希望。法国汉学在权力的真空中逐渐发展壮大，并保持着纯粹的学术研究。

1842年，儒莲实现了老师雷慕沙的理想，出版了全译法文本《道德经》。当时的汉学家，都将之视为最佳的译本。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阅读了儒莲的《道德经》译本后，很快便陶醉其中，在他的阅读批语里，可以看到许多“玄学极妙”“非常好”等溢美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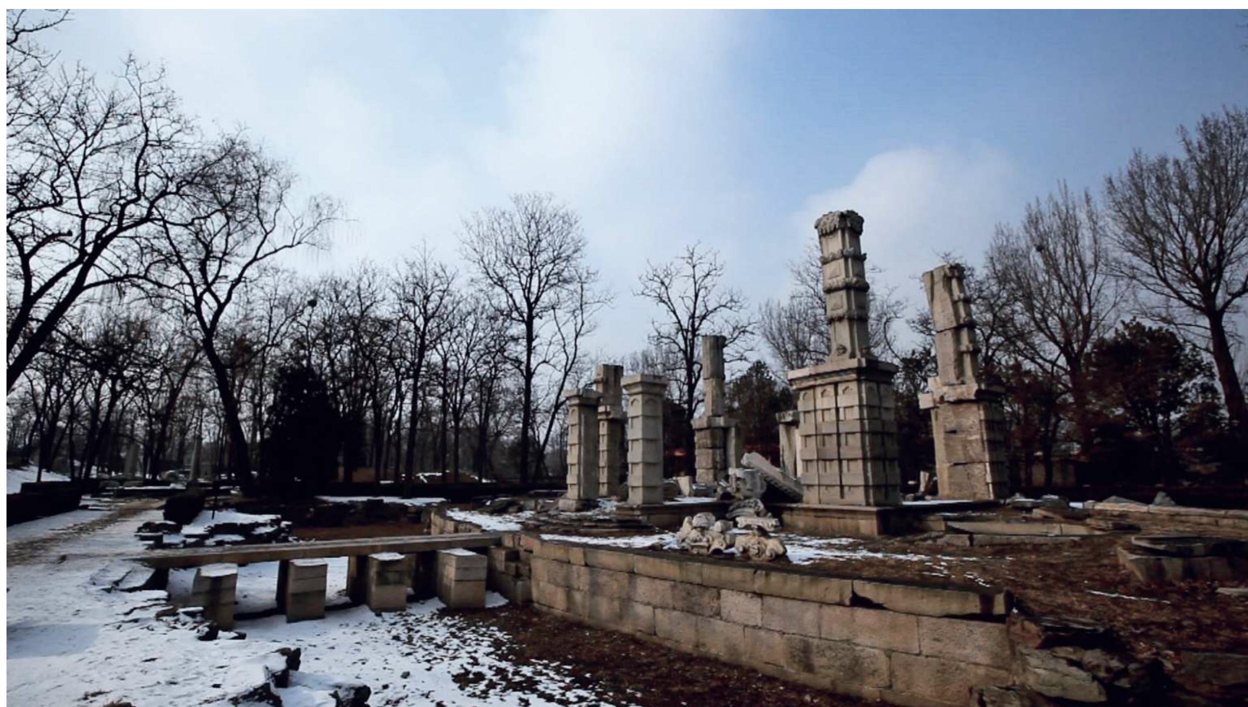
从此之后，托尔斯泰与老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子的“道”和“无为”，对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形成，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

1852年，期盼已久的法国人民，终于又迎来了一位拿破仑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在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世界地图上加紧殖民地的掠夺；更为了证明自己“拿破仑”姓氏所象征的战无不胜。拿破仑三世选择联合英国，向中国动武，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在得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之后，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拍案而起，严厉斥责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启蒙运动和中国热已经过去近百年了，但这位依旧充满了启蒙情怀的文豪对中国还是有着像伏尔泰等人一样的尊重。面对无情的战争，不论是雨果这样的文豪，还是儒莲这样的汉学家，都无力阻挡。但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抗争。



▲圆明园遗址

在战争结束后，雨果积极收集被英、法联军抢回欧洲的中国艺术品。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雨果的动机是什么。但是，雨果自己的话，也许可以对这一切做出解释。

“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儒莲，还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著作名录。从经典著作到宗教伦理，再到小说戏剧，他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汉学的范畴。他用著作向世人争辩，中国人不仅不是野蛮人，而且同样有值得尊重的灿烂文化。

1867年底，清末著名思想家王韬旅欧时，曾专程到巴黎拜访儒莲。这位“躯干肥硕，精力充裕”的汉学家给王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先生既造就人才，乐育后进，为国家储才待用，而又谦德自持，虚怀能受。”

但事实上，汉学界的同行们对他却颇有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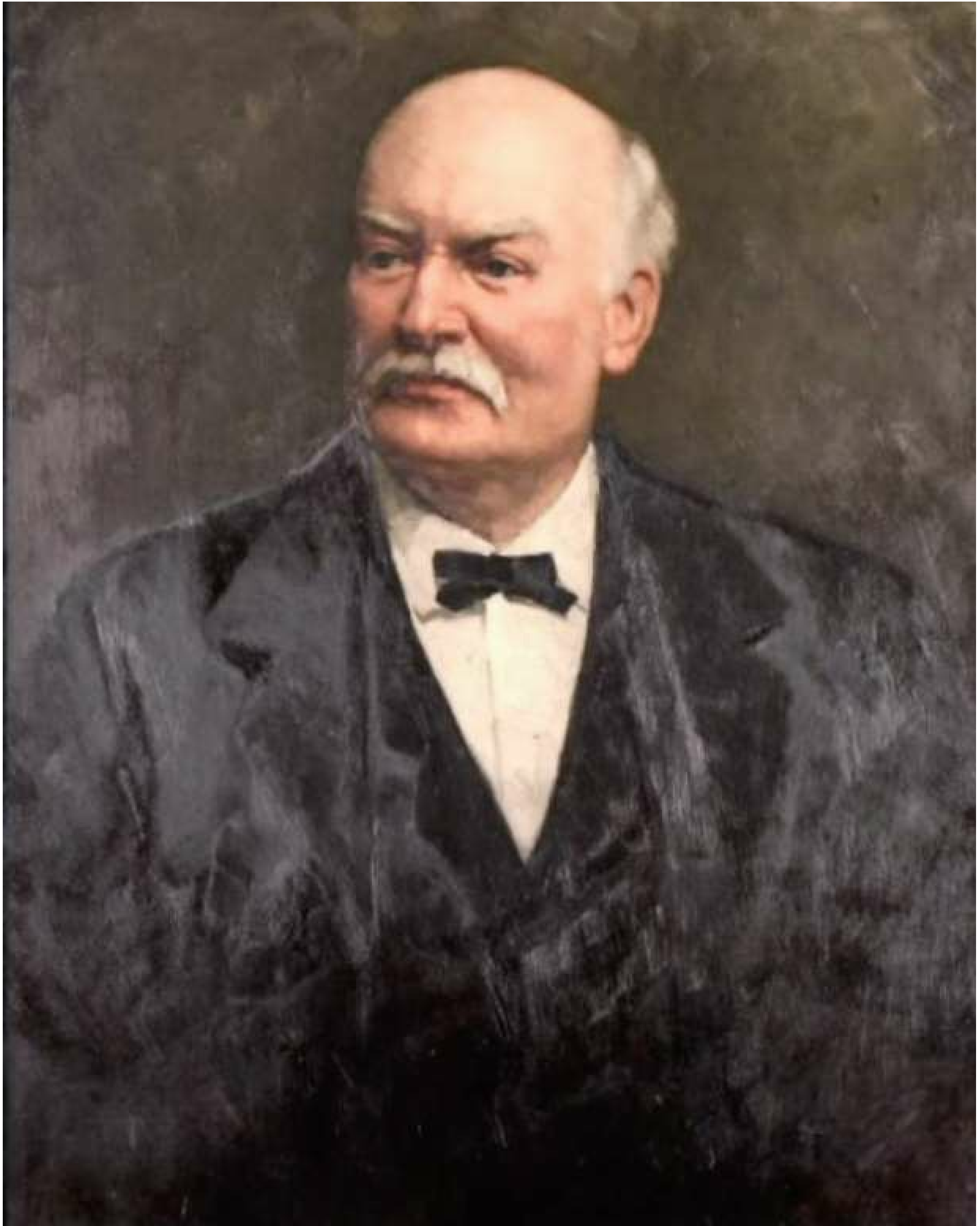
波尔多第三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安必诺

他试图在法国垄断所有中国事务。

1872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妻女早逝的儒莲将所有家产都贡献给了法兰西文学院，用于奖励最有价值的汉学著作。直到今天，“儒莲奖”依旧是汉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被誉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谁来解剖中国？

一方面，是学者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另一方面，是殖民扩张潮的现实需求。在19世纪末，俄国、英国、荷兰、德国等都先后在大学中建立了汉学讲座。汉学，终于开始在欧洲遍地开花。



▲施莱格



▲卫三畏

1875年10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讲座的第一位教授施莱格，在就任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远离中国本土的这些汉学家势单力薄，在学术圈里很难得到同行的尊重，汉学家们在欧洲就像是离开了水的鱼。”

因为，直到不久前，西方人还很难走近中国，所以学术热情也很难得到现实的回应。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中的第十八款，特意强调允许外国人学中文。

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又出现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在两个通篇几乎都在强调贸易的条约中，这样的条款着实显得很另类。

而这个条款之所以能挤入条约正文，与一位美国汉学家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名叫卫三畏。

对美国传统汉学来讲，1876年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路标。

这一年10月，卫三畏结束了长达43年的中国生活回到美国。第二年，他就任耶鲁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成为美国首位汉学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顾钧

美国汉学可大致分为两种，即业余和专业，但是也有业余到专业过渡的时期，卫三畏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人，因为他原来是个业余汉学家，当过很长时间传教士，然后也当了很长时间外交官，等到晚年回到耶鲁（因为当时他儿子在耶鲁），成为一名汉学教授，等于就成为一名专业汉学家，实际上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一个业余汉学家，所以从他身上我们正好可以看出业余到专业的一种过渡。

告别了喧嚣，卫三畏终于能沉下心来修订首版于185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尽管时光又流逝了30年，但在当时，仍然没有一部著作在讨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能超过《中国总论》。

在修订版的序言中，卫三畏说：“这期间，中国在政治与精神上的进步，可能超过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此时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洋务运动。1875年的中国，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以西方为榜样的变法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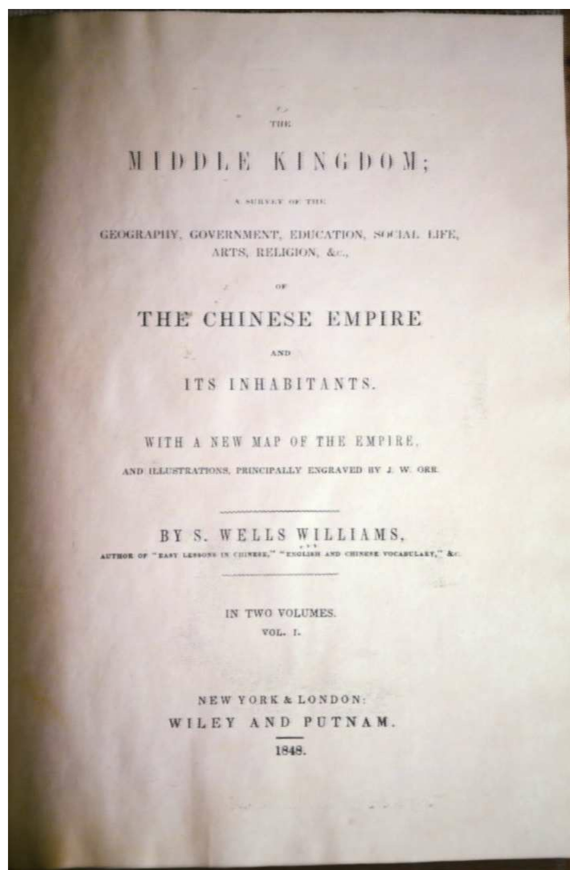
所以，修订此书显得非常必要。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侯且岸

之所以叫《中国总论》，因为它实际上涉及整个中国地理、文化、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所以更像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的著作。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员 吕素琴

他写这个《中国总论》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资料，所以他的资料甚至到了中国近代都被引用，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就是根据那个时候他的统计。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WITH A NEW MAP OF THE EMPIRE,
AND ILLUSTRATIONS, PRINCIPALLY ENGRAVED BY J. W. ORR.
BY S. WELLS WILLIAMS,
AUTHOR OF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c.
IN TWO VOLUMES.
VOL. I.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中国总论》

在耶鲁的图书馆中，卫三畏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还只是一个21岁的印刷工。那时的他

只能像马礼逊一样在驿馆中偷偷地学中文，也不能随意外出。这样的学习经历绝对不会有多愉快，所以多年以后，当卫三畏有机会参与制定《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时，首先就要打破清朝关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禁令。

作为仅有的几个懂中文的美国人之一，卫三畏亲历了晚清的诸多重要事件。

面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失败根源，“当时中国很多人狂热地支持这一场政治革命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口号是片面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下层民众，而不在于政府，改变统治者仅仅是改朝换代。”

在当时，这样的结论，也许是超越时代的见识。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员 吕素琴

他说中国真正的希望在人民，因为就算改朝换代依然会有很多的杀戮，但是最基本的动力、生产力和安定力通通是在人民身上，所以我说他很推崇孟子。

顾名思义，《中国总论》自然是总体性的把握。此前在西方，类似著作只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但他们从未到过中国。

卫三畏既有欧洲职业汉学家的学术成果可资借鉴，又有43年实地考察的资料积累，是时候该给中国一个盖棺定论了！

《中国总论》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

对此，卫三畏有十足的自信。但中国真是这样的吗？很快，越来越

多的汉学家将带着自己的眼睛，踏上那块古老的土地……

第四章
抢回来的学问



▲敦煌月牙泉

中国的衰败，给汉学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契机。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全世界的学者与探险家，都可以自由地前往中国领土从事考古挖掘和实地调查的工作。许多汉学家也因此成为探险家，数千年的文化遗存在他们面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在当时都被洗劫。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他们是在抢救文化标本。不过当他们不择手段地将中国的宝贝拿回去之后，他们又是当之无愧的专家，甚至是文化传播者，中华文明的魅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得到彰显。

这，的确需要理性和辩证地去看待。

沙漠中的夺宝竞赛

1907年3月的一天，沉睡在大漠中的敦煌尚未感受到来自春天的温暖。夕阳下，一行驼队在敦煌城外的古道上缓缓前行。

人们惊奇地发现，驼队中，竟然有几个金发碧眼的洋人！

这样的情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敦煌驼队

这群人来自英国，他们来中国显然不是为了贸易。此前，他们已在寒冷与饥饿中跋涉了数月的时间，穿过罗布泊，探访了神秘的楼兰古城。然而，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却是敦煌的莫高窟。

这支探险队的领队名叫奥利尔·斯坦因。

大英图书馆中文馆原馆长、博士 吴芳思

斯坦因是一个匈牙利人。他在德国学了梵文和印度的古代历史。之后他到印度去，当时印度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他在印度政府工作。



▲奥利尔·斯坦因

这并不是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探险。几年前，他走访了新疆的和田地区和尼雅遗址，收获了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关注。

此后，国际中亚与远东探险协会成立，列强们纷纷谋划各自的中亚探险计划，以期在未来的利益争夺中能做到胸有成竹。



▲奥利尔·斯坦因得到的文物

东方的天朝已奄奄一息，它无暇也无力顾及这片遥远的领土。

早在中学时，斯坦因就听说过敦煌，他的一个老师曾考察过千佛洞，这也是他与东方结缘的动机。

然而此时，相比于莫高窟的历史，藏经洞对斯坦因更具诱惑。之前，在与一位维吾尔族商人的交谈中，他得到了这样一个传闻：莫高窟有一个道士，几年前在石窟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间密室，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书。

5月21日，在全面考察完敦煌周边后，斯坦因直接将营帐扎在莫高窟下，焦急地等待王道士。他听说：另一拨实力出众的探险队伍也在中亚活动，此刻，他们或许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竞争者是一支来自法国的探险队。一年前，他们从巴黎出发，取道莫斯科一路东行，此时已到达新疆的库车一带。



▲奥利尔· 斯坦因探险队合影

考察队的队长名叫保罗·伯希和，出发的那一年只有27岁。这么年轻，凭什么担此重任呢？

1900年夏，北京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

这一天，拳民们围困了法国公使馆，一个法国青年突然冲出去夺取了一面巨大的义和团军旗。但在一次巷战的间歇，还是这位青年，却跑过去与拳民们席地而坐喝起了茶。激烈的冲突就此化解。

这位青年正是伯希和，当时他受命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在北京采购文物与书籍。作为汉学大师沙畹的门生，伯希和不仅深谙东方文化，而且极具语言天赋，掌握13种语言。而好胜的性格与冒险精神更是他从事考古天生的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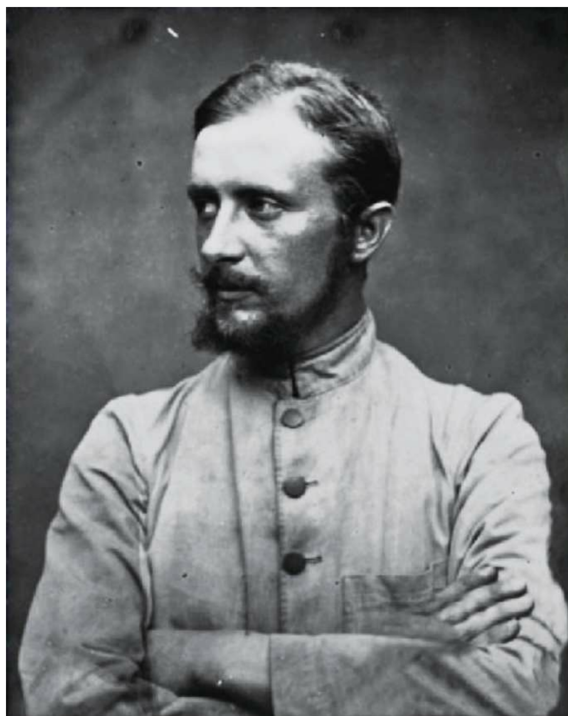
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 杜德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伯希和开

始了他的旅程。与此同时，也有别的国家进行着类似的历险，比如德国、日本、俄罗斯。当时法、德之间有着深厚的矛盾，学者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伯希和传记作者 P.Flandrin

伯希和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记住所有读过的文章内容。他们前往新疆之前，首先穿越了俄罗斯，到达布哈拉，并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月。在这期间他就和撒马尔罕人与布哈拉人学会了土耳其语。



▲保罗・伯希和

幸亏伯希和的考古队还在路上！

1907年5月底，在莫高窟斑驳的寺院门前，斯坦因率先见到了苦苦寻找的人，但斯坦因并不懂中文，只能通过雇佣的湖南师爷蒋孝琬与王圆箓交流。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冀青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在1899年或之前某一年，就云游敦煌的千佛洞。王道士就在原来居住过的下寺这一带的这几个洞窟里定居了，定居以后传道士刚好参加敦煌县（今属甘肃安肃道，编者注）乡绅组织的修复敦煌千佛洞活动。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柴剑虹

藏经洞是在他们清理洞窟的时候，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里面还有洞，打开以后里面有很多文献和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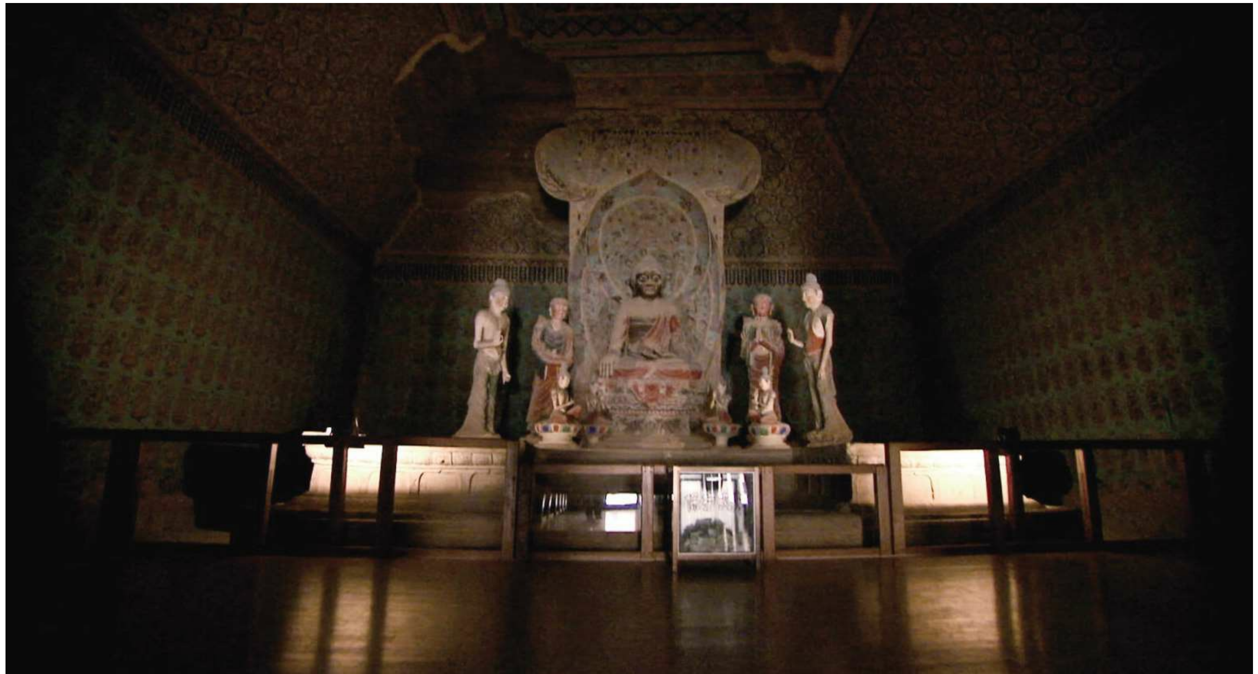


▲带领奥利尔·斯坦因进入千佛洞的王圆箓

斯坦因并没有立即请求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他发现，对于他的来历，王道士仍心存疑虑。于是，他让蒋师爷向王道士提出，能否考察一下千佛洞的壁画。

王道士同意了。

参观过程中，斯坦因在一幅壁画上恰好看到玄奘取经的故事。他灵机一动，自称来自遥远的印度，是玄奘法师钦定的追随者。



▲藏经洞

这让王道士既感到惊奇，又觉得十分亲近。

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梅维恒

当时的新疆并没有有效的警察秩序，即使是在甘肃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比如说，奥雷尔·斯坦因自称是玄奘的信徒，并通过各种办法以及贿赂等达成目的，而现在当地已经不允许这么做了。

一个漆黑的夜晚，虔诚而愚昧的王道士将斯坦因带到了藏经洞门口，亲手打开了大门。

借着摇曳的烛光，斯坦因兴奋地走进了阴暗的甬道。

“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

接下来的一周内，他与蒋师爷在甬道中一件件地拣选着王道士从洞中抱出来的写本和绢画。6月13日，经过反复交涉，斯坦因用相当于500卢比的40块马蹄银和一个严守秘密的承诺，换取了12大箱文物凯旋。



▲奥利尔·斯坦因满载而归的驼队

三个月后，1907年10月，在发掘了图木舒克与库车地区后，伯希和的探险队满载着十几个柳条箱的文物，终于抵达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

在这里，伯希和遇到了清朝的辅国公载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耿昇

载澜是嘉庆皇帝的曾孙，是光绪皇帝的堂弟。他是一个王公贵族，是一个八旗子弟，但是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授命他的），利用义和团来抗击洋人，是支持义和团的。后来义和团失败以后，外国人就提出来要惩罚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载澜。



▲清朝的辅国公载澜

伯希和传记作者 P. Flanderin

他们眼中，伯希和根本不是个外国人！他们之前还是交战的敌人，后来却成了朋友，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也就是这时，皇子载澜向伯希和介绍了敦煌，并向他展示了敦煌的文书。

这件礼品，更进一步证明了那个含混不清的传言——敦煌千佛洞的一名道士发现了一个藏满珍贵文物的耳室。

伯希和立即决定，放弃考察吐鲁番，即刻赶赴敦煌。

1908年2月，历经两个月的生死考验，伯希和一行终于来到敦煌。

望着眼前的石窟，伯希和惊呆了。一种来自历史、宗教和艺术的震撼力，猛烈撞击着他的心房。

这天晚上，伯希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伯希和传记作者 P. Flanderin

伯希和到了千佛洞以后，王道士并不在。他就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王道士。王道士告诉他："斯坦因来过这里。"伯希和就说："您给他书了吗？""对，我打开了大门。"伯希和问："为什么？"王道士就说："斯坦因非常慷慨。"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柴剑虹

伯希和和王道士说，老佛爷知道了壁画的事，很满意。王道士一听，他没有提到斯坦因，看来西方人确实守口如瓶，因此就放松了警惕。

几经交涉后，王道士再次败给了金钱的诱惑。

1908年3月3日，伯希和被邀请进入藏经洞。一人多高的大量经卷令他兴奋不已，他说自己见到了一座"中世纪图书馆"。

伯希和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捡着所有的文字宝藏，甚至创下了每小时检阅一百捆写卷的纪录，他戏称这"堪与行程中之汽车比拟矣"。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高田时雄

他在调查中发现，最晚的敦煌遗书为11世纪初期，他用历史知识推断，当时可能因为敦煌受到了西夏的进攻，敦煌的人为了保护藏经洞内的经书而关闭了藏经洞。



▲伯希和在藏经洞

“我没有放过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碎页断片。”伯希和说。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柴剑虹

伯希和与斯坦因不一样，斯坦因是把东西往外搬，搬出来以后让蒋师爷给他挑，挑完了他就拿走了，伯希和是自己进到洞里面，而且蹲在那里，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伯希和蹲在这个藏经洞里头点了一支蜡烛，蹲了三个星期。

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带走所有的资料，于是在挑选的时候，他为自己订立了几则标准：一是要标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是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

三个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以五百两银子的香火钱，伯希和换取了装满五千余件写本和绢画的十个大木箱。

又一支驼队，从莫高窟满载而归。

敦煌，作为一门学问

2014年，法国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200周年。

20世纪初叶，战乱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让汉学迈入实地探险的新阶段。同时也有人开始思考，在这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潮中，作为其朝圣之地的中国，除了被动地提供“原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1908年年末，途经北京时，伯希和办了一个小小的展览，将手中的敦煌写本拿给中国的学者们鉴赏，这些人里面，有罗振玉，也有王国维……



▲罗振玉

中国学者第一次亲眼见到藏经洞的文物。国学大师陈寅恪叹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认为：“正是由于敦煌写本，我们才可以采用比通过历史书籍更直接得多的方式，触及了中世纪中国一个地区的真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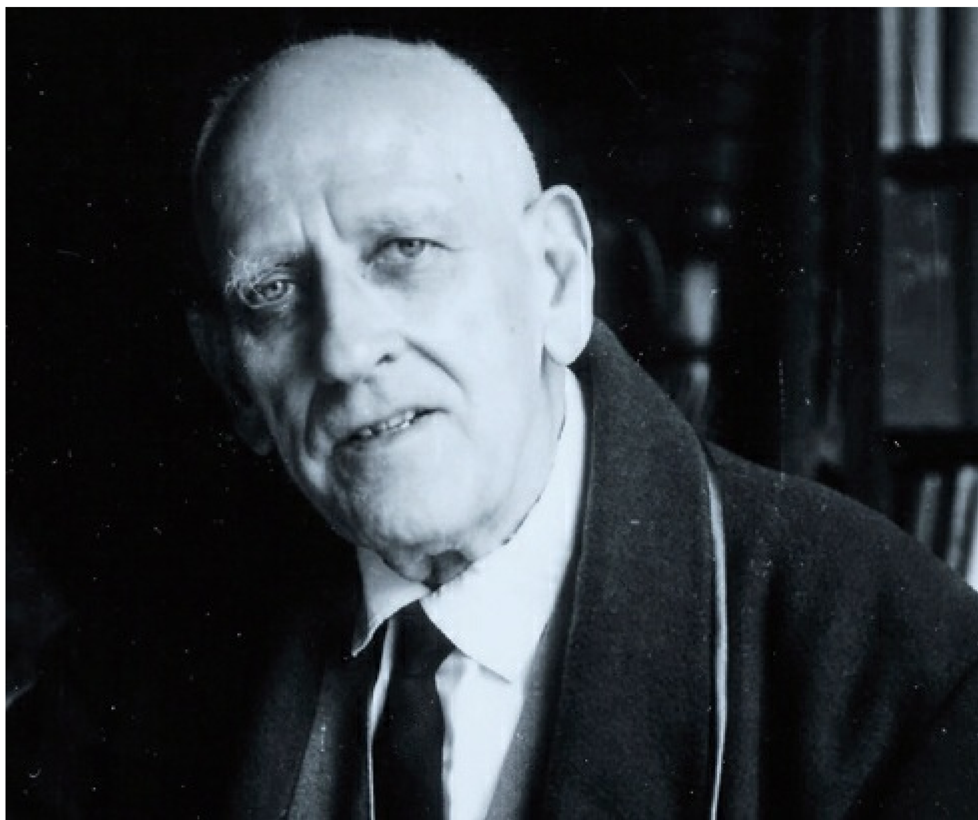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高田时雄

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大量敦煌遗书带回国，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伦敦、法国等地极其完好地保存了敦煌遗

书，利用过去100年敦煌的历史，获得了极其宝贵、出色的成果，这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陈寅恪



▲戴密微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柴剑虹

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拍了照，有了资料，拿回来在国内出版，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学者，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陈寅恪先生讲的“伤心史”这么一个地位，我们已经全面掌握这些资料，而说白了，就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对这些资料，才是能够真正地深入研究的。

100多年来，敦煌学界乃至整个世界在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敦煌邂逅斯坦因与伯希和，究竟是幸，抑或不幸？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争论可能永远无法消除。但无论如何，保护好这枚硬币才是关键。其实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对文化心存敬畏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否则，失去了历史，也终将失去未来。

1909年春，巴黎，法兰西公学。

在主持完一场精彩纷呈的汉学讲座后，沙畹教授收到了一件发自伦敦的包裹。那是一个硕大的木箱，沙畹满怀好奇地将它打开，箱子中堆满了陈旧的简牍与泛黄的经卷。

这是斯坦因博士在前两次中亚探险中收集的考古资料，其中包括在敦煌得到的一部分极其珍贵的写本。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英国人为何会将千辛万苦收集的珍贵文物交给竞争对手呢？

大英图书馆中文馆原馆长、博士 吴芳思

20世纪初，英国的汉学家基本不懂古代汉语，也不懂佛教的文献。斯坦因有一个习惯，他总是要学者看看他带回来的材料、总是研究和发展汉学的知识，等等。沙畹当时可能是欧洲最好的古代汉语专家，所以斯坦因专门给他带回来很多考古资料。

沙畹，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整理和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

一年后，他将近千件简牍的释文和注释交给了斯坦因。1913年，经过两人协商修改，这批文献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

对此，日本的中国简牍学创始人大庭修，做出了很高评价：“接触到原简以后，我深深感受到，发表了首次释读汉简结果的沙畹教授有卓越的才能，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法兰西公学



▲沙畹

诚然，沙畹卓越的才能与他在法国接受的正统汉学训练有关，但如

果没有之前在中国考察的感性认识，沙畹也不可能成为一代汉学泰斗！

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 杜德兰

我认为沙畹在法国汉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因为他是怀着研究中华文明目的前往中国的第一人。之前，人们到中国都是为了传教，或者是履行外交使命等。但是沙畹的首要目的就是了解、研究中华文明。

1889年初，也就是中法战争结束的四年后，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沙畹被外交部派往北京的驻清公使馆，得到一个散编随员的头衔。虽然任务只有一个——进修汉语，却铺开了沙畹探索中国文化的道路。

三个月后，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沙畹开始译注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之中的《封禅书》。

法兰西公学汉学研究所所长 魏丕信

沙畹是投入这项浩瀚工程的第一人，因其过早离世，这部鸿篇巨制最终没能得以完成。第一本《史记》的英文版完整译本大概是10年前问世的，所以沙畹比它要早很多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1907年6月，为了验证《封禅书》的记载，沙畹与阿列克谢耶夫结伴，再次登临泰山。

阿列克谢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曾在巴黎师从沙畹，在俄国汉学界享有“阿翰林”的美誉。在《1907年中国纪行》一书中，阿列克谢耶夫记载了跟随老师考察泰山的情形。

“任何方法都可以称得上是好办法：法师作法驱鬼、拜祭佛祖、奉祀三清、祈求所有的神灵，没必要考虑他们的来历。泰山之行使我们获益匪浅。泰山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类宗教赖以存在的理由是多么简单。”

他们花了两天的时间登上了泰山，沿途众多的庙宇中供奉的各路神灵，甚至是讨饭的乞丐，都成为他们理解中国文化最直观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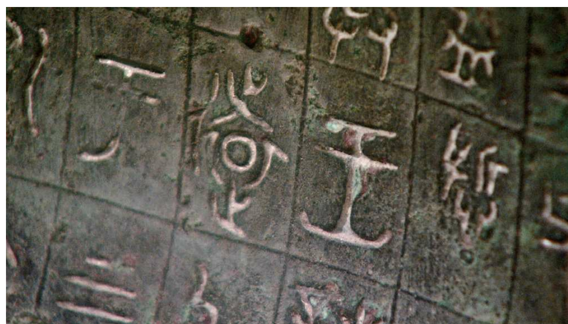
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 杜德兰

沙畹的做法很独特，他借助了当时最先进的手段，比如使用相机。沙畹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他使用了一些中国通常不使用的材料，帮助自己理解古代中华文明，也就是金石学。

金石学又称碑铭学，主要通过青铜器、石器、竹简等文物，特别是上面的文字铭刻及拓片，以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与敦煌文物异曲同工的是，这些真实存在的遗迹，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与那些印刷品中的文字材料相比较，显得灵动得多。

沙畹完成了一次颠覆性的尝试。对于欧洲汉学来说，它开启了汉学界运用近代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先河。



▲金石学（鼎文）

沙畹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发表于1919年的《投龙简》。

投龙简是一种道教礼仪，即古人将祈愿文书铭刻于金石之上，然后在泰山等名山大川，将金属牌上的愿望投入洞穴、峡谷或泉眼中，人们认为随祭文一同投掷的“龙”会将祷告上达天听。

汉学家 施舟人

沙畹就意识到这是在别的地方、别的（文

明）板块很罕见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中国对自然环境，不是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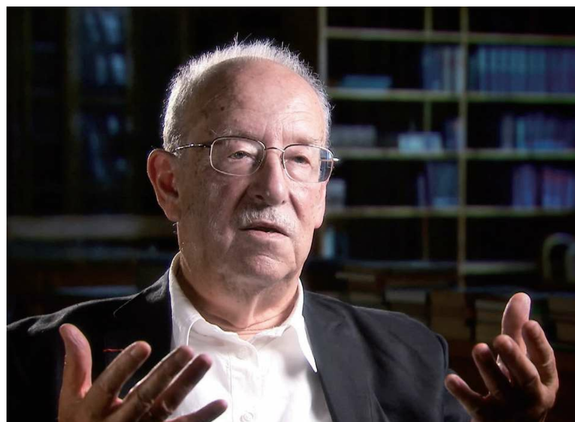
灵魂，而是对自然的灵魂有一种很深入的崇拜和爱，所以他就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投龙简

1918年1月，53岁的沙畹在巴黎病逝。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在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际，终止了工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在沙畹之前，西方的汉学家或是终身坐在书斋中钻研中国经典，或是利用在中国工作的闲暇来触摸中国。从沙畹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施舟人

实地考察与典籍研究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成为法国汉学的“法宝”。

法国汉学也由此从东方学的框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埃及学、希腊学、罗马学等比肩而立的专业化学科。

万马齐喑究可哀


▲葛兰言

沙畹去世那年的9月，当巴黎学术界沉浸在失去沙畹的沉痛中时，数千公里外的西伯利亚，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伊尔库茨克·葛兰言正在军中以东方学者的身份担任幕僚。

在应对军务之余，葛兰言完成了一部研究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在书的扉页，他写下一句献词：“纪念沙畹与涂尔干”。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
Remi Mathieu

葛兰言将这本书敬献给两个人：一位是爱米尔·涂尔干，法国社会学流派之父，第二位是爱德华·沙畹，他的汉学导师。这题词意义十分重大，显示了一方面他注重社会学分析，另一方面，这种分析的基础是对中国文人的传统批评法、传统语言学和知识，正如沙畹之前的做法。

葛兰言最初的学术兴趣是日本的封建制，为此，他首先开始涉猎中国。但是，他的老师沙畹却对他提出忠告：“以中国作为研究日本的第一步，十分必要。但是你有可能被深深地卷入中国，甚至再也无法抵达日本。”

1911年，得益于政府的一份奖学金，葛兰言开始了在华考察的旅程。

那一年，是农历的辛亥年，革命的火种在华夏大地掀起燎原之势，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新旧交替之际，中国正踟蹰前行。

对于葛兰言来说，即使沦于落后，这片土地依旧散发着魅力。他相信，在颓败的表面之下，一定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极具爆发力的文化内核。他试图抛开物质层面的纠缠，去探索整体的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人的心灵和习惯。

但正如沙畹所预料的，从此中国成了葛兰言的一切。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 于连

他总是会问：社会是什么？礼仪是什么？亲缘是什么？他把这些问题带到了对中国的研究上，把这些问题与他对中国的发现结合起来。这正是葛兰言的价值所在，他仅仅是个汉学家。

1920年夏，在巴黎大学主持完“中国文化”的讲座后，葛兰言与一位名叫李璜的中国学生一起走出校园。两人一路走，一路谈，从圣米歇尔大道直到葛兰言家的门前，又谈了一会才互相道别。

多年后，已成为著名学者的李璜回忆道：“我们所谈的，大半是古中国的神秘故事和古希腊神话的比较。我谈一个古中国的神秘故事，葛兰言先生必定举一个古希腊神话来附会其说。他谈古希腊神话时，我也必定要讲一些古中国的神秘故事来比附。”

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1924年李璜回国。不久，《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一书出版，这被称作是葛兰言用力最深的代表作。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 Remi Mathieu

葛兰言要专门研究神话故事，了解每个故事对应的是哪种宗教活动、哪种社会活动，以及古代中国人是怎么表达感情的。

1940年6月，战火席卷巴黎。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国人，拥有300万军队的法国在总理贝当的带领下选择了投降，成为纳粹旗下的“傀儡政权”。

11月25日，闻讯后的葛兰言，竟一气身亡，享年56岁。

法国乃至欧洲汉学，被战乱时期的极端政治所裹挟，学术研究受到限制。巴黎学术界罩起了一片阴霾……

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法兰西最高的人文学术机构，40个固定的院士席位，属于法国最杰出的学者。自1663年成立以来，350多年间，在例会上，院士们都必须西装革履。这既是形式，也是内容。


▲马伯乐

1944年，一次寻常的例会却迟迟无法开始。经过一番徒劳的等待，一向守时的院长马伯乐教授缺席了。

原来就在凌晨，有着犹太人身份的马伯乐夫妇已被德国纳粹以“恐怖活动嫌疑”的罪名逮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

专业研究的缘故，我对他怀有比较崇敬的心情，我自认为这个人的思维跟中国的朴学的研究完全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跟乾嘉学者那种考证方法是完全一样的。我认为他学习中国经典的时候是很努力的，所以他对中国的上古史、对中国的语言、

对中国的宗教的研究，都很深入。

1921年1月，马伯乐继承其师沙畹任法兰西公学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主讲人。他的第一堂课，讲的就是沙畹的研究成果。

对一个学者来讲，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也就有了一切。

法国远东学院院长 傅飞岚

马伯乐是道教研究的先驱，不仅仅是从很多技术领域，比如养生学。当时，不单他所研究的技术领域无人关注，就连整个道教的理念都无人涉足。



▲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

马伯乐关于道教的开创性研究，后经他的同事们整理，以《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为名出版。但马伯乐没能看到这一天。

1945年3月，也就是被捕的7个月后，不胜劳顿的马伯乐病倒了。握

惯了钢笔的手已拿不起十字镐。3月中旬的一天，这位出色的汉学家在屈辱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此时，距盟军解放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还剩不到一个月。

据幸存的难友回忆，在集中营的牢房，消瘦憔悴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仍然兴致勃勃地和朋友谈起在远东的经历。

1945年8月，胜利的曙光洒向世界，整个巴黎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

而此时，巴黎汉学却收到一个噩耗。10月29日，伯希和因病永远闭上了双眼。至此，继沙畹之后法国三位有影响的汉学大师先后弃世。他们的辞世，瞬间给处于鼎盛状态的法国汉学造成了巨大的真空。另外，世界性的战争也使中西沟通和人员往来受到严重的阻碍。纽带中断，汉学研究已成无源之水。

万马齐喑究可哀。这样的局面，何时才能休止呢？

戴密微：“我们的光芒”

1944年8月29日傍晚，巴黎解放后的第五天，散步归来的戴密微教授惊诧地发现，刚读过的那本《汉书·食货志》上，一枚弹孔赫然在目。

法国汉学是幸运的，因为，这枚子弹击中的是这本书，而不是看书的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杨国桢

戴密微出生在瑞士山区的洛桑，他师从法国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沙畹，还有梵文家列维这些人学习汉语和梵文。他从学校毕业以后，就被派到法国远东学院。因为他们是东方学家，研究中国一定要到实地，所以他就在1921年的6月来到中国。

首次赴中国考察，戴密微得以参观云冈石窟、孔林、孔庙以及泰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引起这位年轻汉学家的浓厚兴趣。

1924年，在远东学院的聘任期结束后，戴密微接受了厦门大学的邀请，开设了形式极其丰富的课程：法文、印度文明和佛教史、中西文化关系史。

在这里，他还碰到了同为讲师的鲁迅。

汉学家 汪德迈

戴密微在中国的主要时间是在鼓浪屿和福州。我记得戴密微经常跟我说他是如何在鼓浪屿碰见鲁迅

的，在他的记忆中，鲁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博学，但脾气很坏的人。



▲汪德迈

戴密微之女　　Jeanne-Marie Allier

我觉得评价一个人的工作是很难的事情。中文当中最吸引我父亲的，是诗歌和佛教文化，这也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

1946年秋，法兰西公学，因马伯乐教授离世而空缺了两年的中国语言文化教席由戴密微接替，他是沙畹最小的弟子。在这个职位上，戴密微讲授了18年。他被法国汉学界誉为“我们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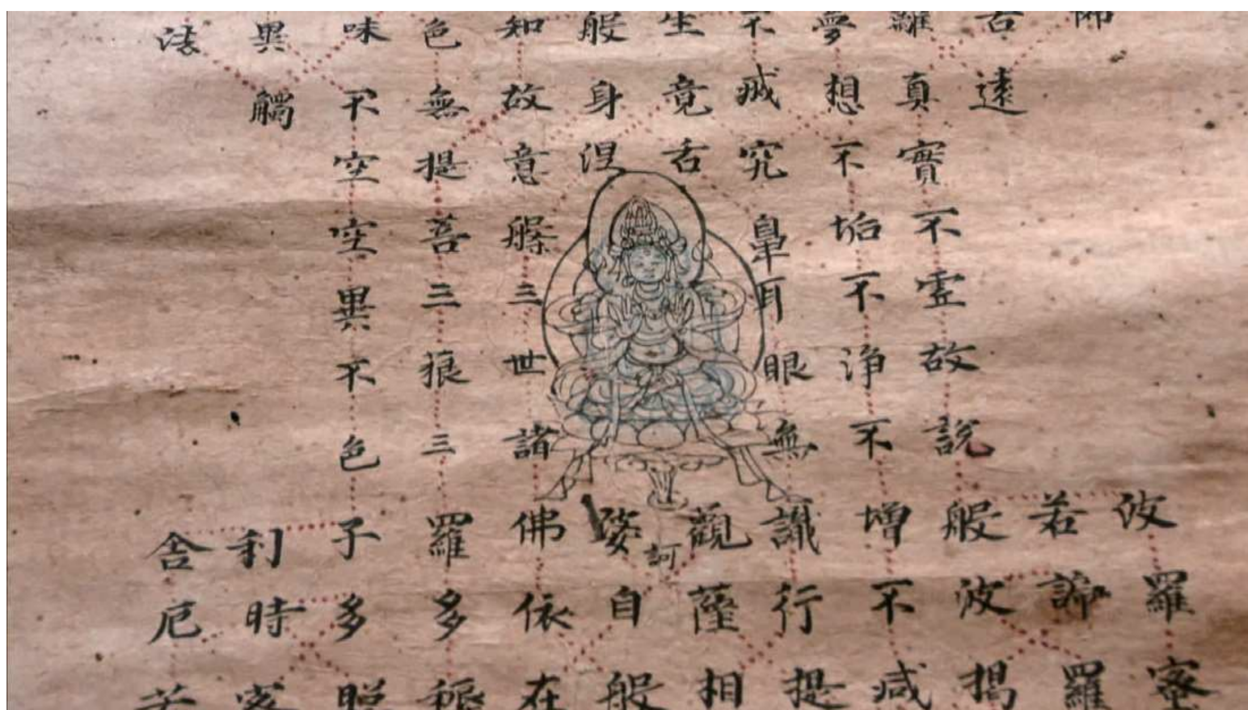
从远东回到巴黎后的近20年间，戴密微对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做了一次通览。他所著的《吐蕃僧诤记》一书，资料丰富，注释详尽，被认为是敦煌学、佛教学和藏学的代表性著作，迄今仍是中世纪印度、吐蕃和中国佛学研究者们的必读书目。



▲法国国家图书馆

1956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已是欧洲汉学权威的戴密微与香港学者饶宗颐一见如故。会后，他特地陪同饶宗颐游览了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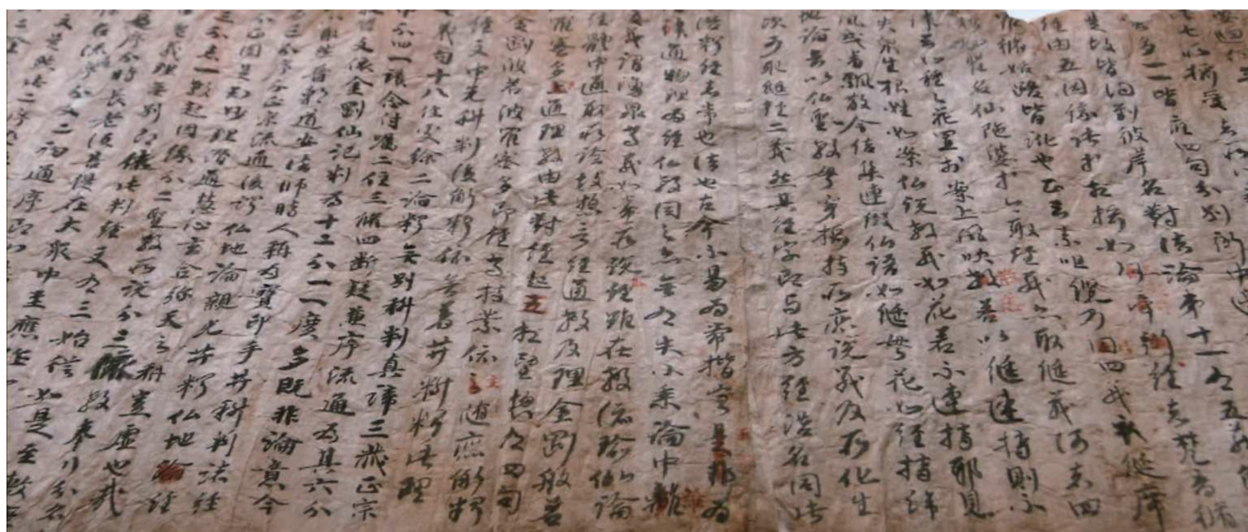
在这里，饶宗颐第一次亲手触摸了敦煌写本的原件。



▲敦煌经卷之一

汉学家 汪德迈

在伯希和之后，戴密微继续研究这些文字，把它们编写成册，并致力于其出版。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这些文字很多都是手写的，很难辨认和翻译。所以，对这些敦煌手稿的编纂工作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敦煌经卷之二

汉学家 施舟人

他常和我们来往，与我们保持关系，而且饶宗颐跟戴密微的友谊很深，还一起研究发表文章，这也是欧洲汉学一桩美谈。

1965年冬，饶宗颐应戴密微的邀请，再赴法国。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他与戴密微专门研究敦煌写经、画稿，并校勘了敦煌曲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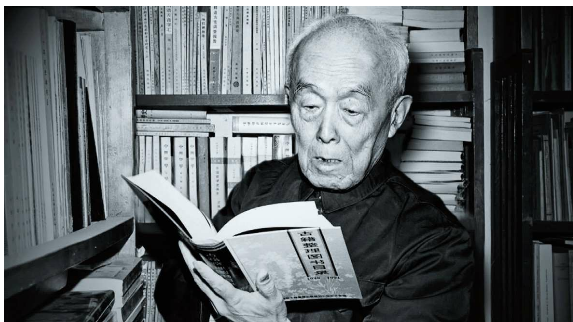
1971年，中、法文合本《敦煌曲》在法国出版，它为研究唐代由西域经敦煌传入中原的乐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或许，他所指的不仅仅是敦煌学。两百年，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汉学不但没有被战乱切断，反而在不断的交流与合作中走向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境界。

失落的文明，都是用心找回来的。

汉学家 施舟人

文化的发展是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没有交流，但是如果没有交流就更没有发展。


▲季羡林

晚年的戴密微最大的心愿，是到中国浙江去看看谢灵运故居的山水。他在法兰西公学开设的最后一次讲座的题目是《谢灵运研究》。

1966年，春日的阿尔卑斯山一

派生机勃勃。戴密微与饶宗颐结伴同游，游毕，戴密微题诗云：

儿时闲梦此重温，

山色终非旧时痕。

爱听清湍传逸响，

得从峻调会灵源。

此刻，他心中挂念的依然是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名胜。从谢灵运起，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而戴密微以丰富的汉学知识和坚强的意志，力排万难，为法国汉学在战后的振兴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五章
双头鹰，凝视着东方和西方



▲圣彼得堡大学

双头鹰，俄罗斯的象征，它代表着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如今，这一标志性的图腾，浇铸在俄罗斯的国徽上。

17世纪，俄国开始崛起，然而，领土的广阔并不能掩饰制度的落后，贫困的现实也无法抑制对于美好的向往。于是，俄罗斯帝国一面注视着西方，一面凝望着东方，吮吸着东西方的养分，羽翼逐渐丰满。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俄罗斯汉学应运而生，它宛如一把钥匙，帮助俄国打开了那扇古老的大门，为双头鹰的腾飞指引着独特的方向。

康熙与彼得，两大帝王的布局

1698年春季的一天，正在维也纳访问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接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报："据北京消息，那里的俄国战俘和一些从俄国去的人建了一座教堂，请求派有学问的教士前往传教和主持教务。"

略作沉思，彼得一世随即批示："这事很好，但为了上帝，行事要谨慎，不要鲁莽，避免与中国官员有任何冲突。"

北京，哪里来的俄国战俘呢？



▲"关帝庙"北馆筑群之圣母安息堂

10年前，1689年，中国军队以武力收复了被俄国占据的雅克萨城，俘获了109名战俘。其中，有59人表示归顺，自愿前往北京。

为表怀柔，康熙帝特地将一座关帝庙赐给他们，作为这些东正教徒的临时祈祷之所。这就是密报中所说的一座教堂。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米亚斯尼科夫

康熙是中国的一位非常强势的统治者。他有欧洲耶稣会教士做谋士，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有俄罗斯人的代表。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明滨

经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的文书磋商，中国同意俄国派出一个东正教使团常驻北京，且每一届使团驻北京十年。

事实上，驻华宗教使团也就是沙皇在中国的特派员，他们的职责是为“在北京的俄国人提供宗教服务，传递关于中国的一些消息”。从1715年开始，一届又一届的宗教使团在北京过着寂寞而孤独的日子。

时光就这样又过去了将近100年。

1799年秋，俄罗斯喀山神学院，两名青年教师——比丘林和他的表哥，陷入了痛苦和迷茫中：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

喀山神学院神父 安冬尼·耶尔穆什

兄弟俩约定，他们要把选择权交给女孩，让她从两人中选择一个，而另一个则顺从天意，出家为僧侣。

1808年春，一位身着中式长袍，自称“何先生”的外国人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北京的货摊、店铺和集市中。他不厌其烦地把感兴趣的物品记下来，然后请中国人用汉字一一标注名称。

“我决定用这样的方法编写一部汉俄词典：购买所有的矿物、植物和动物，再开辟一个植物园。在我

编写的词典中，不但要解释词义，还要描述外表和性质，介绍中国的各种宗教和礼仪，习惯和习俗，手艺和工具”。

这位“何先生”，正是比丘林。

此时，他的身份是俄罗斯第九届驻华宗教使团的团长。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明滨

比丘林来中国带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调查和了解中国的国情。但是一到中国以后，他就很受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还有辉煌灿烂的文明所吸引。



▲比丘林

1821年5月，比丘林结束了13年的北京岁月，带着12箱汉文和满文书籍、1箱手稿、1箱染料和6卷地图，启程回国的比丘林仅行李就重达6500千克，为此，他雇了整整15头骆驼。

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审判。

拉多加湖，欧洲最大的淡水湖。600余座大大小小的岛屿遍布湖中，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瓦拉姆岛。

瓦拉姆修道院始建于14世纪。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东正教徒们参观、朝拜。但在200年前，这里却是一座监狱，专门囚禁犯有宗教罪行的信徒。

1823年9月，瓦拉姆修道院又迎来了一名新囚徒。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明滨

比丘林驻华共14年，他不但调查中国的国情，不但看书面的东西，而且到社会去调查。

喀山神学院神父 安冬尼·耶尔穆什

但这样实质上就偏离了向中国民众传播东正教的初衷。这让彼得堡的教会领导大为不悦。

比丘林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写给某位高官的申辩信中，比丘林说："我不想给人留下不谦虚的印象，但如果让我为自己说句公道话，我可以说，在研究中国的13年里，我一人所做出的成绩，是使团在过去的100年间所有成绩的5倍"。

显然，比丘林并没有夸大自己的学术成就，但凡接触过他手稿的人，无不对他的中国学问钦佩有加。

有些官员也试图为比丘林申诉、求情，包括俄罗斯外交大臣就曾经专门上奏沙皇，希望能对比丘林免于处罚。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宽待其著作而削弱法律，并非公正之举。"

1826年冬，一束幸运的阳光照进了瓦拉姆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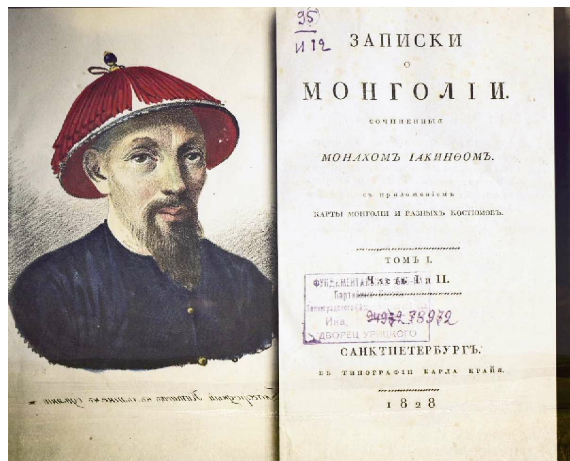
随着中俄贸易成为俄国重要的财政支柱，俄国政府逐渐地意识到，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方能保证帝国在东方的利益长久地持续下去。而现实却令人尴尬：即使来自中国的官方文书，也缺乏翻译与解读的专门人才。

在俄国外交部的斡旋下，被监禁了三年多的比丘林返回圣彼得堡。他有了一份世俗的新工作：外交部亚洲司中文翻译。

两年后，《蒙古札记》出版。这是比丘林的第一部原创著作。

很快，这部著作被翻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一场辩论哗然而起。

德国汉学家柯恒儒批评比丘林盲目相信中文史料，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而比丘林却反驳道：“如果没有中国史料的详细记载，我们对蒙古人的历史又从何而知？”



▲比丘林《蒙古札记》

俄罗斯汉学以这样一种方式登上了世界学术舞台。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米亚斯尼科夫

要读懂中国历史和它的多样性，必须要学习汉语。他是第一个掌握汉语的俄罗斯人，也是将汉语翻译成俄语的第一人。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 伊琳娜•波波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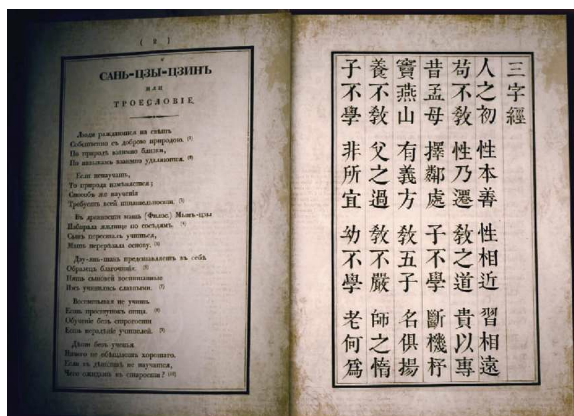
比丘林来到中国后首先重视对满文和蒙古文的资料的研究，后来开始把中文翻译成俄文，是真正的研究中国的大作。所以，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贡献。

1829年，俄国人第一次在印刷品上见到了汉字。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比丘林介绍说，“《三字经》解释了对所有欧洲人来说难以理解的中国人的哲学概念。”

在《文学报》上，比丘林好友


(2)

САНЬ-ЦЗЫ-ЦЗИНЪ

или

ТРОЕСЛОВІЕ

三字經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苟不敎 性乃遷 敎之道 貴以專

昔孟母 擇鄰處 子不學 斷機杼

竇燕山 有義方 敎五子 名俱揚

養不敎 父之過 敎不嚴 師之惰

子不學 非所宜 幼不學 老何爲

▲比丘林译中俄对照版《三字经》

普希金热情洋溢地评论道：从《三字经》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德行和智能。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雄浑素朴令人惊叹！

恰克图，俄国边贸重镇。

1835年5月18日，比丘林的身影出现在恰克图汉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22名学生都是商人子弟，年龄从7岁到21岁不等。

作为汉语教师的比丘林致辞说，“我所接受的使命，是监督初期的教学和制订教学计划。”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博士 马克·乌里扬诺夫

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以同时代中国的启蒙教科书为原本，编写了新的汉语教材。这对于学生来说容易理解，而且十分有趣。

俄罗斯人找到了认识中国的钥匙。1839年，《汉文启蒙》获得俄罗斯学术大奖，并被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用作汉语教科书。

比丘林神甫在知识阶层广为人知，他被冠以“我们引以为荣的汉学家”的称号，经常出现在文化名流的沙龙中。他总是神采飞扬地向大家介绍自己所看到的，不同于欧洲传教士描绘的，一个文明而法制完备的中国。

他甚至认为，“耶稣并不一定比孔子高明”。

俄罗斯汉学的崛起

1832年的一天，喀山宗教学校一堂名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历史课正在进行。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比丘林："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黑暗局面，也创造了一个时代。"

传奇的故事，令一位15岁的少年激动不已。7年后，1839年8月，圣彼得堡神学院的一名青年秘书收到了一封期盼已久的批复，他自愿加入北京宗教使团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巴拉第，这位因比丘林的故事而激动不已的少年在22岁时也踏上了去往北京的人生旅程。



▲巴拉第

1842年春，北京第十二届宗教使团团长图加里诺夫在一份信函中写道，"巴拉第以罕见的狂热，深深地沉迷于佛教研究，进展显著。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又是摘录，又是翻译，忙个不停"。

在宗教使团中，与巴拉第同样狂热的，还有一位来自喀山大学的硕士留学生瓦西里耶夫。在北京，两个年轻人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博士　马克·乌里扬诺夫

如果说比丘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推到了世界水平的人，那么瓦西里耶夫则堪称整体科学研究方向和科学学派的奠基人。

来北京的途中，瓦西里耶夫记录了自己的心情：“我头脑中满是计划，哪怕让我完成1/10也好。上帝啊，真是想品尝成功的美酒。佛教理论、藏语是我的学习计划。不仅如此，我的计划中还包括研究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学的中国文化。”


▲瓦西里耶夫

然而，现实对瓦西里耶夫有些残酷。他既不是教会派出的神职人员，也不是外交部选拔的随团学员。“藐视非宗教人士”的使团团长不仅不待见瓦西里耶夫，甚至拒绝给他提供基本的学习条件。

“大家都不快乐，尤其是我。当然，我没被鞭打、体罚过，但更糟糕的是要承受排挤和侮辱。喀山大学为我在中国的学习提供资助，可没有团长的首肯，我一个戈比都不能动用。”

而此时，70岁的比丘林也深感力不从心，他将168部图书和大量的手稿，寄给了自己的母校喀山神学院。

1851年，比丘林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古代中亚民族资料汇编》出版。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比丘林翻译、编辑、注释和附录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长达1000余年的中国边疆民族史。

当这部巨著出现在德国汉学家柯恒儒面前时，这位一直对比丘林持批评态度的同行感叹道：“比丘林神甫一个人做了整个学术界才能做的事”。

1853年6月4日，在这座修道院中，比丘林孤独地离世。“无时勤劳、垂光史册”这八个汉字守护着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汉学家。

1850年9月，33岁的巴拉第以第十三届宗教使团团长的身份，再次来到了北京。在他的倡导和直接参与下，1852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论集》在彼得堡出版。

此后的14年间，《成员论集》一共出版了四辑，成为沙皇俄国时期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唯一一份连续出版的专刊。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开科

马克思写《资本论》，里边出现了清代的一个中国官员，就相当于我们财政部副部长，叫王茂荫，那是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著作集。

1851年1月，瓦西里耶夫又回到了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

他首要的责任是教会学生掌握汉语。虽然比丘林的《汉语启蒙》基本解决了汉语语法问题，但如何有效地记忆这种语素文字却始终是挡在俄国，乃至整个欧洲汉语学习者面前的最大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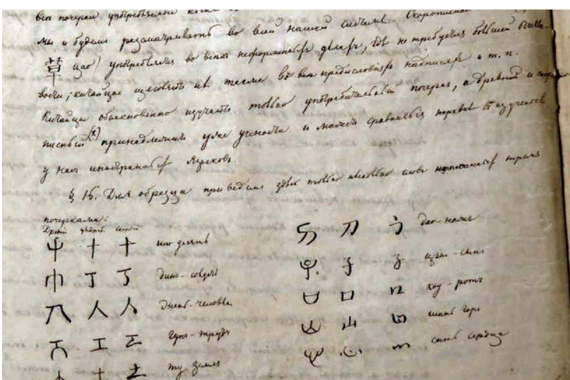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 索嘉威

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个写中国文学史的人，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造词典的方法。我们外国人不会中文，也不知道偏旁部首等，更不知道这些汉字怎么读。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博士 马克·乌里扬诺夫

瓦西里耶夫制定了自己的一套按照偏旁排列的汉字分布体系，即先按发音，再按汉字的字形来查词。这种查词方式有很大的优势。

“每年我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汉字排列的各种方案。我觉得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好似在给汉字排列字母表一样。”瓦西里耶夫写道。



▲《汉字笔画系统》手稿

12年之后，1866年，瓦西里耶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语言著作《汉字解析》，紧接着又推出了与之配套的《汉字笔画系统》。直到今天，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都在感受着瓦西里耶夫带来的方便。

1855年，瓦西里耶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在最初的12年间，他是这里唯一的专业教师。

“我不能全身心地奉献给语文课，因为我还应当做一名历史学者；我不是历史学者，因为我还要做个地理学者；我不是地理学者，因为我还应该了解文学；我不是文学史家，因为我不能不关注宗教。”

1857年，一部令瓦西里耶夫“心潮澎湃”的著作——《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的第一部分出版。很快，这本书被翻译成德文，获得了欧洲同行的普遍认可，并被看作是当时佛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米亚斯尼科夫

遗憾的是，他写了很多关于佛教的书，并把这些书的手稿放在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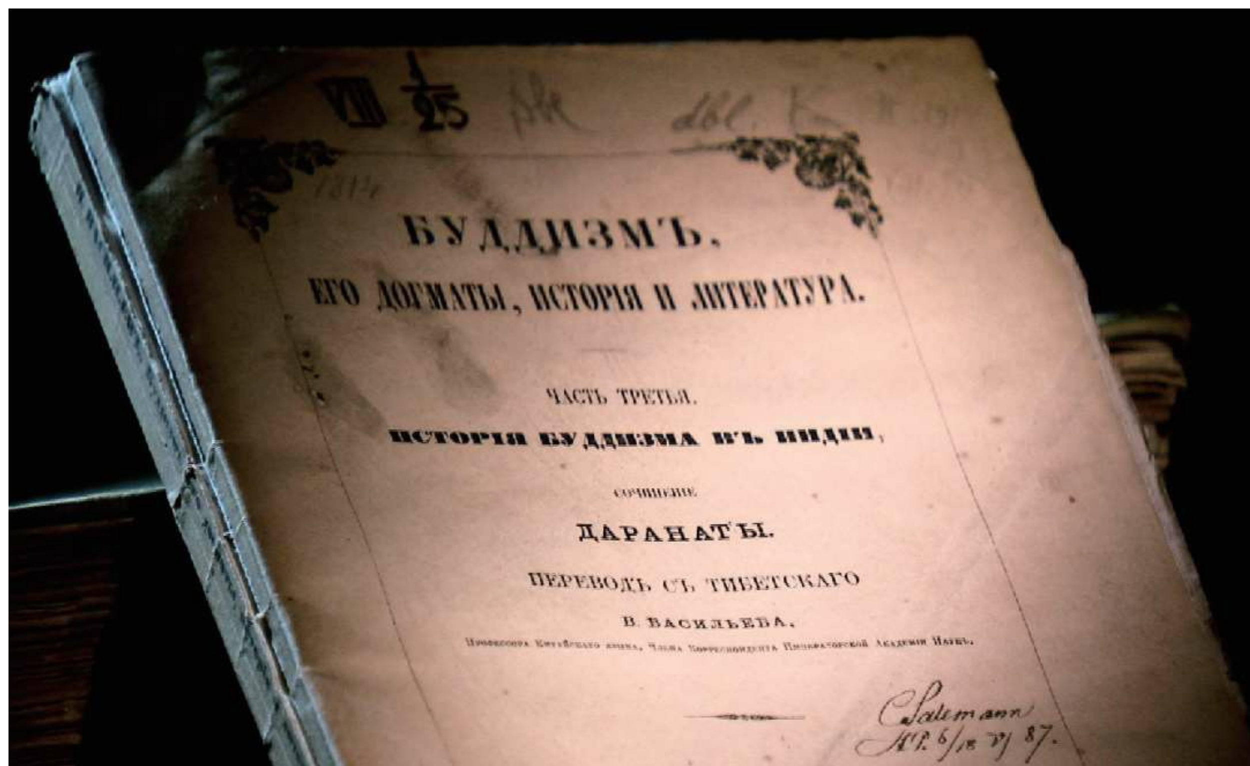
单独的房间里。而女仆不知道这是有用的东西，就用这些纸去生炉子，结果把这些佛教手稿几乎都给烧了，这对瓦西里耶夫来说是个大悲剧。

1871年春天，北京。巴拉第谢绝了一切社交活动，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我的身体不好，看来今年可能还编不完我的汉俄词典”。

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878年12月6日，在取道法国马赛回国的途中，巴拉第——这位在中国生活了31年之久的俄罗斯汉学家，溘然逝世，享年61岁。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1888年9月，《汉俄合璧韵编》经瓦西里耶夫的学生增补、完善，由北京的同文馆出版。



▲《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

▲《汉俄合璧韵编》

这部中俄辞典分上下两卷，共收编了11868个汉字。而在每一个汉字下，都有大量的词条。实际上，《汉俄合璧韵编》就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

这部中俄辞典在世界汉学中心法国获得了神话般的敬仰。沙畹说：“当中国的辞典也不能提供帮助时，巴拉第的辞典就是最后的论据。”伯希和则要求法兰西学院的学生必须学习俄语，其目的就是能够使用巴拉第的辞典。

“阿翰林”：中国年画的第一个推手

1898年春，一位名叫阿列克谢耶夫的年轻人，走进了瓦西里耶夫的课堂。此时，老学者虽已退休多年，但仍坚持着为汉语专业的学生授课。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 索嘉威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怎么开始学中文？其实开始时，他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兴趣。后来的选择，多少都有一些偶然性。他那时候对于中国没什么兴趣他拿了一个钱币（抓阄），“中文”，好嘞。去了学中文。



▲阿列克谢耶夫

1907年的春天，一支法国考察队出现在中国的华北地区。队伍中有一位年轻的俄国人，他就是阿列克谢耶夫。三年前，他在法国游学时，结识了考察队的队长、法国汉学家沙畹，遂投其门下。

沙畹的考察主题是野外考古，而阿列克谢耶夫却希望能在城镇和乡村多停留，因为“那里有年画，也有题字，还有庙宇”。年画引起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买了上千张年画，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年画。”



▲阿列克谢耶夫收藏的中国年画

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年画的重要性不亚于敦煌壁画。“这些年画，是中国人凄惨生活中的快乐和装饰，是他们内心中对于美好的向往。”他相信，在这些廉价的年画中，可以挖掘出中国“深厚的民族传统”。

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

他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中国木版年画的专家和学者，收藏了中国的年画数千幅。当身为中国人的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木版年画当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大量地收集、保存、研究这些东西了。

1910年，阿列克谢耶夫回到母校，属于瓦西里耶夫一代的汉学家都已逝去，他接过了前辈们的教鞭。

此时，在中国、在俄罗斯，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即将爆发。

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历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1917年11月，俄罗斯的历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诞生。

从1922年到1937年，阿列克谢耶夫陆续推出了他的中国文学译著《聊斋》系列。随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一个个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陆续出现在俄罗斯读者面前。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东方与希腊文化学院院长 斯米尔诺夫

中国诗歌的每个词语，他都结合大量上下语境进行分析，并把这些上下文一一列举在自己的书中。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学者们独特的“汉学圣经”。

优美的译文和准确的解释让人真切感受到了来自中国文学诗歌的魅力。对此，阿列克谢耶夫谦虚地说：“我只是为汉语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俄语外衣。”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明滨

他是一代宗师。什么叫汉学？什么叫俄国汉学？这要从阿列克谢耶夫开始算，他是俄国第一个把俄国汉学跟世界汉学接通的人。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米亚斯尼科夫

学习汉学既要理解个别特征，也要理解它的整体。这就是阿列克谢耶夫伟大的地方，他将中国文化当成世界文化的一个部分来看。

1944年8月，长达三年之久的列宁格勒(现在称为圣彼得堡，编者注)保卫战胜利结束。

63岁的阿列克谢耶夫怀着巨大的热情，开设了一个长达四年的专题

讲座——“汉学工作者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以其文化回答了常常困扰人类智慧的大部分问题，同时，她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近水楼台先得月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贺新中国成立50周年。

一位81岁的俄罗斯老人，以俄中友协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他第二次站在这里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天，他受邀登上天安门，成为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唯一的外国使节。

而事实上，齐赫文也见证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1925年盛夏，列宁格勒的一个住宅小区中，两位中年男子正隔着栅栏热烈地交谈着。一个7岁的孩子出现在了他们的身边。

“父亲非常喜欢听隔壁的叔叔讲述他的中国故事。”齐赫文眼中那位“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正是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齐赫文

在我读大一的时候，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是我的老师了。他在中国文学、民族学、哲学以及历史领域都有着极高的造诣。



▲齐赫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935年9月1日，阿列克谢耶夫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这句孔子的名言，成为齐赫文终身的座右铭。

1939年，21岁的齐赫文第一次来到中国，担任苏联驻乌鲁木齐副领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外交事业。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明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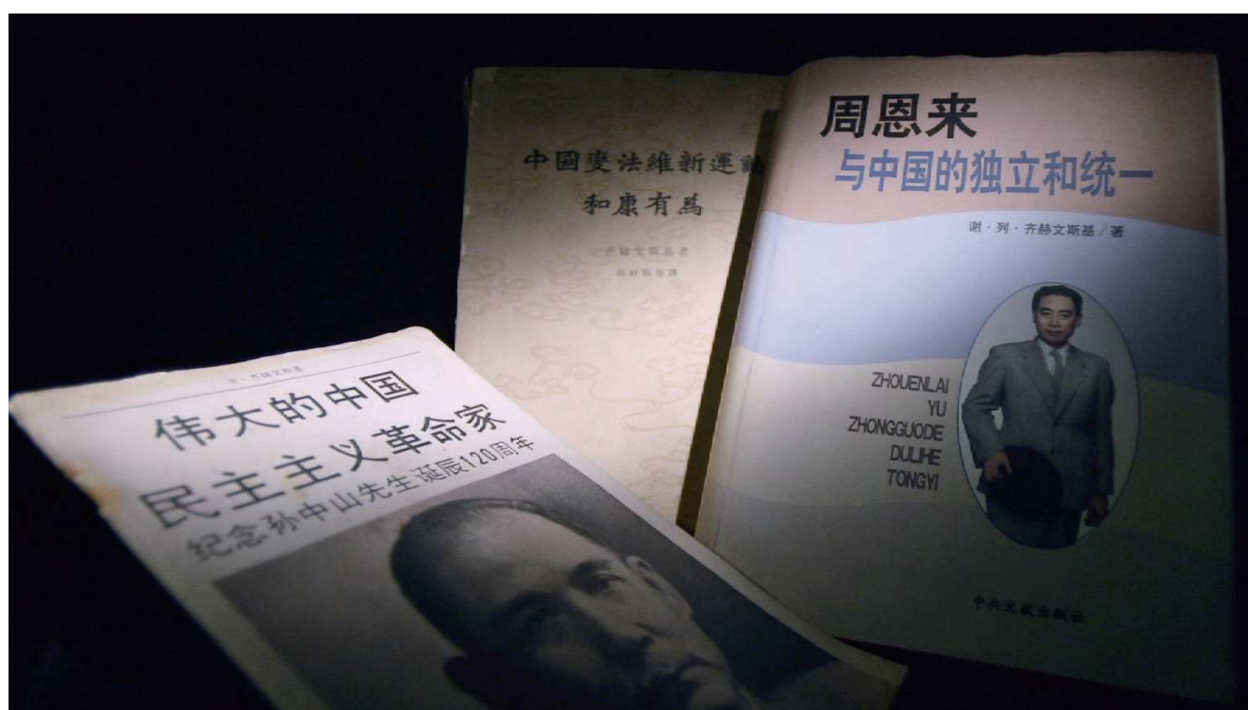
来中国当外交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反过来，常年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生涯又促使他对中国现实革命和革命历史有比较深的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 伊帕多娃

当他在外交部做实践工作的时候，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了，为的是能空出两个小时做科研。

1949年6月17日，齐赫文见到了刚到北平（今北京，编者注）不久的毛泽东。

晚宴过后，他向毛泽东请教了几个私人问题：如何评价孙中山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何评价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毛泽东一一作答。



▲齐赫文著作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齐赫文

他（毛泽东）说，康有为、严复和其他改革派领导试图在西方的学说中寻找真理，而与此同时，他们并不了解马列主义，并不知道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压迫的出路在哪里。

特殊的经历给了齐赫文的汉学研究最独特的视角。

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与周恩来有过深入的交流；接待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甚至，他还多次专程拜访了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

这让齐赫文更鲜活地理解历史，并获得了许多独一无二的史料。

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明滨

他很重视研究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孙中山、周恩来。这个不要说在俄国，就是在世界汉学界也是绝无仅有。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齐赫文

我的学术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在科研上仅仅是迈出了头几步，很想再继续深入研究，可是年龄已经不允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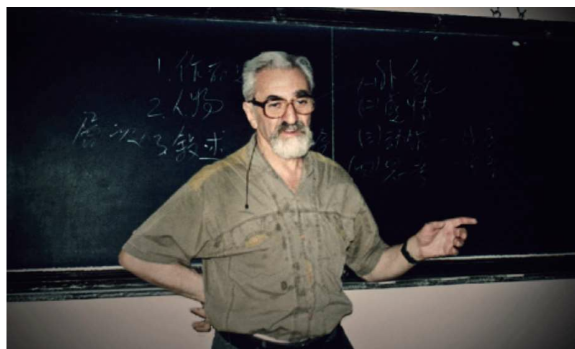
从《康有为与19世纪末中国变法运动》，到《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再到《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齐赫文的著作涵盖了中国的百年奋斗史，为世界展现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此期间，尽管世界历史风云变幻，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代代俄罗斯汉学家们前赴后继，凝望着东方和西方、中国和俄罗斯，乃至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纽带才一直没有中断。

1952年的夏天，吉尔吉斯米粮川集体农庄，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的小伙子，一边干着泥瓦匠的活儿，一边跟东干人学习中国话。

东干人，就是中国甘肃的回族人。近百年前，因不堪忍受清朝政府

的统治，



▲李福清在授课

陆续辗转迁徙到了中亚的吉尔吉斯。

“虽然不是北京话，但还是比完全不会说好。我想将来有甘肃话味道也比有列宁格勒味道好一些。”小伙子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他叫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弗廷，老乡们都叫他“李福清”。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李福清

他们用民间的方法教我，什么是民间的方法？比如，中午要吃饭，他们问我：“学生，这叫啥呢？”你们一般说，“不知道。”但是，他们说“知不道”，我说“知不道”，那他们就不给我吃。我在他们那里第一次听到他们唱的民歌、讲的故事、讲的传说，比如孟姜女的故事，我第一次是在那里听的。

“一个故事情节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

1961年，李福清完成了他的副博士论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题材问题》。他将敦煌文献和现实民间孟姜女的故事加以对比，发现孟姜女的形象已经在中国的各种民间文学中存活了一千余年。

这部40余万字的论文成为李福清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起点。

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

他真把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化当作俄罗斯文化一样来对待，当作自己民族文化来对待，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离不开这样的学者，他们是

真正的桥梁。

李福清的热心肠，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

无论谁向他请教，不管自己有多忙，李福清都会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翻阅词典，查找资料，最终给提问者以详尽的答案。

李福清院士遗孀 坚娜·李福清娜

鲍里斯（李福清）的“书库”在汉学家中间非常有名。人们经常会向他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人们找不到他们需要的资料时，就会求助于鲍里斯的私人书库。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东方与希腊文化学院院长 斯米尔诺夫

李福清对同行的帮助，我敢说老一辈的汉学家们没有一个能做到像他那样。遗憾的是，当他走后，这样的顾问就再也没有了……

1958年冬，永定门火车站，一个热火朝天的清晨。

为响应“下乡办学”的号召，北京大学规定：所有中国学生必须前往农村劳动锻炼，当新农民。而对于留学生则不做要求，自愿前往。



▲坚娜·李福清娜

但人们惊异地发现，一个外国留学生也背着厚厚的行囊走进了站台。

他，正是中国哲学家冯友兰教过的唯一的外国学生——季塔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 季塔连科

那个时候我的汉语水平不够，所以如果他（冯友兰）平常讲中国哲学，我跟同学们一起听课，有不少地方我听不懂。我就到他的家里面去，他在这边，我在那边，他慢慢地解说每个字，这让我永生难忘。

季塔连科与老师、同学一起“上山下乡”，和中国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里，他理解了普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季塔连科院士

1959年9月，季塔连科从北京转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继续学习中国哲学，比他年长两岁的潘富恩成了他的辅导员。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 季塔连科

我知道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可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他们专门到外国专家宾馆里买了面包，带到复旦大学给我吃，非常关心我。

复旦大学教授 潘富恩

我辅导他，实际上他的精神也感染我。我叫他爱称“米沙”，他叫我小潘同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中，潘富恩没有想到50多年后，这个“米沙”同学会为中俄两国的交往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乐章。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如果我们遵循中国哲学家的遗训，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平衡点，并成功走出这场我们陷入的巨大考验。”

2010年6月10日，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与会者建议，应当遵循中国思想家老子的教诲，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一个月前，由季塔连科担任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六卷本，全部完成出版。这部皇皇巨著是世界汉学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几代俄罗斯汉学家们终于实现了全面系统地推介中国精神文明的夙愿。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 贝列罗莫夫

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我们研究所在季塔连科院士的领导下，策划编写《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系列丛书，我们招贤纳士，汇集了最好的专家，尽了所有应尽之责。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 卢基扬诺夫

中国文化不仅仅是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更确切地说，它为世界的

精神文化发掘了新的宝藏。

2013年秋，俄罗斯科学院，第二十届“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200多位俄罗斯汉学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30名中国研究者共同探讨中国，探讨它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收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相对于400多年的中俄交往史，20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但就这项两年举办一次的盛会而言，它的意义远非数字所能承载。

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2013年10月14日，莫斯科1948中学，新一代的俄罗斯人正有板有眼地朗读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

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

第六章
尽天命，以成人事



▲“日中不再战”碑

中国是日本的第一个“西方”，这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更是由漫长的文化交往史决定的。

中国古代的农耕技术，帮日本摆脱了野蛮时代；中国的文字，成为日本人记录语言的工具；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塑造了日本的国民精神；甚至日本的国名也是出自于中国唐朝皇帝的册封。

但1894年甲午一战，学生彻底打败了老师。因为，人类终于认识到地球是圆的。日本往东再往东，是另一个“西方”。日本人，又找到了新的老师。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蹶不振之时，日本

却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系统化地研究、整理中国文化。

那么，他们研究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西学鸿儒”井上哲次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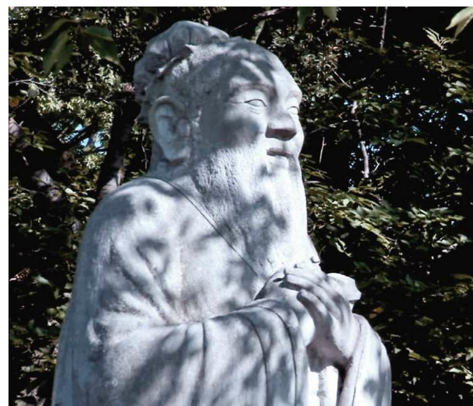
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学校。今天，人们来这里参观游览的目的是为了寻觅传统文化的气息，接受儒学的滋养。

“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日本在不停地蜕变，正如礼器所演示的（见下页“礼器”图），一次次竖立，然后再一次次倾覆，这就是近代以来汉学或者中国学在日本的命运。



▲日本足利学校



▲日本足利学校内孔子像

1890年12月的一天，东京帝国大学，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井上哲次郎副教授正在家里调整时差。

突然，他接到了文部省委托的一项紧急任务——为一个月前明治天皇刚刚颁发的《教育敕语》撰写“衍义”。

所谓“衍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导读。写一份导读，为什么要

这么着急？这个任务，为什么又会落到井上哲次郎的身上呢？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四艘黑色的舰船驶入江户湾，日本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

这个又穷又小的国家将何去何从呢？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 大木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混乱。所以，日本带有危机感，担心日本也会这样。因此他们率先推翻了比较保守的德川幕府。

日本灵山幕末历史馆馆长 木村幸比古

明治维新不是改革，而是刷新历史，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礼器

1868年元月，以推翻幕府统治为契机，日本开启了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的近代化运动。20多年的维新运动使得日本知识界分化为“国权派”和“民权派”，“国权派”倡导“天赋国权，国赋民权”，而“民权派”则高呼“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二者纷争不断。

与此同时，民众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万世一系”的皇权观念。

原本保持中立的明治天皇，逐渐向“国权派”靠拢。1890年10月，他颁布了一份振兴皇权主义国家论的纲领，希望以此来凝聚人心。

然而，《教育勅语》却遭受了冷落。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教授 高坂史朗

《教育勅语》要求对父母尽孝，当然也要效忠于天皇，兄弟之间友好相处，就是类似的德育内容。

中日交流协会会长 李大清

日本人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也就是说明治维新采取了脱亚入欧，或者说放弃东方的、中国的一些文化，吸取欧洲的一些文化的措施。



▲井上哲次郎



▲日本明治维新

而现在，天皇又把被抛弃的江户汉学的观念作为教育的目标，老百姓当然不买账。于是，政府组织了一些硕学鸿儒出面解释，但收效甚微。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呢？井上哲次郎进入了当政者的视野。

如果一个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教授能够认同《教育勅语》，那说明这套理论体系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是先进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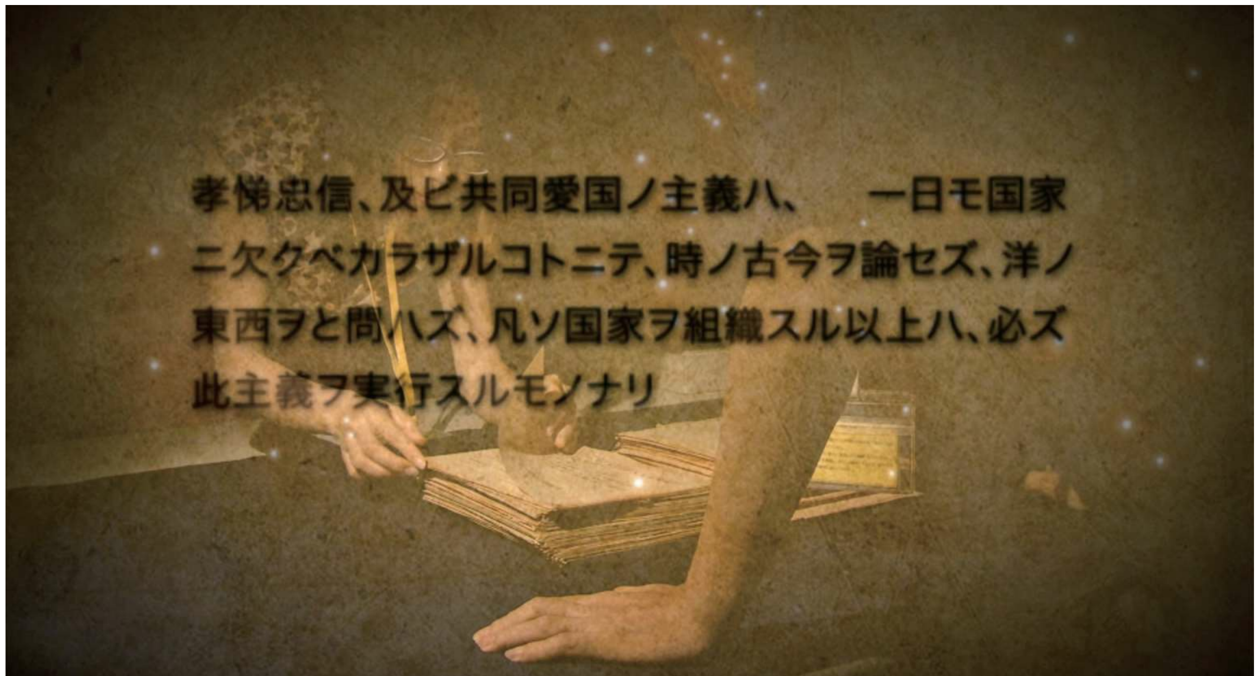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中岛隆博

说到西洋、西欧，不止一个地方。而德国是较晚进行近代化的，所以对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德国留学经历有很大的意义。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教授 高坂史朗

井上哲次郎编写的《教育敕语》的解释版，结合了儒教德目，又加上了“如何建设国家”的德国国家学，这样完成了这本衍义。

“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之主义，国家一日不可缺也。无论时之古今，不问洋之东西，凡组织国家者，必实行此主义也。”



▲《教育勅语衍义》

1891年9月，《教育勅语衍义》正式发表。

爱天皇，就是爱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日本儒学研究诞生了。旧的儒学伦理结合新的国家主义，这是井上哲次郎一生的追求，也是日本近代最发人深省的思想文化现象。

三年后，1894年秋，黄海海域，北洋舰队被掩埋在滚滚的波涛中。至此，中国形象在日本已如明日黄花。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研究还能够继续生根发芽吗？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再造中国，大日本帝国的“天命”

1900年6月10日，中国，义和团开始大举入京。此后的九周，外国使团的对外通信全部断绝。



▲服部宇之吉

正在北京进修的井上哲次郎的学生服部宇之吉，也被围困在使馆。这一年他33岁，身份是文部省的官员兼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与他一同被困的，还有新建立不久的京都帝国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狩野直喜。

两个多月的煎熬，让服部宇之吉对“生死有命”有了亲身体悟。后来，他因出版了以此为内容的《北京笼城日记》而名声渐起。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中岛隆博

对于我们东亚人来说，是无法逃脱近代西洋化的，但完全抛弃传统来开创近代化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等于是消灭了我们的自身血统。所以再解释、再创造我们的传统是非常必要的。

1900年12月，服部宇之吉接受

日本文部省的指令，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进修汉学教学法和研究法。但此汉学非彼汉学，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然天壤之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自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区别起见，今天有许多学者主张：将明治维新之后兴起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作“中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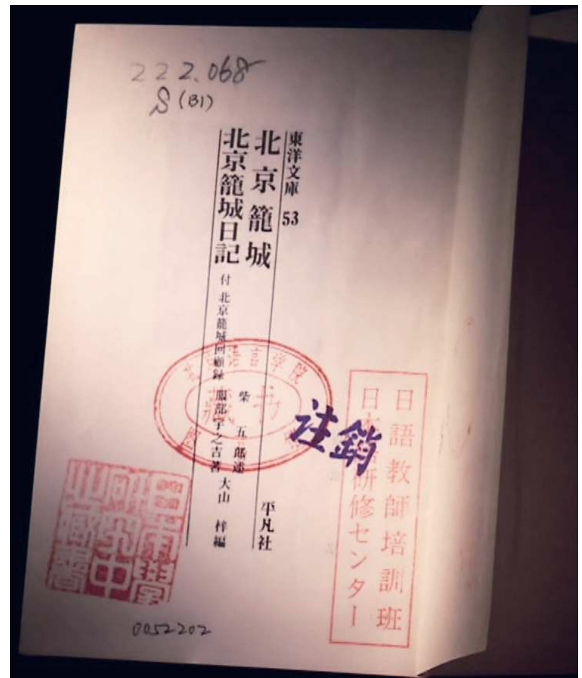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 大木康

汉学的历史太长了，比如说江户时代的汉学家，他们读的是《论语》《孟子》，不一定是研究中国，所以《论语》《孟子》对当时的日本汉学家来讲，已经是血肉化的东西，中国不一定是他者的一个东西。可是明治以后，就有点不一样了，它是作为外国研究的中国。



▲狩野直喜

1902年7月，服部宇之吉被任命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一个月后，应清政府之聘，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习。这一待就是整整7年。



▲《北京笼城日记》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日本足利老照片

长期生活在中国，对服部宇之吉的学问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国民对孔子的态度，通过观察和研究，服部宇之吉深感“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乃是由于有孔子之教”。

此后，终其一生，他的学术研究都没有脱离“伦理”与“孔教”。

当然，这也是“大日本帝国”一直需要的。

1906年12月，日本足利学校内气氛庄严。

为宣告日本军队代表亚洲第一次打败欧洲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陆军元帅兼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召集日本现役军人的最高层，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他们以向中国孔子致意，庆祝日本已经夺得东亚海域的控制权。

参加典礼的还有甲午海战的“功臣”——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严绍璗

他们在那里告慰于孔子。当然中国人会感到非常震惊和奇怪，但是从日本中国学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完全是可以解释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必然的。1906年，日本已经进入到了企图向亚洲扩张的军事规划制定的过程中了。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这让活跃在日本学术界和政界的服部宇之吉很是反感。他认为，革命最大的危害就是动摇了道德伦理的根本。中国彻底颠覆了皇权，这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迥然不同。

“故余可断言，中国有儒教而无孔子教，日本有孔子教而无儒教。”

五十而知天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服部宇之吉认为，“知天命”是孔子教的根本之所在，孔子一生的经历乃是本于对天命的自信。他把孔子从事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归结于知天命、畏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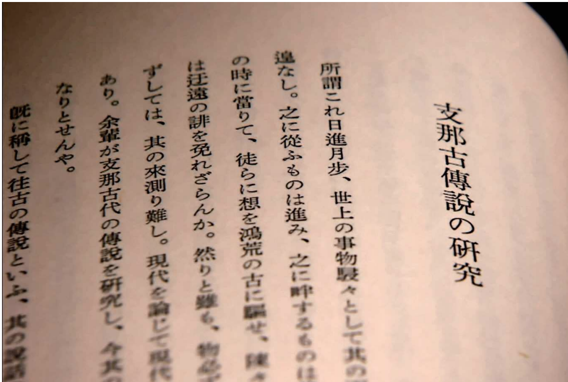
孔子之教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刘岳兵

有意思的是，服部宇之吉没有就此打住，他把孔子的天命观引申为日本帝国对于世界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天命论。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引申呢？就是说，日本的文化应该是中西、东西融合的文化，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那么这种新的文化要让中国、朝鲜，甚至全世界，都受日本新文明的恩泽。

去世的前一年，1938年，桃李满门的服部宇之吉被誉为是“现代的孔夫子”。在一次对陆海军将校演讲时，他这样说：“今皇国旷古之圣业，着成于改造、再造中国之伟业。”说到底，日本帝国的“天命”首先是再造中国。

对此，71岁的服部宇之吉深信不疑。



支那古傳説の研究

所謂これ日進月歩、世上の事物駸々として其の
遑なし。之に從ふものは進み、之に悖るものは
の時に當りて、徒らに想を鴻荒の古に馳せ、
は迂遠の誹を免れざらんか。然りと雖も、
ずしては、其の來測り難し。現代を論じて現代
あり。余輩が支那古代の傳説を研究し、
なりとせんや。
既に稱して往古の傳説といふ、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

尽人事，以听天命。就在服部宇之吉高扬孔子经幡的同时，同样在东京帝国大学，一种批判中国古文化的声音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1909年8月，在日本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一篇名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

“余辈以虚心平气、极冷静之头脑考察之，以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等《尚书》之文，决非其当时之记载……”

文章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史与古文化展开了强烈的批判。这就是日本中国学史上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钱婉约

其实我觉得他（白鸟库吉）主要并不是为了批判中国文化，他只是秉着一种他觉得是科学的理念在做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因为他并不像中国人那样对尧舜禹有特殊的情感。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白鸟库吉。

当时的日本，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举国上下正在用孔子之教重塑大和民族的灵魂。白鸟库吉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他的孙子白鸟芳郎回忆说，“祖父晚年在病床上经常把里斯的讲座笔记置于枕边，十分珍视。这对祖父来说，大概是回忆起了许多深沉的东西。”

里斯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师从“兰克学派”，曾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白鸟库吉是他在日本教出的第一批学生。

德国柏林大学汉学系教授 余凯思

对于兰克来说，要做的是，告诉人们必须将历史理解为历史本身，理解为独特的时期、独特的阶段。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平势隆郎

这样的研究方式被引入中国史，所以思考三皇五帝、夏朝也必须是如此。



▲白鸟库吉



▲里斯

批判性使白鸟库吉摆脱了传统的儒教观念的层层束缚，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评价中国文化，从而真正完成了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奠基。

对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白鸟库吉是这样评价的："倘若没有列强的压迫，经此番骚乱，中国将形成近代的一个国家，且将无愧色地立于世界列强之间。我本人作为历史学家，不惧真言。"

在这里，白鸟库吉表达了一种与同时代日本中国学家相比更加深刻的中国观。不过，没有人能超越历史，即便是历史学家，也不例外。

白鸟库吉一边鼓吹日本民族已经全部学完了中国文化，现在的任务是向西方学习；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己"不是儒学的敌人，而是儒学的拥护者。"

这样的矛盾心理在今天的日本学界仍然存在。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严绍璗

白鸟库吉既想在自己的学术上开辟自己的怀疑主义道路，又不能完全抛却儒学所授予他的道德纲目所潜在的一种思想教育，所以他晚年时期的论文，就没有像他的中年时代那样充满着尖锐的批判性。

晚年，白鸟库吉再三对家人表示："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人了。"在己，有事业开宗立派的圆满人生；在外，又逢日本国势的迅速扩张。作为日本人，看到祖国欣欣向荣，自然是幸福的！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横扫东南亚，在太平洋地区如日中天。三个月后，白鸟库吉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陨落了……

把中国当作中国

1897年6月，筹划多年的京都帝国大学迎来了第一批本科生。

六年前，有23位议员向国会建议，日本应当在关西再设一所国立大学，以便与关东的东京帝国大学相呼应。两年前，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建设基金终于落到了实处。

战争赔款使京都帝国大学从诞生之初就与中国有了特殊的因缘。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钱婉约

要说起京都（帝国）大学研究中国学的一些特点，我想首先是和它当时存在的东京（帝国）大学来相比而言的。因为它（东京帝国大学）更多地受到西方近代时政科学研究的影响，以后它（东京帝国大学）就把中国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像放在手术台上的一具过去的尸体一样。

与东京帝国大学不同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者们开始尝试像中国人那样去理解、研究中国。于是，他们将考证的脚步迈进了中国的土地……

1900年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来到了北京。

据他的同人内藤湖南回忆：狩野直喜最崇拜的学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清朝的“考证学”就是由后者引入了日本。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 余项科

东京（帝国）大学创办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高级官僚，那谁来管这批官僚？于是，京都（帝国）大学就注重在学术上花更大的精力，这是京都（帝国）大学的一个重点和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讲，京都大学的特点不在于为政府服务，而是为人类服务。



▲狩野直喜研究所

视野的变化，使中国又呈现出了另外的价值。

1903年，狩野直喜回国任教。从1906年开始，他在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中国哲学讲座”达22年之久。

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文学史第一次登上了日本帝国大学的讲坛。

1909年夏，北京东城，苏州胡同内的一间寓所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个名叫伯希和的法国探险家携带一些从敦煌掠走的文献珍本住到了这里，约见并请教中国学者。

第二年10月，闻讯的狩野直喜一行来到北京。虽然因伯希和归国，

他们与敦煌文献失之交臂。但狩野直喜在这里却结识了仰慕已久的中国学者——王国维。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高田时雄

明治时期日本的中国学大部分还是研究古老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像是以戏曲、小说等为对象的研究还没有出现。狩野老师是最早开始着手研究戏曲、小说的，恰好此时中国的王国维老师也开始研究中国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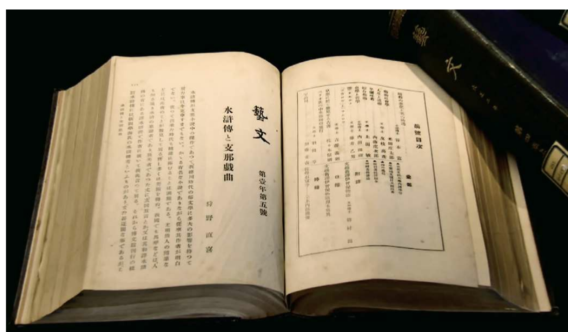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井波陵一

两人因共同研究戏曲，交流得十分投机。当时关于地球南北极的话题十分盛行，王国维和狩野直喜老师也讨论了这一话题，但他们讨论的则是南北曲。地球是南极、北极，日语中“极”和“曲”发音相同。

共同的学术判断，使二人成为挚交。

他们之间探讨的问题，从敦煌学、戏曲，一直深入到唐宋文学。

1910年底，狩野直喜发表论文《水浒传与中国戏曲》，提出：小说《水浒传》，是在许多“水浒戏”的基础上创作的，“它大概是在元代之后，明代的初期出现的”。这对传统的认识是一种颠覆。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有学者撰文称“罗贯中为关汉卿创造了编剧的基础”。



▲《水浒传与中国戏曲》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钱婉约

狩野直喜搜集了南宋以来中国所有的民间话本，然后在一点一点地

比较推论中，发现正是在这样一些民间话本、说话资料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水浒传》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具有学术性且不能被颠覆的一个结论。

1915年秋，法国国家图书馆，狩野直喜的目光被敦煌文书中的一枚败纸所吸引。从残缺的文字上，他马上联想到唐太宗魂游冥府的故事。

第二年，《艺文》杂志连载了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一文，指出："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高田时雄

在敦煌写本出现以前，中国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资料基本上不存在，特别是宋代之前时代的资料是完全没有的。敦煌写本从莫高窟洞穴中被发掘之后，人们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有关俗文学的资料。



1927年6月25日，京都，一场追悼法会隆重举行。

半个月前，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自尽，时年5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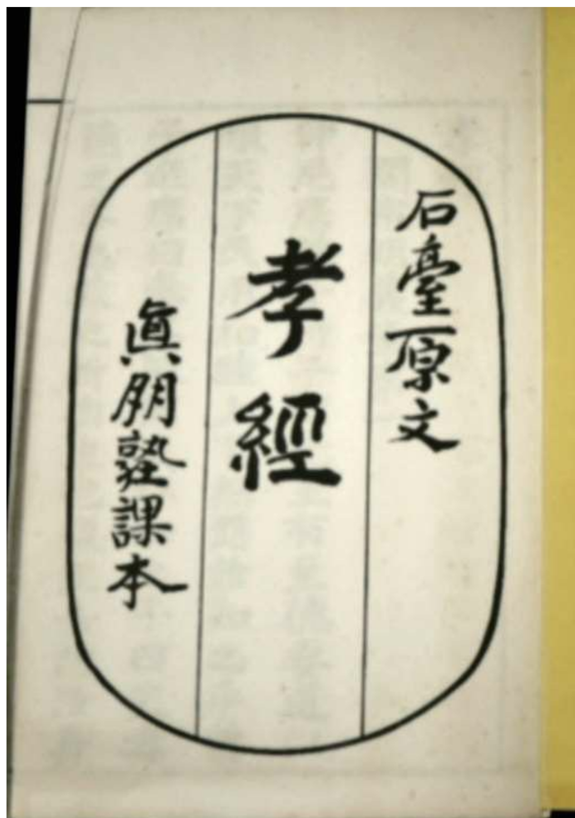
狩野直喜闻讯，悲痛不已，他马上在日本为王国维设立灵堂，"哭之"。与他一起组织追悼会的还有京都学派的核心人物内藤湖南。

1907年，内藤湖南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当年10月，京都帝国大学决定聘请他为教授。

▲内藤湖南

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高木智见

那个时候内藤湖南作为报纸的记者访问过中国。



▲《孝经》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陶德民

他对中国的儒学经典是非常痴迷的，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我死后请把《孝经》誊写一遍，在我枕边朗诵。"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2月，在内藤湖南的邀请下，罗振玉和王国维东渡日本避难。他们以前清遗民的身份侨居在京都达五年之久。

这五年，内藤湖南不时来拜访。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聚会，在相互启迪、帮助下，把甲骨文的世界研究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用黏土动画模拟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聚会

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高木智见

我是日本人，但是王国维先生对甲骨文的理解比内藤湖南深刻得多。与王国维先生比较的话，内藤湖南先生还是研究得有限，他向王国维先生请教过好几个问题。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井波陵一

王国维老师等人发表的有关甲骨文的论文证明，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王家族谱（商朝）与残留的甲骨文的王家族谱是一致的。所以通过王国维、罗振玉、内藤湖南老师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商朝的存在。

近30年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臻于成熟。



▲用黏土动画模拟甲骨文



▲《支那论》

1914年，内藤湖南出版了著名的《支那论》。这意味着，他思考了近30年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臻于成熟。

内藤湖南把中国古代史创造性地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阶段，这样的断代方式被称作“内藤史学”的核心。而他断代的依据，正是他深思熟虑所构建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富谷至

简单来说“文化移动学说”就是，中国高水准的文化向周边各国传播，文化从中心向周边传播。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严绍璗

当时内藤湖南预测，在21世纪末期，“中心”将向华南地区移动，当时我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感到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深圳经济建设区。

内藤湖南被誉为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但遗憾的是，在那样的时代，无论多么优秀的学者，也难免变异为军国主义政治的文化传声筒。

恭仁山庄是内藤湖南退休后隐居的小山村，即便在今天，要找到也颇为不易。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个偏僻的所在，每天都门庭若市。



▲恭仁山庄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富谷至

那片地方很荒凉，但人力车却每天都载人往返于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内藤湖南就算是退休了，还是有很多人拜访他，政治家、文人、学者都会去。

在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中，内藤湖南认为：中国文化，又已经呈现出“中毒”症状，需要一种外来文化作为“润滑剂”解毒。而日本文化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代欧洲，充当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

80年后的今天，学界对内藤湖南的评价仍然莫衷一是。

2013年9月6日，在天津召开的“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识——内藤湖南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他（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和政治的是非感，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在乎被谁统治。”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傅佛果

于是，他们认为中国需要来自国际的监督和管理。这个想法招来颇多争议，当然它也确实是一个另类的想法，虽然从未实现过，但这想法挺疯狂。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陶德民

内滕湖南觉得，日本应该给予某种指导，就像他会给自己的老朋友出谋划策提供改革建议。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对日本本身的考量，或者是出于谋求日本帝国的一些利益。

内藤湖南已在想象未来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却没有感觉，仍然继续活着。”

分析历史人物，首先需要还原他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任何断章取义，都无法准确把握人物的内心。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历史。

吉川幸次郎：“我是中国人”



▲吉田富夫

201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正在隆重举行。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莫言，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台下坐着的，是把莫言的作品介绍给世界各地的翻译家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农民的儿子——吉田富夫。一个月前，这位77岁的老人刚刚翻译完《天堂蒜薹之歌》，这是他翻译的莫言的第八部作品。

他的老师，名叫吉川幸次郎。

1931年4月的一天，京都帝国大学，一场精彩的中国学演讲会正在进行。但在学生们看来，真正精彩的不是演讲老师，而是那个擦黑板的留学生。

只见他身着一袭中国式长袍，温文尔雅，更惊奇的是，他时不时冒出来的一两句中国话竟然是标准的北平音。

这个被误以为是中国留学生的年轻人就是吉川幸次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哲俊

吉川幸次郎在初中的时候，读到了翻译成日文的《水浒传》　《三

国演义》《西游记》这类小说，读后非常感动。后来又认识了一个中国留学生，跟他学习了一年汉语。他（吉川幸次郎）汉语发音非常好，所以他非常自豪地说，他从来没有向日本人学习过汉语。



▲吉川幸次郎

1922年春，吉川幸次郎第一次来到中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时值烟花三月，如梦的江南幽幽流淌着唐诗的韵味，连“太阳的光彩也比日本的美”。

古稀之年，回忆起这次中国行，吉川幸次郎依然忘情地说，“简直是饮酒微醉的感觉。”大约就是这“饮酒微醉”的感觉，最终把他带上了在当时已无人问津的中国文学的研究道路。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严绍璗

狩野直喜要吉川幸次郎把《尚书》翻译成现代日本语。他（吉川幸次郎）说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把《尚书》翻译成了日本现代语。他感觉到，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次翻译奠定了他理解中国学问的基础。

1928年3月底，吉川幸次郎再次来到中国，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一到北京，他与同学约法三章：一是不穿西装，穿中国长袍；二是要用汉语写论文；三是用北京音直读中国的文学作品。

从此，中国长袍便成了他的标志。

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高木智见

他很喜欢穿中国的衣服，穿中国衣服去各个饭店，那边饭店的老板都以为这位先生是中国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哲俊

他跟日本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说："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是清朝的遗老，你不明白。"

留学结束前，吉川幸次郎曾两次游历江南。路过淮安，他本想拜访当地的一位学者。结果报上自己的名字后，对方一听是日本人，立马关上大门。

此时，大日本帝国正在为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做最后的准备。在北京前门的阁楼上，每隔一段柱子就有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后来回忆："我每次坐着人力车从这里经过，总是一种复杂的心情。"

"神圣的战争"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化，让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坚信：再造中国文化，征服欧亚，这是历史赋予大日本帝国的天职。

但吉川幸次郎却选择了逃避，他只能去梦中寻找自己的江南。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钱婉约

所以他就跟他的一些同事们躲在一个研究室里面读元杂剧，他认为他对元杂剧的研究，最开始是为了躲避那个纷乱的战争带给人的心理的不安，或者说是逃避一种很厌恶的情绪。

让吉川幸次郎一生用力最勤、耗费时间最长的是对杜甫的研究。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偏爱杜甫的原因："我没有被与我同样性格散漫

的李白吸引，却执着于喜谈政治言论的杜甫，这是不可思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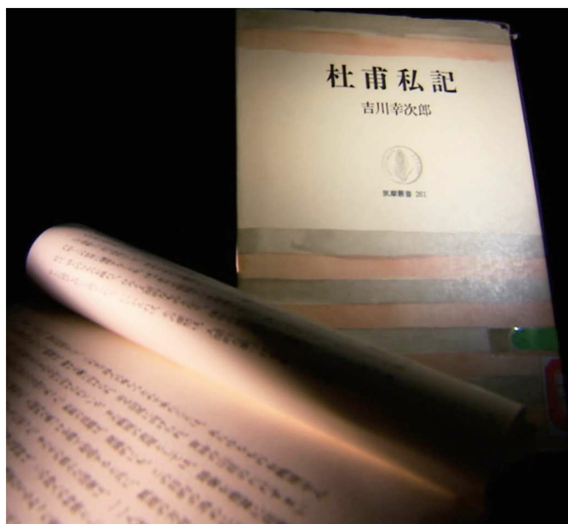
他能背诵100首杜甫的诗。

日本佛教大学名誉教授 吉田富夫

十七八岁的时候，他自己说，读了一篇很好的诗，马上就血流高涨，脉动提速，耳朵马上就热起来。所以他一开始研究，进入中国古代诗词、诗人的世界中，一碰到杜甫，那就可能是同样感到了自己的炽热情感，很敏感地感受到了，并为之感动了。

“我并不讨厌西洋文学。但西洋文学有时候是神的文学、英雄的文学，不是凡人的文学。歌德是伟大的，但丁是伟大的，但我觉得，不如杜甫这样‘人的文学’更好。”

这个不问政治的儒者，眼睛始终盯着大地……



▲吉川幸次郎一生致力于杜甫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批年轻的日本学者，又发现了一个中国以外的中国——人民的中国……

2013年8月9日，日本足利学校，我们碰巧记录了由足利市教委组织的论语学习课。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尽人事，以听天命。

日本的中国学，能否成为一个融化冰雪的纽带呢？

第七章
中国学，别开生面



▲美国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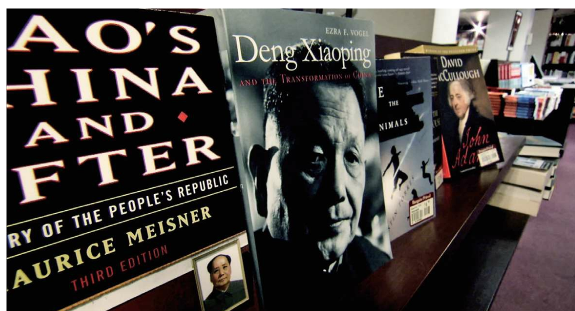
美国，曾经是欧洲的孩子，美国汉学也不例外。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汉学也从一个被视作是脱离现实、无关痛痒的冷门科目，逐渐蜕变成了以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中国研究。

而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正是美国。

约定俗成的“Sinology”一词，被“Chinese Studies”所取代，另辟蹊径的美国汉学也逐渐取代欧洲汉学，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主流范式。

从“汉学”到“中国学”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在国外热销

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讲话21周年纪念日，一本名为《邓小平时代》的书正在发售，并刮起强劲的旋风——首印50万册被订购一空。但很少有读者知道，作者傅高义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

此前，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发行后，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誉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

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傅高义

中国的领导人都想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希望中国强大起来。我认为那是中国一百多年领导人的梦。但是实现这个梦的人，就是邓小平。

我想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多了解邓小平时代。所以我花了10年的工夫来多了解邓小平。

今天，美国俨然已经取代欧洲，成为全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然而，这一扇大门在它开启之初，却是困难重重。

1952年3月12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美国华盛顿参议院办公大楼424号房间里气氛冷酷。一场特殊的指控，正紧张地进行着。

被指控的是一位气质儒雅、身材瘦高的中年男士。几位参议员滔滔

不绝地罗列出了十几项罪名，指控这位男士“帮了共产主义的忙”，从而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丢失了曾经唾手可得的中国”。



▲傅高义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参议员们不断质问他有没有援助过一位中国教授100美元？从桂林回美国时，是不是也寄回国一个可疑的包裹？事实上，那100美元只是转寄给中国教授的一笔稿费，而所谓的包裹，也不过是一份工业合同。

这位中年人，正是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的中国学之父”——费正清。

美国北乔治亚大学院长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一直相信，中国应当由具有民主倾向的开明基督教教徒蒋介石领导，但蒋介石最终失败了，而共产党顺利掌权。这使得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借口指责美国政府官员，将美国合作盟友蒋介石出卖给中国共产党。1950年2月1日起，开始对美国国务院提起指控。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保罗·柯文

美国右翼的叫嚣就出来了：“谁丢掉中国的，你们知道的！”所以，费正清这些人就被指控为危险分子，对美国不忠，研究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那你就是对美国不忠。

几年后，麦卡锡下台，然而麦卡锡主义却阴魂不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问题



▲费正清

仍是禁区，一批造诣颇深且有切身经历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打入了“冷宫”。

直到1966年3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隆重邀请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就未来的中美关系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 赵穗生

当时美国在“越战”中陷得很深，所以美国人想从越南脱身。他们认为中国对越南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希望走中国这条路，通过北京，然后撤离河内。

在相隔12年后，费正清首次踏进国会山。这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气氛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它也意味着费正清钻研了近40年的中国学，终于能重见天日，并开始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发挥作用。

但对费正清而言，中国，从未走远！

1932年初，当牛津大学博士费正清提着行李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次踏进北平城时，一切出乎意料又似曾相识。叫卖的小贩、剃头师傅的吆喝声和坐一次只要一个铜板的人力车，都让他感受到了真实鲜活的中国。

每天清晨，穿着中式棉袍的费正清都会从哈德门大街搭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横穿北平城，到清华大学去拜访蒋廷黻教授。他跟随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历史系主任做故宫的清代档案研究。

此刻，他的目的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

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研究视角落到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上。延续300多年的汉学就此出现了分野，为区别起见，后人将美国的中国研究称作“中国学”。

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柯伟林

费正清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从清朝到现在，通常是指从18、19世纪的康乾盛世到现在。然而大多数汉学家、中国研究专家，只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和中国古代文化，而对1911年之后的中国就不再进行研究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孙康宜

如果有人现在说你是汉学家，大家会觉得你很老套，好像汉学家就是老夫子，拿一本书就翻译，只讲四书五经、评论学、音韵学等，但其实中国学的范围很广。

北总布胡同3号，80年前的一个冬夜，大雪映衬着烛光，梁思成夫妇、费正清夫妇还有他们的邻居金岳霖，围着火炉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酒过三巡之后，梁思成一时兴起，对费正清说：“不如帮你取个中文名吧，‘费’同你英文名的音，‘正’取意儒门刚正不阿，‘清’指秉笔直书的治史美德。”于是，就有了费尔班克先生这寓意深刻的中文名“费正清”。

初到北平城，费正清夫妇与曾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夫妇一见如故。



▲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及友人

“通过他们的目光，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一体化问题，即需要扬弃过去的糟粕，对外来事物需要区别什么该保存，什么该借鉴。”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由此结下了一段长达30多年的友谊。这对费正清开创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6年，费正清回到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正式聘请的第一位中国史教授。

这是一位极有授课天赋的老师，博学且爱“冷幽默”。又因为当时世界政治时局的变动，东亚的相关新闻常常占据美国主流媒体的头条位置，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心也随之加深。

中国学终于在美国的高等学府站稳了脚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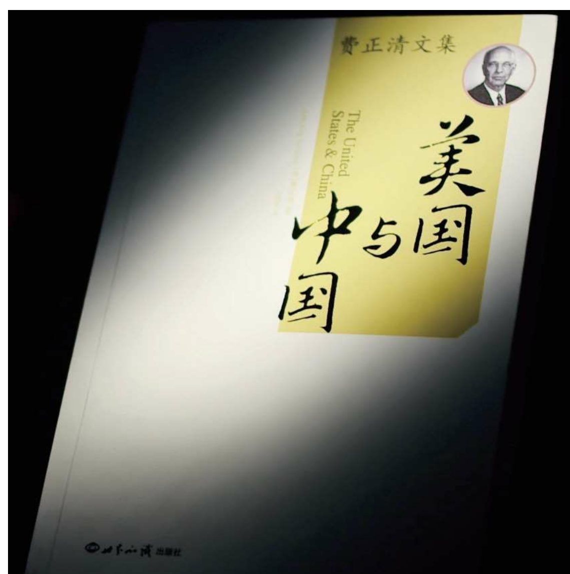
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柯伟林

费正清有点像是一个传教士，并不是指那种到中国宣扬基督教的传教士，而是指在美国国内，希望美国人民应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教士。为了了解今天的中国，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史。

1946年，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这是当时美国独有的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专著。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要明白两者之间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巍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出自《美国与中国》，编者注）

这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的经典之作，在中美正式建交前，一度成为两国领导人的案头书。



▲费正清文集《美国与中国》

法兰西人文科学院院长　巴斯蒂

费正清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和美国能做到握手言和，恢复外交关系。他希望自己能有幸看到这一天，并耐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努力奋斗，希望中美和解之后，美国能有一批了解中国、写下中国情况的人才。

在费正清看来，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猖獗，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太无知。他后来回忆说：“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

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担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

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费正清推动了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

据统计，在中心成立的当年，费正清招收了26名博士生。而到1993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欧立德



▲欧立德

如果你找全美国搞中国研究的人的话，大多数的研究者，会有一种费正清号码。

什么叫费正清号码呢？是说你离费正清的关系有多么远，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是费正清的学生，但是我老师的老师是费正清的学生，因为我老师的老师是列文森，列文森是第一，魏斐德是第二，那就是说我离费正清是两个人，离得两个人远，那我的费正清号码是二，我的学生们是三。

欧立德，哈佛新一代中国学的领军人物，现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但欧立德踏入中国学研究的起点，却并不是在哈佛这个美国中国学的大本营，而是在美国大陆的另一端——伯克利。

辉煌的“费正清帝国”

1960年，一位年轻人正在犹豫：究竟是回到自己的母校哈佛跟随费正清进行中国研究，还是去伯克利跟随费正清的高徒列文森攻读博士？

权衡再三，魏斐德选择拜入列文森门下。

魏斐德妻子 梁禾

费正清研究明清那条思路，他（魏斐德）基本明白，因为他从哈佛出来，他接触过，已经有了解了。列文森当初在美国西岸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他的研究更侧重历史的内在机制和历史的思想史这部分。那么这个对我先生，就是对魏斐德更有召唤力。

费正清曾评价说：“列文森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见过最有潜质的天才。”

1953年，列文森将自己跟随费正清期间的研究成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手稿交付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海外梁启超研究的开山之作，列文森一举成名。很快，《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列文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



▲魏斐德与妻子梁禾合影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刘东

但是当时呢，美国还有反犹(犹太人)这样一个思潮，所以费正清差不多写了50封信才帮他找到工作，但是现在列文森已经变成美国汉学的象征，任何一个人如果得到了列文森Book Prize，就是“列文森图书奖”，都是他从事汉学研究生涯的一个莫大的荣幸。

但天妒英才，1969年4月6日，游泳健将列文森在野外度假时，被暴发的山洪所湮没，年仅49岁。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戴梅可

我是在魏斐德的课上听闻列文森先生意外丧生的噩耗的。本来魏斐德整理好心情想要上好那堂课的，但在开课后不到十分钟，泪水就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说：“很抱歉告诉大家……我本以为我可以撑过这节课的，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的老师去世了……”



▲列文森

一颗耀眼的流星，瞬间划过天际。这让32岁的魏斐德悲痛不已，但更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学校迅速将他破格提拔为教授，而且将列文森的学生全部交给了他。

20世纪60年代末，整个世界都在一片动荡不安中。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从法国开始的学生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而此时的美国，除了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游行和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

教室里几乎每天都有抗议示威，有时，魏斐德还不得不冲下来劝架。这些大环境的变化，让魏斐德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他思索着背后的缘由。

1970年，魏斐德完成了《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试图解答“一位旷世伟人究竟靠什么思想予以滋养。”

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 史景迁

魏斐德喜欢那些耀眼的历史人物，例如有勇气的人，有一些狂野的人，还有那些令人兴奋的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戴梅可

不管是列文森还是魏斐德，不管他们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始终超然于这些政治泥沼，也因而能够呈现出若要在现代为历史存留一席之地，有些抉择尽管道阻且长，却依然要面对。

1992年冬，纽约希尔顿酒店，刚刚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了这篇独具特色的就职演讲，题目就叫《远航》。

6岁的时候，魏斐德的父亲曾带着家人驾帆船重走哥伦布之路，最初设定的目标正是中国。但后因船舶抛锚，旅程半途而废。

在演讲稿中，魏斐德借助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生动地交织在了一起。

魏斐德妻子 梁禾

它起码贯穿了三条历史主线：首先是美国的大背景，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在亚太地区，其本身的历史，可以简单地作为大背景。其次是他自己的家庭，还有他个人的成长史，特别是他从小时候就跟着父亲远航

的那段经历。这次远航，是他精神上的一些经历，从小到大，精神和文化是如何成长的，这是最后一条主线。

正是在这次半途而废的远航中，魏斐德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华人偷渡者的闲话和流言，这在他心中留下了中国人温顺、任人宰割的印象，但同时也引起了他对中国的好奇。

60多年后，2002年，当坐在轮椅上的魏斐德最后一次出现在他一生航行的土地上时，内心最初对中国人的印象早已被彻底颠覆！

“中国人并非‘被动的苦力’或是剥削者怯懦的牺牲品，恰恰相反，他们身上有一种积极主动得多的‘反抗—不服从’。”

这种“反抗—不服从”在他的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有着最直观的展示。

德国雅各布大学教授 夏多明

魏斐德一直努力为读者描绘生动的历史，不仅是为其他专家写作，更是为能看到人们过去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有哪些希望，害怕什么，如何饱受煎熬，如何相爱。这些都是历史的重要部分，当然在历史的理论中却是鲜少能看到这部分内容的。

这部著作被称为是“拥有无与伦比的视角、抱负和叙事能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一部真正具有世界观和全球眼光的史书”。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撰文，盛赞这位与自己失之交臂的学生。“对于任何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这本书将会是他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98年的深秋，一次医疗事故造成了魏斐德的左腿终身残疾，他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但魏斐德没有控告医生，那样只会浪费时间。他

旋即一头扎进了对“间谍王”戴笠的研究和东亚研究所的管理之中。

糟糕的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刻，华人翻译家梁禾走进了他的世界，这位被魏斐德的才华和坚强所折服的女士选择了陪他白头到老。

魏斐德妻子 梁禾

他就觉得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是很微小的，历史也是很无情的，像潮流一样一闪而过。那么我们人类，不能为生存而生存，没有意义。人要献身于一个大于自己的东西，而且为它付出，它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种导航仪。

只有超越自己，生命才有意义，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

梁禾回忆说，有一次饭后，她问魏斐德：“你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如果有来世，你会选择什么事业？”

魏斐德想了想，“还是中国历史。”

1986年，有关费正清选错了中心主任的闲话在私底下流传着。当时的中心主任孔飞力在1970年出版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之后，十几年来再没有新的专著问世。

于是，闲言碎语不胫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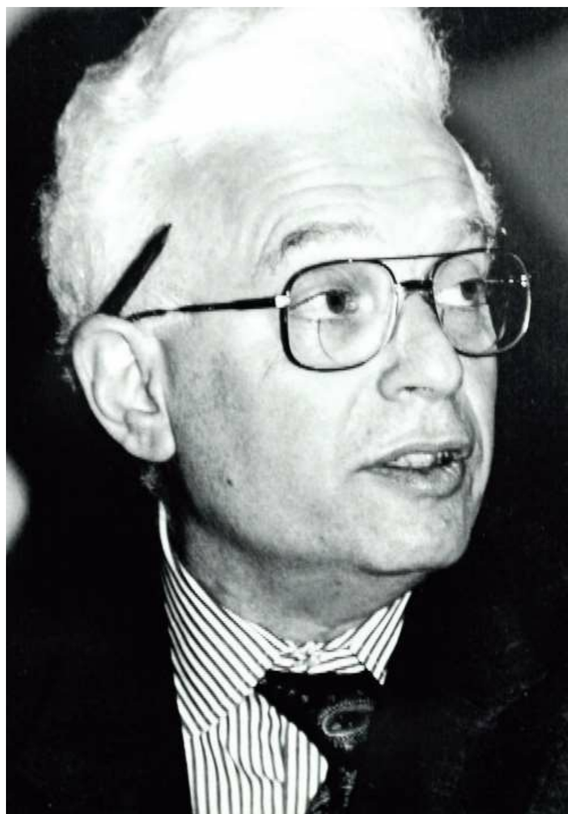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刘东

孔飞力原来叫孔复礼，这个名字到了中国的话会让人觉得有点太古老，或者甚至由于那时候中国“批林批孔”，对儒家没有好感，弄这个名字会不会叫人家觉得，有些像过去幕府里的老传教士。

1984年，孔飞力再次来北京搜集资料，住在故宫附近的一家苏联式

宾馆里。每天一大早，他骑着一辆二八式自行车去故宫博物院查资料。

乾隆皇帝，原本只是孔飞力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但不经意间，他找到了一批乾隆年间关于“叫魂案”的资料，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叫魂”这个词。


▲孔飞力

1768年，中国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了整个社会：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盘桓。据说，诸如石匠、道士、和尚等江湖术士们通过作法，能让人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偷取走受害者的魂魄。于是，官府开始大力清剿，超过两亿人受到了冲击。

这批完整的资料，激起了孔飞力浓厚的兴趣。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刘东

“叫魂”，大概翻译错了，英文叫soul stealer，意思是说“偷魂”，或者说中国黑巫术中那种摄人魂魄，把人的魂魄弄走。而“叫魂”的意思有点像“招魂”，意思是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招魂以复其精神，魂兮归来。

尽管农民、官僚、皇帝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不同，但“叫魂”带来恐慌时，下层的人民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他的这部力作。

1990年秋，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历史类书籍推荐书目上，醒目地写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著作，不仅斩获了当年的“列文森奖”，也彻底终结了所有关于孔飞力的闲言碎语。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保罗·柯文

当时的清朝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我的意思是通过乾隆的南征北战，18世纪中期，中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可是，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一个这么繁荣发达的国家也在经历着这些麻烦的变化，但没有人清楚到底该怎么应对。

18世纪中期，西方的影响力，还远没到达中国，而清朝的乾隆皇帝却在为商业繁荣带来的流动人口而担忧。这该如何解释呢？

孔飞力的《叫魂》，彻底颠覆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传统认识。因为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的改革，甚至革命，基本上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永远不会进步。这种观点，被称为“冲击—回应”



▲耶鲁大学图书馆

论。进入20世纪60年代，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模式，费正清的学生大多都接受了这种模式。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保罗·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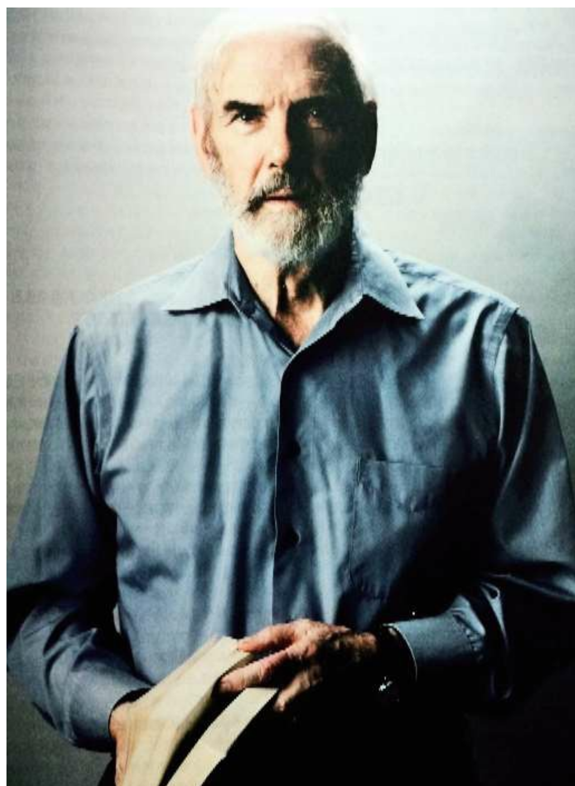
但这种假设却遭到了孔复礼的强烈质疑。我想，他是第一人，第一个著书发出质疑的学者，就是质疑这个基本的假设。中国还有些其他很重要的方面，但这跟西方冲击没关系。如果你只看到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那你就会错过所有其他方面。

其实，早在1984年，保罗·柯文就指出，费正清老师的“冲击—回应”论，是欧洲传统汉学西方中心论在美国的延续，必须加以批评。

这一缺陷，在孔飞力的《叫魂》中，得到了修正。

又是一个平常夏天的傍晚，夕阳映照着耶鲁大学，因为长得酷似007第一任邦德——肖恩·康纳利，刚下课的史景迁，又被路人拦下来要

签名合影了。时间久了，史景迁也只能笑称：“我是肖恩·康纳利的兄弟。”


▲史景迁

事实上，这位被人追逐的“冒牌电影明星”，却是中国学研究学术圈中璀璨的明珠，他与孔飞力、魏斐德一起被称为“汉学三杰”。

史景迁的著作影响了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1980年以后，很多美国人、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都源自史景迁的作品。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高家龙

史景迁曾写过一些有关美国对中国认识的书，《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是其中一本，还有《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这本书呈现了相对理性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及这些认识的变化，还写了中国是如何惊艳到西方的。

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 孙康宜

他是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因为我觉得书想要那么畅销，最重要的就是会写，这是第一位的。如果他不搞历史，我想他就是小说家。

20世纪70年代早期，剑桥大学图书馆，史景迁非常偶然地看到了一本中文收藏——《福惠全书》。这是300年前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名叫黄六鸿的退休官吏所编撰的官场笔记。

这本记载着众多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县志，却让他眼前一亮。

耶鲁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史景迁

《王氏之死》大概有两页纸的内容，讲述了山东一位妇女王氏在下雪天被冻死的故事。黄六鸿的写作给了我一种我寻求已久的创作理念，就是完全从底层的角度讲述历史。

王氏生活在山东郯城，由此，史景迁马上联想到了《聊斋志异》，蒲松龄也生活在郯城，而且住得离王氏死亡的地方很近。叙述的空间就此打开。

正如他在《王氏之死》的前言里所说的："她对我来说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捡起的一块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愈见鲜明，使我不时地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到手持着它的生命之躯。"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高家龙

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们，还是社会底层最贫苦的百姓，在他心中，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耶鲁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金安平

他的兴趣所在，我认为应该是这些人的人性，比其他都重要，无关乎历史变革，无关乎革命，与那些非常流行的课题无关，不管是王氏，或者是胡若望，还是康熙，他都想要去理解他们的人性。

人性是永恒的，也是世界的。

2005年，史景迁访问台湾，在台北市中心举办的一场新书签售会上，歌手伍佰激动地上台去献花。这位台湾知名歌手对史景迁说，自己是他的忠实粉丝。

因为史景迁的书浪漫迷幻，常能给他的歌曲创作带来灵感。

史景迁好奇地问：“那你都看过我哪几本书？”伍佰指着桌上摆放的史景迁的作品：“这本、这本，还有这本。”他指完了史景迁所有的作品。



▲金安平

史景迁一脸幸福。

对一位学者而言，作品重于生命……

史华慈：一个孤寂的犹太人



▲史华慈

1999年夏末，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病床上，一位慈祥的老人面带微笑，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癌症复发的他已经放弃了对病魔的抵抗。

不过，这个看淡生死的老人却仍有一桩割舍不下的心事，那就是自己呕心沥血之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的翻译，迟迟没有进展。

这位老人也是费正清的弟子，名叫史华慈。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刘东

你跟他一握手就会发现他的手像面团一样，他因肝癌做过手术，每年去看望他，别的事忘了，这事他忘不了，他说你那书呢？我说书还没有出来，他说你叫我摸摸翻译稿也好啊！也没有，其实出版社当时说，这稿子还是要搁置，还不够出版的水平。

等待让时间显得漫长。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滑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服兵役的史华慈被派到了华盛顿破译日

军电码。因为工作涉及的事情都发生在遥远的东方，所以他每天不得不面对烦琐的文案，为此，史华慈常常心生抱怨，直到有一天，他破译出了日本天皇投降的决定。

战争终于结束了，但自己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命运，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这一天，美国官方报纸《星条旗》印着一则简讯“哈佛大学东亚区域研究项目招生简章”，这个小小的角落，吸引了史华慈的目光。哈佛硕士毕业又通晓多国语言，这样的个人素养，很快让他走进了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帝国。

史华慈长子 乔纳森•施瓦茨

现在，我们可能能够了解他，了解他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他处理日本情报工作时，他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自己开始进行学习，开始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

史华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这种经历，一方面让他对那些经济上落后的学生充满了怜悯和仁慈，总是慷慨地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对各种文化内部张力的敏感性和思想意识批判的犀利性。

1951年，再次回到哈佛的史华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国研究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同奇

史华慈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预测，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会走自己的道路，不会跟苏联完全一样。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中国完全套用苏联那一套。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中国并没有和苏联完全一样。所以他的这本

书——《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举成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在当时，费正清因为目睹了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局势的恶化，加之同中国知识分子领袖们的密切接触，眼见着美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扭转这种局势。史华慈后来回忆道：“在哈佛遇到费正清，我们马上被他不可遏制的紧迫感所感动。”

以费正清为核心的学术圈子里，弥漫着强烈的现实气息，他们总想为当代中国现实尽快找到简明扼要的答案。他们的近代思想史和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都受到了这一思路的影响。

而史华慈，却自觉地与这种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保罗·柯文

他认为，西方跟中国一样问题很多，充满矛盾。如果你要了解西方的相遇，你要来来回回地看，两方面都要研究，要同时详细深入地研究两边的情况。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同奇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去看他，他晚年有一种孤寂之感。他个人感觉到，自己好像与这个世界不合拍，很多时候，他都是在那看看书，但多半时间，他就一个人在那儿思考。

在史华慈眼中，三百年来美国文化的走向是有问题的，他不是否定民主、科学，但民主、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追求富强，可富强就是唯一的最高目的吗？

相比于老师费正清和其他师兄弟们而言，史华慈更愿意纯粹地探讨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他以自己的博学，把中国学研究，拓展至人类文明研究。

他努力思索的是当代人类摆脱困境之道。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侯且岸

可能和他是一个犹太裔的学者是很有关系的，他们（犹太裔的学者）都有很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同奇

史华慈说现在这个世界富强是有了，富强以后人往哪里去？整个人类这条大船往哪里走？这个方向没有了，这个问题他比较实事求是，也很谦虚。他说我们跟严复一样，包括他自己，在大海中漂泊无依，不知道往哪里去。

1999年11月14日，史华慈溘然离世。遗憾的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也未能看到《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文版的成稿。

不过，史华慈曾这样说："有的人爱中国，有的人恨中国，我尊敬

中国。”美国的中国学，不再是对博物馆中的中国狂热的爱或者偏颇的恨，而是在现实中息息相关的两个大国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理解。

一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还在路上。

第八章
文化的基因库



▲法兰克福大学

我们未来的世界将有怎样的面貌？

在科幻电影《星球大战》所描述的那场历时三年的星际战争中，人类靠着一些战斗力强、成本低廉的克隆人士兵，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代代科学家都在努力破解物种的基因密码，然而技术的进步，却未必能使丰富的物种拥有一个更好的地球。幸运的是，一个关于文明的基因库已逐渐显露它迷人的面貌。世界上每一个文明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是文明历经风霜得以长存的密码。

在长达四百年的追寻与探索中，汉学或中国学，作为中国文化

基因库的重要意义早已显现。

标本意义上的中国经典

如果不是满头银发，没有人会相信施舟人已经80多岁了。在福州生活了8年，绝大多数邻居还不知道，这位荷兰老人是国际上的一位赫赫有名的汉学家。

2003年10月，他与妻子袁冰凌博士共同筹建了这座“西观藏书楼”，这里汇集着一万五千多本从古至今的汉学家们翻译或创作的汉学著作。

几百年前，中西“礼仪之争”在这片土地上真实上演过，而今，伤痕渐渐被淡忘，教堂和寺庙在不断摩擦中找到了和谐共存的方式。



▲施舟人在西观藏书楼

但这位白发“洋道士”却从中嗅到了一丝危机。

汉学家 施舟人

现在的大问题跟我们所有的生态危机是一样的。就是这种多种不同的基因库、多种不同的语言、多种不同的动物、多种不同的植物越来越少。而且我们人类的文化，也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它也需要一个基因库。

施舟人老先生的愿望是建立一个“世界文化基因库”，保存各个族群的文化命脉。而经历千年积淀的中国经典，便是掌握中国命运的DNA。

施舟人认为，要想守护它，就必须对这些经典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而研究的前提是完善、客观的翻译。

这无疑是一项浩瀚而漫长的工程。不过，好在一百多年前，一位英国汉学家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他的中文名字叫理雅各。

理雅各重孙　克里斯托弗·理格

鸦片战争之后，到香港和中国去变得容易得多，而他（理雅各）非常想去。所以，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伊莎贝拉，一起去了香港，并将他开办的教堂和学校转移到了香港。



▲理雅各

香港英华书院院长 郑钧杰

他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你想让中国人明白福音，你先要明白中国人，先要明白中国的一切文化。

“他们的文明与我们的极为不同，但是他们早已经摆脱了野蛮愚昧。”

在当时欧洲人的概念中，中国已经是一个腐朽、停滞的帝国。而香港的生活经历却让理雅各认识到中国的另一面。“这些国民的礼貌风俗和习惯，是由他们从古代传下来的经典中所表达的思想来规范形成的。那么，一个想要弄懂中华民族的人，也就必须明白他们的古典文学。”

“子曰：三十而立。”理雅各在30岁时找到了人生目标。对此，他的好友、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博士非常清晰地说明：“这种工作，百年之中只可能被人们极为罕见地做一次。”

这个百年罕见的工作就是翻译规模宏大的中国经典。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费乐仁

这项工作特别难，那个时候，研究者基本来自东亚，当然日本、韩国有很多的工作者，可是也都属于东亚文化的，他是第一个东亚文化之外的研究者。

理雅各重孙 克里斯托弗·理格

当他失去他妻子的时候，即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伊莎贝拉，他遭受重创，因为之前他也曾失去过孩子，他第一任婚姻中的第二个孩子也去世了，那个孩子一直不太健康。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悲怆的事件接二连三，这促使理雅各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了翻译工作中。似乎也只有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中国典籍中，他才能暂时忘记内心的伤痛。

1861年，在一个英国商人的资助下，《中国经典》第一版在香港陆续出版，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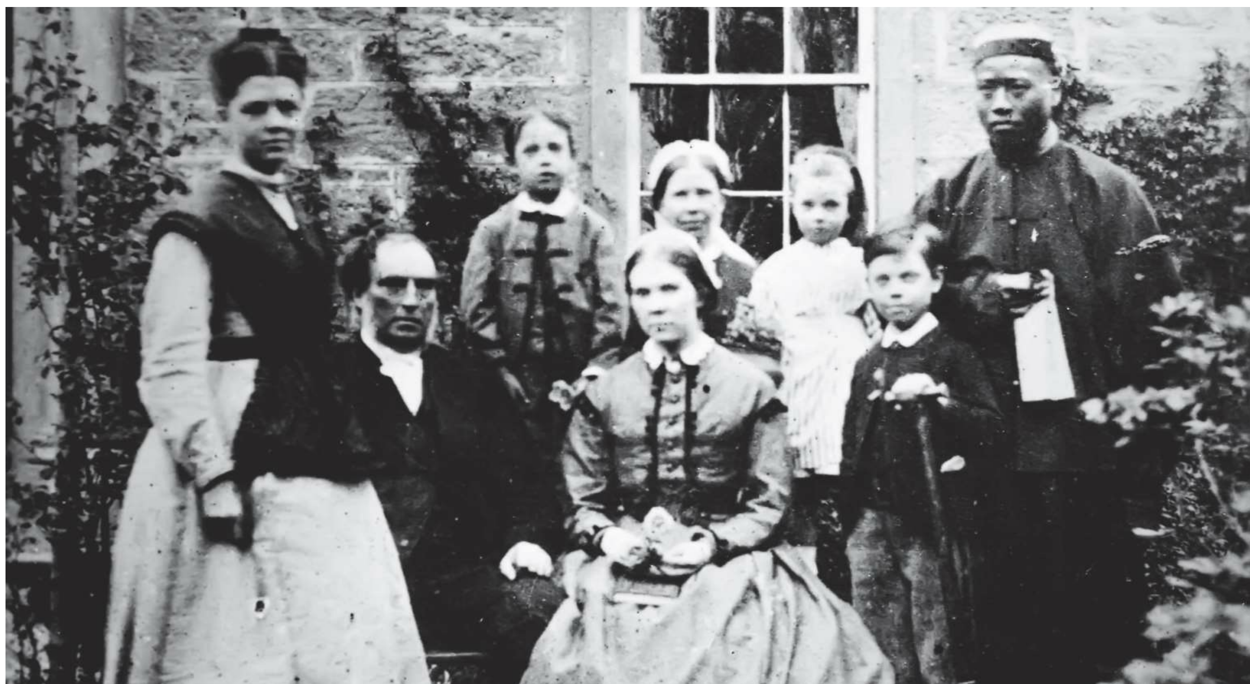
但翻译工作占用了理雅各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使得他与伦敦传道会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写给传道会的特别申请中，理雅各委婉地提出，“传道会还会有更能干的代理人”，而“我总是将自己的伟大使命牢记在心”。

理雅各终结了自己的传教士生涯，为此，他失去的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富裕生活——豪华的宅邸，配有奢华的设施和桌子，可供差使的仆役，以及充足的港币”。但是，很显然，他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尊重。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费乐仁

应该是1865年，他去（日本）横滨，那个海关人员一看他的名字，便用英文说：“理雅各？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者吗？”理雅各倒是比较谦虚的，他说：“对，就是。”（海关人员说）“欢迎，请进！”

1875年秋，61岁的理雅各，荣获首届法兰西文学院“汉学儒莲奖”。这被誉为“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同年10月27日，他在谢尔德廉戏院发表就职演说，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



▲理雅各及其家人

又过了10年，在清末著名思想家王韬的帮助下，理雅各翻译的《礼记》在伦敦出版，前后进行了25年之久的《中国经典》的翻译落下了帷幕。

计划内的工作已经结束，但计划外的中国研究还在继续。

晚年的理雅各教授习惯在凌晨3点钟起床工作，那时候，家人还在安睡，亮灯的书房曾引来值夜班的警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理雅各翻译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屈原的《离骚》，那一年他80岁。两年后，1897年11月29日，牛津克贝尔路3号，那一抹熟悉的灯光熄灭了。

悼念的信函，如雪片般从世界各地飞来……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很难用理性去解读。

就在1897年冬，当一盏灯在牛津熄灭的时候，另一盏灯，正在剑桥点燃。12月3日，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外交官全票当选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并开始了长达35年的教学生涯。他就是翟理斯。

4年前，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其中收录了韵体《三字经》和《千字文》的英译文。

谈到自己翻译这两首诗的动机，翟理斯说，其实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有一位传教士白纸黑字地指出，要把这两首诗译成英文韵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不相信！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艾超世

他一直想很准确地翻译《聊斋》，我想他一共出版了4版，《三字经》有3版，其他的，他的字典有两版。

星星的魅力在于相互照耀。

然而，与理雅各不同，冥冥中翟理斯却踏上了另一条轨道。他将中国传统中被视为“野史稗闻”“街谈巷语”的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都搬上了世界文学的殿堂。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绍祥

翟理斯自己的翻译面也涉及得非常广，从《佛国记》到《庄子》，他均有涉猎。而且他所翻译的《聊斋志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最全的英译本之一。

1883年，翟理斯自费印刷了一本《古文选珍》，第一次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中国数千年来散文、诗歌的恒久魅力。

远东报纸《先锋》发表书评称：“理雅各博士所做的巨大努力，确

实使猎奇者可以轻易地得到儒家经典；但是，中国大量的文学作品现在仍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新近出版的《古文选珍》，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国文化的基因以更丰富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翟理斯



▲《古文选珍》

而世人眼中的翟理斯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绍祥

翟理斯和他的三个儿子先后都断绝了父子关系。他的一个儿子，就是时任天津总领事的翟南斯，在担任领事期间，经常会给他写信，描述中国的内战、暴乱，还有局势不稳等。这在翟理斯看来，完全不符合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因此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退了回去。

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性情比较沉闷，就像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一样，没有笑的能力。为了消除偏见，1925年，翟理斯特意从清代的《笑林广记》中选译了242则笑话，这就是《中国笑话选》。

今天，翟理斯是牛津的骄傲，也是剑桥的骄傲。但翟理斯的骄傲却一直是他的第二故乡——中国。

永恒的“中国心灵”

又到了一年秋天，青岛市第九中学迎来了2013级新生。

在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这些新生之中的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高中的校徽上会印着“礼贤”二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方维规

青岛九中的前身应该是青岛最早的新式学堂，就是礼贤书院。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这里培养了八位院士和其他不少优秀学生。创办这所学校的是一个名叫理查德·卫礼贤的德国人。

1899年5月12日清晨，在山东青岛的一家小宾馆内，理查德·威廉被一阵尖厉的噪声吵醒。“我揉眼睛的时候，一只公鸡就站在我的床边打鸣，一群母鸡则在地上刨个不休。”

这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从来没见到过这种景象。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种机械文明，生活被不断地物质化，他们习惯从机械、技术的角度来观察人。而此时的青岛，虽然已被德国侵占，“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但本质上，仍与欧洲相差甚远。

这个青年的任务，是“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人的灵魂”。但他没有想到，他最终在这里生活了25年，而且改名叫卫礼贤。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朗宓榭

在德国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在中国，他非常有进

步。他建起来的这所学校是很多传教士曾经在国外所追求的梦想之一。

北方的傍晚宁静而祥和，“姑娘媳妇们坐在院子的门洞里说笑闲谈，老年人则聚在他们的保护神——关帝的小庙里，或是大树下，抽着旱烟袋，谈论着村中事务或天下大事。”

卫礼贤，慢慢被一些细碎的生活细节所吸引。

“凡是写下来的东西都是神圣的，随意丢弃写着字的纸张都被视为犯罪。”虽然儒教在中国已经走下神坛，但“知识同时也就是宗教和道德观”。



▲卫礼贤

卫礼贤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理性的文化”，它展示了一种“追求和谐、遵循宇宙和社会中的组织理性的理想”。（《中国心灵》）

辛亥革命后，许多清朝遗老和风云人物都跑到了青岛。这使卫礼贤有机会与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师进行深入的交往。



▲卫礼贤和恭亲王

1912年2月，他和逃难至此的恭亲王溥伟成了很好的朋友。听说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非常感兴趣，于是，恭亲王建议他翻译《易经》，并且还推荐了一个人与他共同翻译，那就是清朝遗老——著名学者劳乃宣。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朗宓榭

劳乃宣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这本书也影响了他的知识构成，卫礼贤的知识构成，也就是说，歌德、席勒、康德等人以及劳乃宣（影响了他）。

德文版《易经》一出，立刻触动了欧洲读者们的神经。

在当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从前常常被他们鼓吹的西方文明开始腐烂变质。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危机，更是没落。

从东方寻找新的意义，这也是卫礼贤关注中国文化的原因。所以，

他把来自中国的人生智慧，推崇为现代欧洲的良药和救赎。

在《易经》的前言中，卫礼贤的挚友、分析心理学派的开创者荣格称赞说："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受《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创见——"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基石。

百年后的今天，一部名叫《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的纪录片，在德国热映。今天的德国人也很想知道《易经》带给了他们什么。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卫礼贤的孙女——贝蒂娜·威廉。

卫礼贤孙女 贝蒂娜·威廉

这是一次通向他的旅行。大致来说，我现在也能理解为什么他能在中国哲学中获得这么多的答案。这也使我十分庆幸家里有祖父曾走过这条道路，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电影跟随他的脚步，更多地解读人生。

1924年，卫礼贤被法兰克福大学聘为汉学教师，在归国前，他拜孔庙，告别师友，并专程向蛰居青岛的康有为辞行。

这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但是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种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



▲德文版《易经》



▲贝蒂娜·威廉

在德国南部小镇巴德·博尔的公墓里，有一个中国韵味浓厚的墓碑格外引人注目。57岁的卫礼贤便长眠于此。

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张君劢先生在评价自己的朋友时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回顾自己的一生，卫礼贤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介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

1989年9月，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剑桥的一座小教堂里，一段婚外恋情终于有了圆满结局。但即便得到了妻子的原谅，这位名叫李约瑟的老先生还是让自己的中国情人鲁桂珍，等了整整半个世纪。



▲卫礼贤墓碑

1937年夏天，康桥边的柳树下，李约瑟第一次见到中国研究生鲁桂

珍的时候，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磁力。

打动李约瑟的正是鲁桂珍身上散发出的文雅与冷静。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 莫弗特

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之后就一起去了李约瑟家成其好事。谈话间，李约瑟手持香烟问鲁桂珍：“‘烟’在中文里怎么写？”于是她就给他写了，这是他第一次认识汉字。



▲李约瑟与鲁桂珍

这个方块字仿佛远处一扇神秘的大门向他打开。六年后，对中国着了迷的李约瑟毛遂自荐，希望去帮助中国重建科学社会。

1943年初春，李约瑟在昆明军用机场下了飞机。在前往市区的路上，路边一位给李子树做嫁接的老园丁吸引了他的目光。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古克礼

这个国家的人或许在解决和我们一样的技术性问题，但采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这个小插曲，只是他遇到的诸多惊喜中的一个例子。

观察嫁接技术，引发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大量思考。同时，他也开始竭尽所能，为在战火中勉力维持的中国科学研究提供援助。

然而，战争局势的变化让李约瑟意识到，要完成所有心愿，并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他就必须马不停蹄。



▲年轻时的鲁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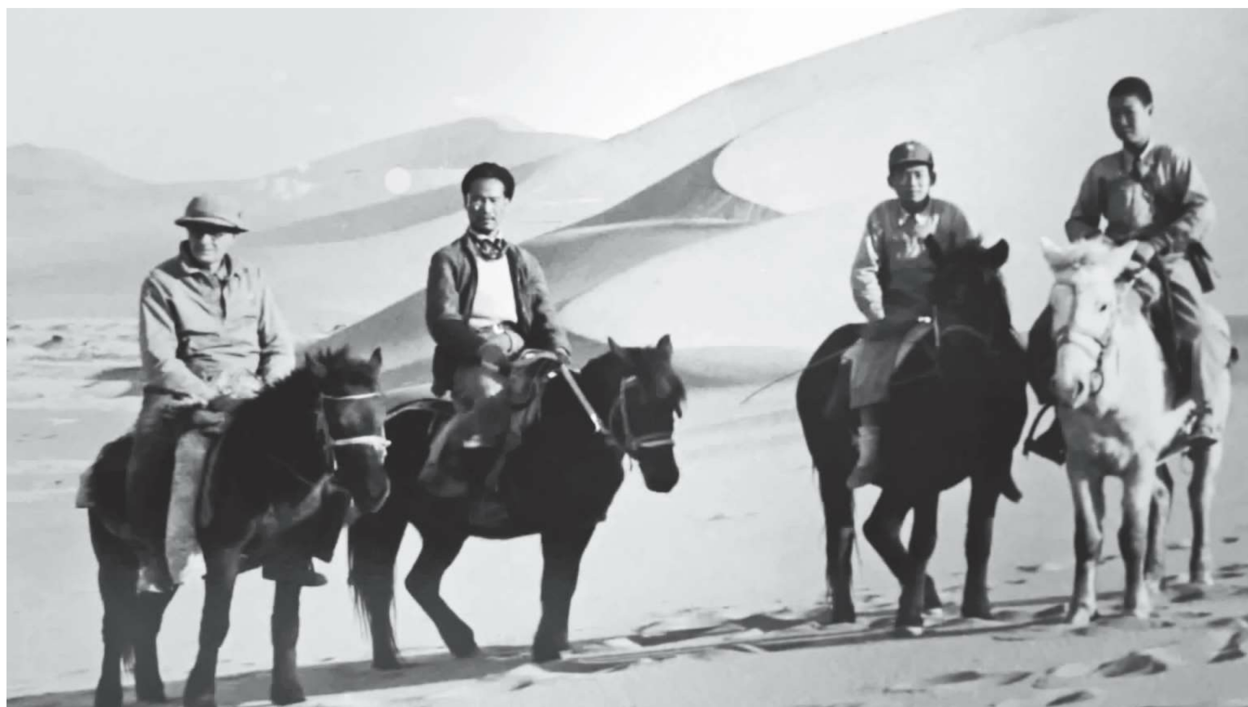
▲古克礼

2013年9月，一行特殊的外国人缓缓穿越一望无际的甘肃大漠。

他们之中，有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以及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专家等。这个由英国英中了解协会会长佐伊·里德组建的访问团，正在重走70年前的李约瑟之路。

英国英中了解协会 佐伊•里德

我父亲当时和他的朋友一起在团队里负责伙食和后勤。我特别高兴今天我来重走他当时走过的路，我能想象他当时还是个少年，而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遇见李约瑟是他新生命的开始。



▲李约瑟重新踏上北上之路

然而，最初这并不是一次顺利的旅途。

刚出重庆地界，他们就遇到了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为此前后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司机惊恐地认为这是一个凶兆，他们的旅行注定要倒霉。

一语成谶！李约瑟原本打算向北踏上丝绸之路，然后拜访敦煌。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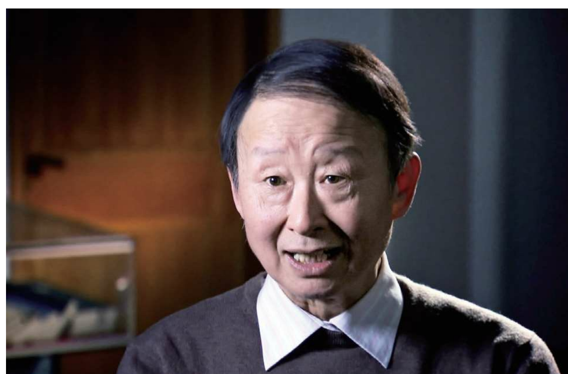
计划赶不上变化，从第二周开始，“卡车抛锚”“没完没了的等待”和“突如其来的灾难”等字眼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李约瑟老师陈国符之子 陈启新

李约瑟参观访问了中国很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结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和科学家。他看到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学者仍然在学术领域里不断地进取，并且学校仍然在招生，培养着国家需要的人才，很是感动。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古克礼

所以他开始问道，“既然现代社会之前的中国就有人像欧洲人那样研究科学，或许科学革命本来会发端于中国而非欧洲”。于是，“李约瑟难题”诞生了。



▲陈启新

一个曾经一度辉煌的文明，是否就此走到了尽头呢？中国的文化，是否将如同亿万年来那些消失的物种一样，一去不返、再无踪影呢？

1948年，李约瑟回到了剑桥。对“李约瑟难题”的不断思考使他有了新的想法，他要让中国重归世界先进国家的万神殿中应有的位置！

1958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李约瑟正为第一手中文资料的匮乏而发愁，忽然接到了门卫的电话——那儿有一大批木制茶叶箱，收件人是李约瑟。

谁会莫名其妙寄来这么多箱茶叶？

李约瑟好奇地打开了木箱，里面满满的都是各种珍贵且深奥的文件

和书籍——这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来自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在这批资料中，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那就是当时，或许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书，1888年版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翻印本。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读到这些书时的激动心情”，李约瑟后来如是写道，“如果说是什么激励我写这本书的话，则非它莫属了。”

语言学家 许嘉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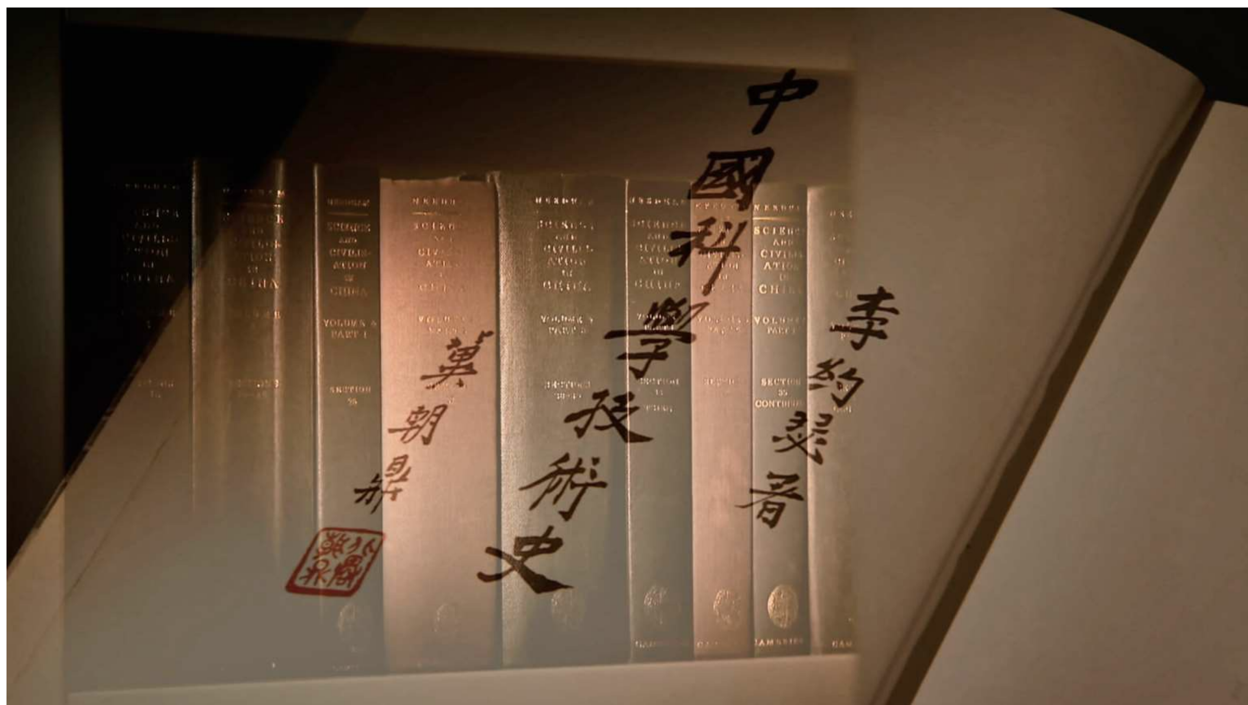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发明，影响世界历史变化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应该不下千百件。这在李约瑟先生的书里就有体现。但是为什么自古我们只说四大发明，因为这四大发明是这个发明里改变人类命运，推进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最重要的四个，是所有贡献里最突出的。



▲许嘉璐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 莫弗特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一部是1954年在中国出版的，1952年李约瑟第一次遇见周恩来的时候，他承诺将给周恩来寄去一本他的书。然而在1954年他没去成中国，但很多其他的外国团体得以去中国，其中一位是当时在剑桥教授中文的教授——爱德华·波利布兰克，因此李约瑟将自己的一本书给他，让他转交给了周恩来。



▲《中国科学技术史》

从1953年到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出版了七卷，它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西方人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到，原来创造新世界的工具——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源自中国！

李约瑟为它们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四大发明。

1937年夏，历史留给中国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伤

疤。但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一段阴错阳差的爱情，一位汉学家毕生的努力，最终却为跌入谷底的中华儿女，找回了一些自信和尊严。

高罗佩：文学意义上的“狄仁杰之父”

2012年10月，“元芳，你怎么看”莫名其妙地在网络上疯传。万事皆问“元芳”，使得“元芳”这个词在一天内被查询了250万余次，俨然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元芳，全名李元芳，是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创作狄仁杰小说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荷兰的汉学家，他就是李约瑟在重庆时的密友高罗佩。



▲“元芳，你怎么看”成为热门搜索词



▲高威廉

高罗佩长子 高威廉教授

狄仁杰是一个具有非常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而且非常聪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官也是学者，对弹古琴、收集艺术品等有兴趣。恰好，狄公的这些兴趣和我父亲是一样的。

美籍华裔作家 朱小棣

我觉得这个小说很好看，就一口气把他的十五六本的小说全部都看完了。看完了就心潮起伏，有种非常强烈的冲击，一种创作冲动。这种东西主要来自于什么？就是我忽然发现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所描绘和架构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于我是如此熟悉。

朱小棣，美籍华裔作家。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所中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正是高罗佩创作的《狄公案》触发了他的灵感，令他沿着大师的轨迹，续写着狄公的传奇。

那么，高罗佩的创作动机又是从何而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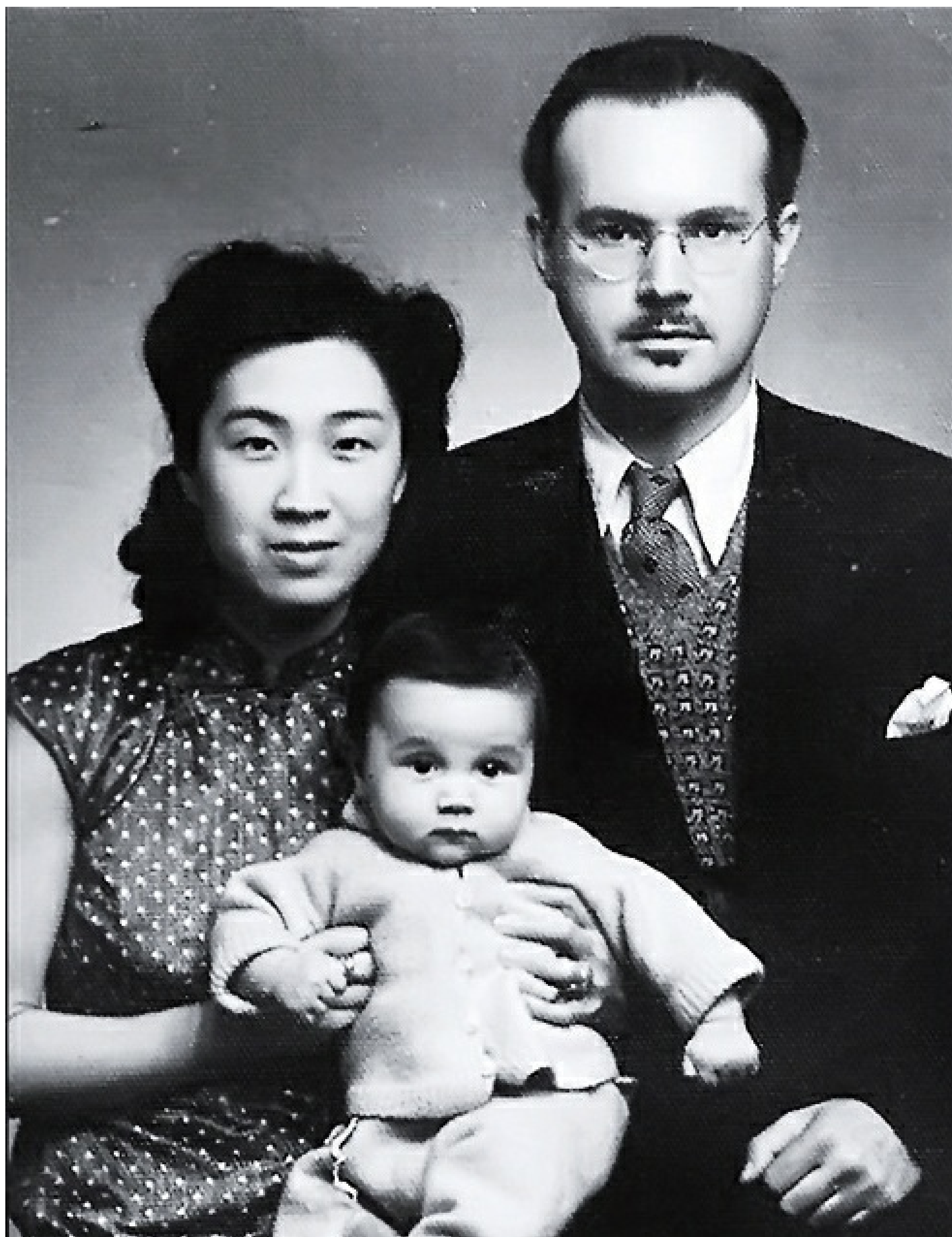
1943年3月，高罗佩作为荷兰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抵达了重庆。

当时的重庆，旧城几乎全被炸毁，但高罗佩很是喜欢——这里正适合他这样的冒险家。在那段充满紧张气氛的岁月里，各大使馆的酒会是外国大使和中国官员最轻松的交流场合。

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酒会上，一个女人，走进了高罗佩的生命。她的名字叫水世芳。高罗佩后来才了解到，她是晚清洋务大臣张之洞的外孙女。



▲朱小棣



▲高罗佩全家福

高罗佩女儿 高宝琳

在战争中，婚礼前后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战争代表着仇恨，但是婚礼则让人们庆祝爱情，庆祝和平。这显示出，维纳斯的力量要比战争更强大。

水世芳成了高罗佩的中文老师，这一教便是一辈子。高罗佩坦言：与世芳结婚，是“希望把东方人的智慧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产生特别的东西。”这也正是我们保护文化基因的价值所在。

《琴道》是中国古琴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通过这本书，西方世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这一古老的乐器和它博大精深的文化意义。

它的作者正是被称作“古琴大师”的高罗佩。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施晔

为什么说他是古琴大师？古琴在什么场合弹奏？它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在蛮人面前是不可以弹琴的，所谓蛮人的高罗佩，不仅得到了这些中国友人的接受，同时也成了天风琴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担任了天风琴社的秘书。



▲天风琴社旧影

1948年，高罗佩被派驻日本。当时，日本青年人的偶像是福尔摩

斯、格雷警长等西洋侦探，这让高罗佩深感意外。

“当我发现书市上有大量日本年轻作家写的关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三等侦探小说时，我决定发表《武则天四大奇案》的英译本，以向那些作家展示古代中国侦探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好题材。”

第二年，高罗佩自费出版了清末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的英译本。出人意料的是，在六个月内，他不光收回了成本，而且还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突如其来的灵感让他狂喜：为什么不能创造自己的狄公呢？

1950年3月15日深夜，高罗佩在案前近乎疯狂地埋头写作，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累得倒头睡在了书桌上，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午饭后，第一部原创的狄公小说《铜钟案》完成了。

高罗佩次子 托马斯·范·古力克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忙于研究狄仁杰的故事。我的卧室就在他书房的隔壁，我半梦半醒之际，经常会听到他打字的声音，便知道他在写狄仁杰的故事了。

高罗佩外孙女 高若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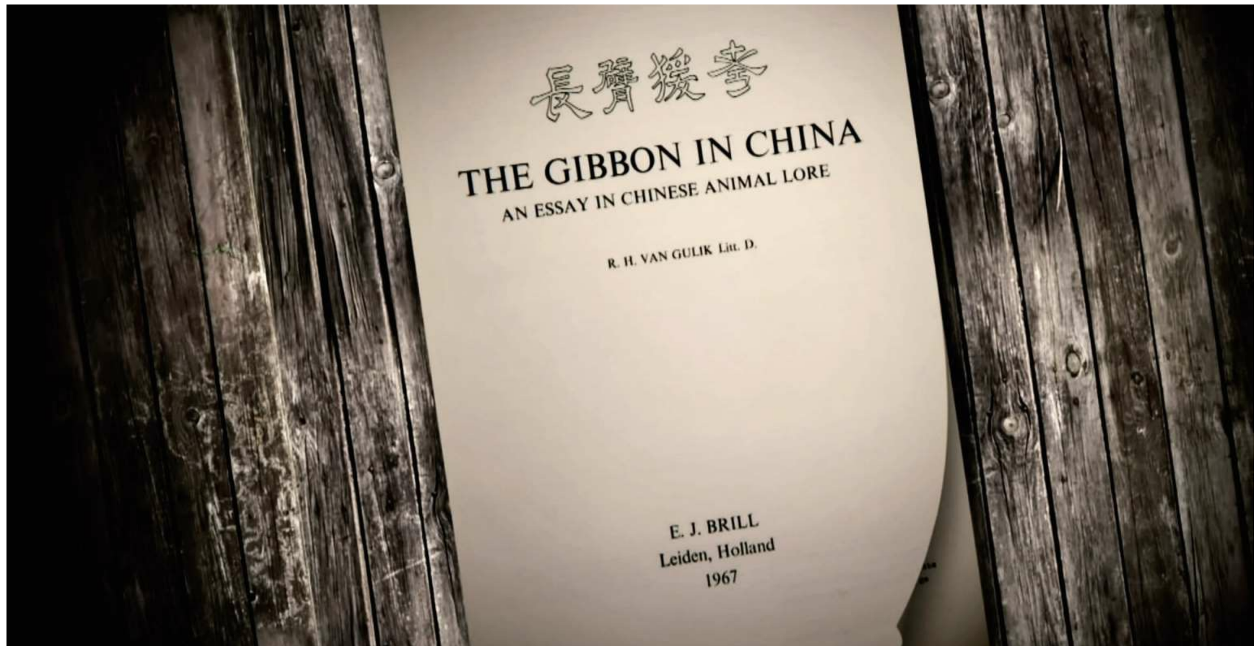
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很有名，即“狄公就是我”。所以，他将自己欣赏的所有中国传统的特点，以及他崇拜的士大夫的品德都赋予狄公。而且，他把自己所有科学方面的知识也都赋予狄公。

“我就是狄公。”微醺的高罗佩在喝完一杯清酒之后，喃喃地说道。

晚年，这位另类的汉学家曾以长臂猿为宠物。这一嗜好，又促使他开始研究这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并辑成了他最后一部专著《长

臂猿考》。

高罗佩曾亲自收录过一段猿鸣声，并灌成黑胶唱片，不知道当时的他是否也想起了那句诗“猿鸣三声泪沾裳”。



▲《长臂猿考》

走向未来的纽带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这句话，出自《易经》。几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通过各自的方式深入中国，检索着中国文化的基因，探索着人类前进的方向。而当初那些极细微的差异，在不同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21世纪，当“全球化”三个字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汉学或中国学，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没有基于全球伦理标准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就没有全球的和平与正义。”



▲“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成立典礼

2012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成立典礼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一个叫“世界伦理”的概念受到全球瞩目。

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 成中英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应该了解到建立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从中国来说，中国有非常优美、非常美好的人性哲学、伦理哲学、文化哲学、宇宙哲学的传统，我们很希望和大家去分享。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朗宓榭

我们想要知道人们怎么做，因为我们认为人类在未来这一问题上，在对未来的兴趣上，有很大的共性。我们都会好奇，都想去了解。但是探究未来的方法在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却是大不相同的。我们正是从中国开始着手研究。并且我们非常幸运，还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支持。

上川岛，风景秀丽一如往昔。

四百年前，在此苦苦等待的沙勿略至死未能踏入大明国土，从那时起，一代代寻路者试图揭开中国神秘的面纱。而今，定居于福州的“洋道士”施舟人早已习惯喝上一口铁观音，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汉学家 施舟人

我们需要中国伟大的文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需要一个新的影响，就需要一个新的能够发展的肥料，一个新的因子。关于这个事情我后来在美国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文化基因库》。



▲上川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正是经过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四百年，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文化独特的精神世界，通过各种译本翻译传到了欧美世界。从我们的儒家、道家、佛家，从我们的戏剧、小说、绘画，整个中国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汉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展开。相对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他们多少都显得有些另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一样”，才使“汉学基因库”变得更加完善和丰富，而汉学或中国学作为一个文化基因，又是“世界文化基因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有了解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这个民族，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会有一种基本的认识，即世界上还存在与他们自己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

关于未来，我们在猜测，我们在期盼，我们在呐喊，我们在寻觅。汉学或中国学，是否会是人类走向和谐共生的纽带呢？

附录

导演手记



有一些地方很少有人知道

提笔时，想起了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懂这句矫情的话什么意思，但在拍摄《纽带》的过程中，我常常有和这个名字一样的感受。

在澳门，城小车多，单行线的设置让这里很少堵车，但眼见很近的地方，打车却要绕很多个弯坡。跟司机说去马礼逊墓地，第一个师傅说不知道，拒载了。碰见第二个，犹豫了一下，问是不是基督教坟场啊？然后把我们拉到了墓地斜对面的另一所教堂。下车问了几个当地人，拐来拐去，找到了拍摄地——马礼逊小教堂，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所教堂。

秋日阳光充足，树影打在晃眼的白色围墙上，映着满园落地的鸡蛋花。捡起几朵走到后院，错落有致的基督徒墓碑中，马礼逊和夫人玛丽的墓碑显得格外静谧。

现今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有一份告示，是清政府颁布禁烟令后贴出的一份驱逐在澳门的英国人名单。这份告示的英译本，就是200年前身在澳门的英国人马礼逊所译。今天，遇到困难的中英生词互译，我们随时可以查询到任何版本的词典。但创造首部《华英词典》的先辈，也正是长眠在这里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在最后的《纽带》成片中，关于这位很少被普通人知道，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贡献卓越的传教士的内容，被缩减很多。因为同样在肇庆，我们还找到了埋藏在居民巷的利玛窦旧居；在上川岛，找到了为传教士开辟前路的首位来华使者沙勿略；在杭州，找到了率先返回欧洲为

中国礼仪申辩的卫匡国等。

在拍摄间隙，不时会遇见捧着花的外国人到教堂或是墓园祷告，也偶尔会遇见误打误撞的游客觉得这里风景优美来拍照留念。在语言交流已没有太多障碍的今天，在太多貌似熟悉的地方，为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们，还有很多故事很少有人知道，还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感知他们的存在。

孟妍

《纽带》第一集导演

欧罗巴印象

回想起来，进入《纽带》摄制组，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纽带》可以说是我第一个完整参与的节目。从前期的资料收集，到后期的制作包装，这其中的困难，只有参与到其中，才能切身体会。

汉学与汉学家，这些完全飘散在我“知识圆”之外的概念，都因为《纽带》，走入了我的生活。进入汉学的知识体系并不难，最难的是将那些300多年前发生在欧洲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再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为此，整个剧组的同事们翻阅了无数的书籍，查询了无数的资料，甚至因为在网上看到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而多方考证。

但是，毕竟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认真研究汉学，知识的根基并不牢固，完成的初稿有很多的漏洞与错误。于是，我求助于北京大学的孟华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许明龙老师，两位老师非常耐心地帮助我讲解当时真正的历史背景，并在我的初稿上做了非常详尽的批注。拿到批注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批注的字数几乎与初稿的字数差不多。两位老师认真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深深打动了我。在此，向两位老师对我、对《纽带》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次意大利和法国的拍摄，是我第一次踏上欧罗巴的土地。来之前，对欧洲的印象，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仿佛所有的欧洲人都过着英国王室一样的生活。最起码，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事实上，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大，罗马火车站里，空气中弥漫着大麻的味道；巴黎歌剧院门口，我们也看到了专偷游客钱包的北非偷渡客；还有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流浪汉……这样现实的欧洲，

和“网上”或“脑海”中的欧洲，可谓有天壤之别。或许，几百年前，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上的传教士也有相似的感觉吧。

在意大利的拍摄，我们有幸赶上了教皇巡街，巡街仪式在上午10时正式开始，我们提前3个小时就到了圣彼得广场，但此时，这里已经人山人海。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信徒们聚集在广场上，就为了能看到教皇的真身。虽然我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也能被这信仰的力量所震撼。由于我们所在的媒体席可以在很近的距离看到教皇，一位来自巴西的母亲，希望让我把她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抱给教皇，得到教皇的“摸顶赐福”。这让我很为难，我知道一个孩子能得到教皇的赐福，在基督教徒的心中意味着什么，但是职业的素养告诉我，我不能将手中的摄影机放下。最终，我拒绝了这位母亲。

在欧洲的一个多月，我不断地想起这件事，直白地说，我真的有些后悔。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会把机器给这位母亲，抱起她的孩子。可是，世上没有什么如果，而这件事也成为我在这次拍摄中感到最遗憾的事情。

高雪崧

《纽带》第二集导演

记史华慈先生

“房子卖了，墓地也卖了，你懂的，我可是赚了一大笔钱啊！”这笔横财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变。

史华慈先生松开了衬衫领子，有些臃肿的脖子终于解放了。他那本就洪亮的笑声，又放大了一倍。

采访结束后，史华慈先生带着摄制组，去往当天最后一站——墓地。

“原本的墓地离这里很近。当时他刚刚入土，地产商打电话告诉我，墓地升值了，一转手就能赚四万美元。”犹太血统的史华慈先生似乎很善于理财。一路上，还在不停地传授着他的理财经。

显然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所以我试着转移话题，“他曾经和你聊过什么关于中国的事情吗？”

“说过一些，但我们没有兴趣。你知道的，我们兄妹几个人是标准的美国人，每天上班、下班、看橄榄球比赛。事实上，我们最多的话题是橄榄球赛。”

我终于还是见到他了，在那片墓地的角落里，在那块崭新的墓碑上——本杰明·史华慈。

本杰明·史华慈，是美国历史学界的骄傲、中国学泰斗，其天才的研究独辟蹊径，堪称中国研究界的“爱因斯坦”。在他有生之年，几乎把学术生涯全部献给了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爱中国，有人恨中

国，我尊敬中国。”他是我此行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说，也是我此行的动力。

对史华慈先生而言，他只是一位慈爱而忙碌的父亲。但作为儿子，他几乎都不知道父亲在忙碌什么。

事实上，在见到史华慈先生之前，我就已经从他父亲的邻居那里听说了另一个故事。在父亲死后，在他卖掉父亲的故居之前，他就把屋子里所有父亲珍藏的中国文物，全都扔进了垃圾桶。随后不仅得到了史华慈先生的亲口承认，而且还听说了他倒卖父亲墓地的故事，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败家子！

此时此刻，站在本杰明·史华慈的墓前，我真不知道是该悲哀，还是该愤怒。作为一代大师的后人，就算不是将门虎子，至少也不应该是眼前这副样子吧？靠倒卖先人墓地、甩卖遗产，还是以甩为主，以卖为辅过日子的史华慈先生。这要是放到中国，死人也得让气活了。



▲《纽带》导演组在史华慈先生的院子里进行拍摄

不！也许不是这样。盛怒之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幸好这不是在中国。

理性的克制，这是本杰明·史华慈最大的特点，从那句“不爱不恨，只是尊敬中国”，就不难看出。他爱自己的孩子，他也热爱研究中国，但这只是他的爱。他没有选择把自己的爱强加给孩子们，从小就向他们灌输关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中国对他很重要，但凭什么就要对自己的孩子也重要？他的一生轰轰烈烈，但凭什么自己的孩子就不能平平淡淡？

大师也罢，混子也好，人的一生哪里又有什么高下贵贱呢？作为一个父亲，本杰明·史华慈送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就是选择的权利。也许他不仅是位学术大师，也是一位好父亲。

我并没有为我之前不太友好的态度向史华慈先生道歉。一方面是我羞于启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无法向他解释清楚我生气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孝道。幸好，史华慈先生显然不需要我的道歉，他还在不停地讲着只能逗乐他自己的笑话。

拍摄完成，临别时分，史华慈先生面色严肃地走到我面前，问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来时候的油费谁给我报销？"

任志勋

《纽带》第三集导演

邂逅伯希和

“傍晚六点，在走完这走不完的一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到达了千佛洞，我自然是那里的不速之客。”

——伯希和，1908年2月25日

他，形容瘦削，目光坚毅，胡子拉碴，踌躇满志；

他，曾在庚子之乱中大显身手，夺取一面义和团军旗；

他，从巴黎到敦煌，走过被岁月掩埋的丝绸之路，不辞万里；

他，精通十余种语言，凭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游刃于中国的文人墨客之间绰绰有余。

在有的人眼中，他是“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也有人说：“如果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

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在“择偶”（选择偶像）方面犹是如此。但是，当我得知这些元素浓缩于一位百余年前的法国青年时，我的心底，埋下了一粒崇拜的种子。

他叫保罗·伯希和，名字后面总是挂着一串长长的头衔：法国汉学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法国亚细亚协会主席、巴黎中国学院院长等，以及《纽带》第四集《抢回去的学问》中的主人公。

于是，启程。捕风捉影。

飞往欧洲的航班上，我陷入了深思。从北京回巴黎，当年的伯希和先生，应该是会乘火车穿过茫茫西伯利亚。如今直飞的航班，与当年的路线并无二致。

在深夜的机舱里凝视屏幕上那条轨迹，我心中感慨万分。

世人常将伯希和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人相提并论，殊不知，他们对敦煌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相比于斯坦因的贪婪、华尔纳的残忍，伯希和是一位真正的学者。除却想把这些宝贵的遗产化为法国的财富以外，他是真正害怕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会遭遇不测的人。在艰辛的归途中，他甚至不顾劳累，将最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



▲《纽带》编导采访于连

纵然，回首这些往事，国人当然是心痛不已，可是百年前的中国，备受凌辱，哪里又有保护先人遗产的余力？

有信仰的人总带着一颗朝圣者的心，憧憬着不经意间会有那么一刻，与圣人在旅途中心有灵犀。

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与法国远东学院，聆听学者们津津乐道于伯希和先生人生中的精彩，也理性地分析他学术上的旨趣。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获睹千余年前的敦煌写本至今完好如初，穿在卷子上的麻线仍然健在。

在吉美博物馆，邂逅了每一件藏品的微笑，与古希腊遗迹中的神像何其相似，文明并不会因为语言、地域而被阻隔。

处于开拓期的学术时代，总是令人向往，不断涌现的新领域点燃了人类的学术激情。伯希和与敦煌的邂逅，也为敦煌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或许，有时会突然冒出生不逢时的念头，但若生在那个时代，又如何知晓这些传奇的人生。

如此人生，拿来回望，定要比亲身体验合适得多。

屈楚
《纽带》第四集导演

为什么出发

那天非常热，几个编导挤在一辆商务车里，堵在西三环。我们正要去拜访一位北大教授，沿途七嘴八舌，聊起了片子的构思。

“你知道汉学是什么吗？”

我一愣，汉学，不就是和中国有关系的学问吗？

“那国学和汉学有什么区别？”

天啊，好像是有区别，但区别在哪儿？同事的随口一问，给了刚进组的我一个巨大的打击。

“汉学，简而言之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而国学，是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

和每一个刚刚了解这些的人一样，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外国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学问？咱们又为什么要去记录他们呢？同事说，你不知道吗，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也专注得多。

凭此思路，我开始“顺藤摸瓜”。外国人为什么研究中国？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400年前的西方传教士们，开启了最初研究中国的热潮，他们的出发点是传播教义；而在那之后，外国对中国资源、商品的觊觎，又促使了更多关于中国的研究；到了现代，崛起的中国实力，是否又是促进新一轮汉学研究的内在推动力呢？

当然，这些因素全都出自我的猜想，做片子、讲故事，还得从最基

础的事实出发。我在心里暗自憋了一股劲儿：倒要看看他们是为了什么。

当年9月，同事们倾巢出动。我的任务是奔赴甘肃，一路跟拍一支国外的汉学家队伍游览敦煌的过程。那是我第一次去敦煌。

路上，一位有着亚洲面孔却说着英文的女士，意欲和我交流。车微晃，我蹲在她边上，听她讲父亲的故事。

她说，她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国人，因为结识了李约瑟而来到敦煌。李约瑟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中国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有三个是他提出的。在她父亲的眼中，李约瑟对中国完全有种如饥似渴的好奇态度，对于中国未曾被发掘的科学技术，对于20世纪初那些有着先进头脑，却淹没在战争中的中国学子，他发自内心地同情，并在本不该他来承受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

如果推究他这么做的原因，或许是巨大的好奇，更或许是来自对一位中国姑娘的爱慕。对于我的刨根问底，女士有些疑惑。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此简单的理由，真的就能带给他乘着简陋的飞机前往中国，穿着破旧的棉大衣、拉着一条大狗走进荒漠的勇气？

车外，远远能望到石窟。从入口直至走进石窟，我们没有再交流。但洞里叹为观止的石窟，给了我们默然的答案。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出发，或许不重要，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可当你真的到达这里，领略了这股神秘而厚重的力量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并不仅仅属于某一国度，而是世界文化基因库里难得的一员。

猜想那些汉学家们也有同样的感触，但这种感触却很难简单表达。汉学家们选择用毕生的研究来表达，而学识浅薄的我们，只能依附着他们的故事，悄悄透露一些自身的感触。

朱允
《纽带》第四集导演

给汉学家画像

《纽带》，初听这名字，似乎很难把握片子要讲什么。所以每每约专家采访，或者给亲朋好友介绍时，总要“转述”阐释为：讲“海外汉学”的片子。而这样一来，大抵又不得不解释下什么是“汉学”……学术循环，无穷匮也。一觉书斋气浓厚，二觉好生隐晦。

言归正传。时间到了2013年的尾巴，大规模的剪辑制作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不舍昼夜。然而就在此时，还存在“缺医少药”的情况：这个画面没有，那个采访没说，等等。其中，很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故事的主人公没有适用的影像资料。怎么办？画。把没有的画出来，把模糊的画清楚，把年迈的画年轻，把青春的画老朽……而这个“重任”的一部分，也意外地落在了我身上。

2014年元旦，网购的画板、纸、笔到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50多根不同型号的笔一字排开，10平方米的小屋显得更加拥挤。就这样，带着大家的信任，已经辍笔8年的我，在新年头一天，重新拾起了画画的“童子功”。

自此，白天公司剪片，晚上回家画像，就成了随后两个月工作的基本节奏。

给汉学家画像，这是一项多么高尚的工作。因为通过前前后后数月的深入了解，甚至住他们住过的城，走他们曾走过的路，翻看他们那些带着岁月沉香的书稿，了解越深，钦佩也就越多，能为这样一群有着特别情怀的人画像，自然是幸运的。不同于拍摄、剪辑这些人的故事，画，需要直面，直面他们的眼、耳、口、鼻，直面他们的高、低、胖、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室藏大清国国书

瘦，这就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去体会、去想象、去丈量、去描摹，而在这个过程中，一笔一丝的把握，你都能感受到流露于这些汉学家眉宇间浓浓的“中国气”，像孔飞力、阿列克谢耶夫等，虽然都典型的欧洲模样，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但眼神似乎都是儒家式的、诗意的、平和舒缓的，或许不用多问，透过那双眼睛，你就能知道他们和中国必定有着某种关联。

对，给汉学家画像，需要表达这种关联，需要丝丝入扣，需要超写实主义的精致。而现在回看，整个《纽带》这部片子，又何尝不是在“给汉学家画像”，只是它不是某个具体面庞的描摹，它是速写，是一个个汉学家所历中国事的速写，是一部群星璀璨的汉学研究史的速写，在苍茫的史料和现实故事间，撷取一二，然后要处着力！在这场速写中，或许我们还不是合格的画家，这个故事那么大，谁说我们一定抓住了重点呢？努力吧，青年！

云扎布

《纽带》第五集导演

小心翼翼

2013年春，我刚刚接手《纽带》日本一集的内容。那时，中日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一些紧张。我承认，我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不懂也不在乎，初生牛犊的我，兴高采烈地开始了联络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工作。

为《纽带》日本这一集做历史顾问的严绍璗教授，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国内研究日本中国学史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大概是最能辩证地分析日本汉学或中国学的。然而，即便是严教授这样专业的学者，至今也难以掌握谈及中日关系时的尺度。一方面，他常常会苦涩地和我笑谈道，作为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甚至中日文化，即使辩证地为日本说一句好话，都有可能被骂成汉奸。为此，近来年事已高的他，推掉了很多中日文化研究的项目。而另一方面，在听到一位中国学者在为近代以来的某位日本中国学家辩解的时候，他又会愤怒地指责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我看得出，他在与我这个青年导演评价日本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

我在查找日本近代以来的汉学家的资料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名叫吉川幸次郎的先生。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让我为之动容。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长子，吉川忠夫先生，也是位著名的汉学家，是日本东方学会的前任会长。在联络他之前，我是期待万分的。我期待能够与他聊聊吉川幸次郎先生，为什么这么热爱中国；期待能聊聊他本人，为什么子承父业也开始研究中国；期待他能在资料书籍里了解

到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一样，能够让我为之动容。我通过多方关系，联络了日本东方学会，联络了他曾任职的京都大学和东洋文库，终于与他通上了电话。然而，他却拒绝了我的采访。几个回合的电话交流，他总是以“时间不合适，最近比较忙”搪塞我。我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他沟通：改时间、改地点、付费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最终都没有成功。



▲《纽带》编导采访日本学者大木康

我听得出，他在与我这个中国记者交流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中国学者，小心翼翼的日本学者，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也开始小心翼翼起来。后来，在给各个日本机构发送拍摄申请的时候，我甚至一度不敢告诉他们，我们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来自一个属于中国国家级别的电视媒体，而只能以大学里的学术机构的名义去联络拍摄。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纽带》日本一集的拍摄与制作过程中，掺杂

着很多情绪，涵盖在不同的故事和人物里。就严教授而言，这位不辞辛劳的老先生，最让我钦佩与感动。不再列举很多其他的日本学者，亦是对我们彬彬有礼，在拍摄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而至今起笔，我很抱歉，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所有人的小心翼翼。我也为小心翼翼的自己而感到难过。

对于此时此刻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我只是在想，铭记历史，不是应该要我们在当下活得更美好吗？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如此小心翼翼地活着？

也许，做《纽带》的意义，正是想告诉我自己，也许唯有中日文化的不断交流与传承，才能让很久以后的我们的后代，不再活得如此地小心翼翼吧。

张萁

《纽带》第六集导演

拖延

制片通知要写导演手记，但我内心其实很抗拒。不想写是因为一直以来并不愿意接受《纽带》时候的自己。

2013年，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怀着对影视的巨大热情，却惊讶地发现一个学电影理论的人并不会写剧本。利玛窦、罗明坚、卫三畏、费正清……所有与汉学、中国学相关的人物和故事都静静地存在于各自的时间、空间里，要让这些人物、故事、线索穿越纷杂、浮出水面是如此艰难。他们探讨故事时在争辩，总导演改稿时也蹙着眉头，但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于是，怀着半分羞愧、半分坚持，开始从制片工作做起，做表格、写邮件、列采访对象、出采访提纲，到之后制订拍摄计划。走到今天，《纽带》快要收尾，回头看，发现做好这些所谓的琐碎也并不易。

花了两天为第七集《中国学，别开生面》采访嘉宾做一份表格，做完后却被制片指着鼻子骂：你这做的是什么？也抱怨过，但是边抱怨边调整，加粗、变化字体、标题居中，做完后拿着整齐、美观又毫无瑕疵的表格，突然心中充满对训斥的感激。三多堂是一个对细节要求到苛刻的公司，被指着骂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止一次，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高要求，正是因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细节完美的必要性，现在才会人人都习惯高标准。

还在读书时，学校常常也会有知名制片人来开讲座，但那些靠着每一次沟通掌握的经验，很难有人能凭借几次讲座就能说得清道得明。那些看似极其简单的环节，稍微协调不周都会为项目进度带来麻烦。整个

项目中，这样的挑战无处不在，突发状况常常发生。魏斐德，是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在和他的妻子梁禾女士联系好所有拍摄后，整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相关教师及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做好了拍摄准备，但是剧组人员却因为突发状况未能到达，凌晨5点被隔洋电话叫醒，听着梁禾老师略带焦急的话语，心里乱作一团——她一直以来的热心、中国研究中心的协助、每位采访嘉宾的配合……人生中第一次欲哭无泪的突发状况，万分歉意却无法解释。事实上，问题的环节只是因为沟通未畅达，衔接才不够顺利。连道歉都来不及细说，开始重新协调，好在之后一切顺利。

上川岛，是传教士沙勿略带着终身遗憾长眠的地方。2013年11月，摄制组一行四人开始了香港、澳门、广东的拍摄。早5点开始，工作到晚12点，是常有的事情，因为一路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一路欢笑并不觉得辛苦，何况到了上川岛后，我们的拍摄已经进入了尾声。回京后，就要准备12月北京的汉学研讨会拍摄了，这一次第七集《中国学，别开生面》中涉及的重要学者都会出席，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政惠老师，作为“美国中国学”的第一人，从第七集初稿开始朱老师就不断地给予意见，这一次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当面感谢他。照例像往常一样给他手机发了短信：“朱老师，12月我就回京了，期待和您北京见！”可是这一次，很久都没有得到回复。



▲《纽带》摄制组与汉学家费乐仁

当第二天带着疲倦回到宾馆时，打开手机，跳进来一条短信："朱政惠老师已经于11月13日去世。"那一晚上川岛的宾馆里，两个女编导哭了一夜。

写下上面这些话，也好像一次梳理，是两年来第一次梳理清楚，我以为的拖延，是一种对自己尚不满意的抗拒。但这一路我们也各自成长，承认不足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必须学会的技能，它也让我收获着与纪录片的情感交会。谢谢《纽带》，带我走进纪录片。

唐毓珉

《纽带》第七集导演

朋友圈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和《纽带》相关的外国人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在意大利的司机。他是都灵人，当时为了我们这单生意，特地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到罗马。他的意大利文名叫Francesco Davico，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发音完全不同、意思也毫无关联的中文名：怀暖莫。按他的理解，含义是：心怀温暖与冷漠。

为了不被“矫情死”，我们都叫他“莫莫”，和时下知名交友神器谐音。

一次，我们在罗马国家档案馆拍摄罗明坚的地图原稿，花了大约30分钟结束拍摄，出来的时候，莫莫已经和两个中国女游客加上了微信，聊得火热。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莫莫就是个“交友神器”。

摄影潘老师说，莫莫就是一个可爱的“小人”。一口流利的京腔，不会成语，却把中文的粗口学得很齐全，没有正经工作，整天就寻思着把家乡的各种东西卖给中国：家具、红酒、兔子皮。说起来，他对我们拍摄的内容还真没什么兴趣，但他是真的喜欢中国姑娘。

拍摄第四天，我们驱车前往距离罗马一百多公里的小镇，拍摄一个家庭陶瓷作坊。把我们送到后，他就消失了。等回来的时候，身边不出意料多了一个中国美女。她是莫莫在南京的时候认识的，现在正在佩鲁贾读研究生。佩鲁贾离我们所在的小镇不远，看起来，莫莫早就计划好了。

那天晚上，莫莫把她送回了佩鲁贾。但奇怪的是，两天以后，这个

美女竟然出现在了罗马。想必，莫莫是说了什么动人的话将她“骗”来了，那之后，我们就开始偷偷讨论，大致的内容就是他如何如何“勾搭”妹子，因为既有印象，甚至都会为妹子被这个“花花公子”欺骗而感到惋惜。

临走前一天，我们吃了一顿大餐，意大利人上菜慢，我们吃到很晚。越晚我就越担心，因为，我和莫莫一个房间，也许一会儿我会比较尴尬。但最后，事实证明都是我们“心术不正”：在接近凌晨的时候，莫莫把我们单独叫出来，说坚持要开三个小时的车把美女送回佩鲁贾，油费自付；还有刚才的餐费，女生的那份他出，算是他请的。

后来才知道，这位美女是莫莫的前女友。因为异国的关系，他们最终没有在一起，得知她来意大利学习，莫莫始终没有勇气见她。当看到我们的行程上有离佩鲁贾接近的城市，他毫不犹豫地接了活，因为这样也许就有机会见她，哪怕只有一面。莫莫害怕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了。

第二个人叫Marie Anne，最后一次和她见面是在2014年秋天，她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咖啡馆办了一场读书会，读书会读的书是她外公高罗佩写的《大唐狄公案》。



▲《纽带》摄制组与高罗佩家人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所有关于高罗佩的资料、采访嘉宾的信息等，都是她提供的。当我们在荷兰的时候，她还将她的两个舅舅和妈妈难得地聚在一起接受我们的采访。

Marie Anne从没见过外公，所有关于外公的事，都是妈妈告诉她的，事实上，高罗佩当时即使在家里，也没有与孩子过多地交流。现在，高罗佩的4个孩子，除了大儿子仍然在莱顿大学工作外（研究的是日本艺术史），其他人都在做着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工作，但这个30岁出头的外孙女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外公：办高罗佩展览、为徐克的电影提供帮助，还与重庆的古琴社合作还原了高罗佩当时的办公室。

每天一刷朋友圈，都能看到Marie Anne在各种奔波的同时，中文也越来越好，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高若兰”；我也能看到莫莫现在把

红酒卖得越来越火，时不时地还有他日渐纯熟的中文“吐槽”水平。

看他们的朋友圈的时候，我也有疑惑，这俩人如此痴迷中国是为什么？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许只是因为身上流淌着1/4的中国血液，或者心里有个忘不了的南方姑娘。

其实《纽带》也没那么玄乎，汉学也没那么难懂，汉学家们的初衷和动机也许和莫莫、Marie Anne没什么两样。当然这两个故事，在《纽带》里是看不到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写出来，这是我能看到的活生生的纽带。

程方正

《纽带》第八集导演

我认识的“理雅各”

我对英国一直以来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许是我曾在那里求学三年的缘故吧。2013年，纪录片《纽带》的拍摄，让我再一次踏上了大不列颠，这个令我神往已久的国度。

出国留学和出国工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前者是抱着学习他者的心态，谦虚谨慎；后者自然也是谦虚谨慎，但莫名有了些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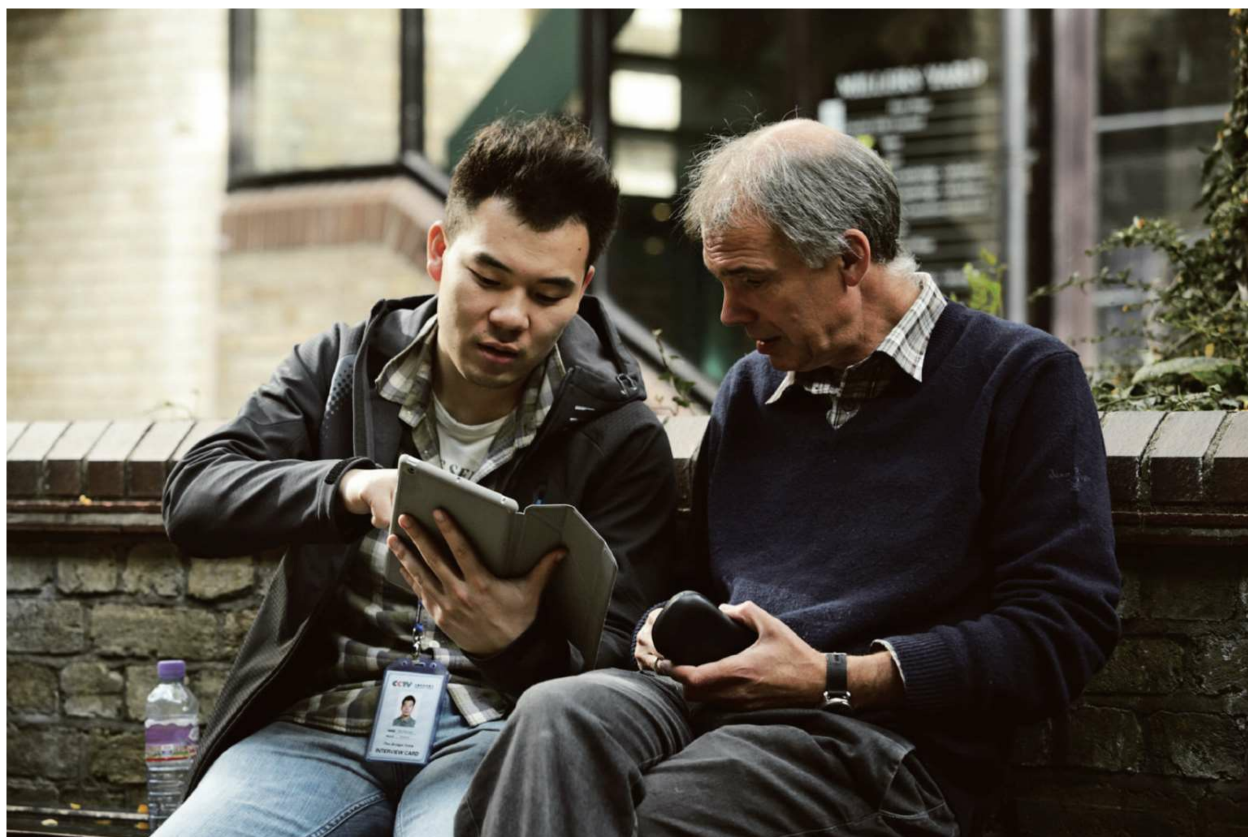
《纽带》是一部有关汉学的纪录片，在此之前，我对汉学了解甚少，英国汉学也只是听说过李约瑟先生的事迹。半年的脚本创作，让我对英国汉学这个庞大的汉学体系其中的一支，有了全新的认识。马礼逊、理雅各、翟理斯等英国汉学家同李约瑟先生一样有着丰富而精彩的人生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英国汉学的巅峰时代在19世纪，如何才能把这些已故英国汉学家们拍“活”呢？

在写稿时，我经常报名参加在北京的大小汉学会议，让自己多受些汉学思想的熏陶。有一次，在北京郊区，我有幸结识了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主任费乐仁教授，茶余饭后，得知费乐仁教授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后人关系甚好，经常有来往，于是便委托费老师联系理雅各后人的采访拍摄，结果是令人欣喜的，对方很欢迎我们到他伦敦的家中做客。

写到这里，我的职业病就犯了，必须多“废话”几句，给大家补充下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历史背景知识。首先他是一名“传教士”，鸦片战争后在香港传教并开办英华书院，在中国生活20多年，用了前后25年翻译

《中国经典》，并因此获得首个法兰西文学院的“儒莲奖”，回国后定居牛津，受聘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纽带》编导采访方德万

接受采访的是理雅各的重孙克里斯托弗·理雅各，是一位非常幽默的英国绅士，50多岁的样子，一进门他便面带笑容用一口地道伦敦腔说道：“你们好，我是你们拍摄主人公理雅各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欢迎你们。”说罢，便指了指楼道墙上挂着的理雅各画像，又指了指自己，我们不得不佩服基因的微妙。由于克里斯托弗的健谈和幽默，采访在轻松愉快中完成了，随后的纪实拍摄也正因他是理雅各后人的身份变得妙不可言。

傍晚的时候，拍摄结束了，他送我们到门口，车子刚要发动，他走向前来，我摇下车窗，他看着我，脸上没了笑容：“我想你们可能想去

拜访我曾爷爷，他就在牛津城北的沃夫寇特公墓，住在那儿有些年头了。”说完他便挥手作别，我却被他认真的表情和诙谐的话语弄得哭笑不得。

数天后，早早结束了在牛津大学的拍摄，路边小店买了一捧康乃馨，准备去拜访理雅各先生。我平日有个癖好，喜欢在名人的墓前静静地待上一会儿，国内外墓地去了不下百十个。驻足墓前，四周的宁谧将时间静止了，刹那间有种与先人神聊的快感。

从牛津城北上，驱车十里，穿过一个小镇便来到了理雅各先生的“住处”。这里环境幽静，密密麻麻的墓碑矗立在爬满的青苔小路旁。没走两步，一座非常朴素的墓碑旁堆满了鲜花和零零散散几本《霍比特人》小说，诧异之余便扫了一眼墓碑上的名字，Tolkien。当时我就联想到英国著名小说家J·R·R·托尔金，更何况他正是在牛津大学教书啊，连忙凑上前去仔细看了看，果然是J·R·R.，这么一位英国奇幻小说泰斗竟然这么“朴素”地埋葬在这里。

我走到理雅各先生的墓前，墓碑是用先生家乡的阿伯丁花岗岩做成的，碑文中短短几行字努力地诉说着先生的生平。

我把那一捧康乃馨放在墓碑旁，深深地鞠了一躬。

魏慕轩
《纽带》第八集导演

后记

编筐

——关于《纽带》的纠结

《纽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一拿到《纽带》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曾建议，你就挑什么有意思往里面放什么。反正“纽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但纠结的是：真这样做了，反倒却无从下手。

关于汉学或中国学，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很少有过铺垫或知识普及，如果随意挑一些感兴趣的内容、猎奇的知识、另类的人物来排列组合，也不是不能做，甚至可能会有好的收视率。但我总觉得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拍出来的片子对未来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于是，我们放弃了那个取巧的办法，最终选择了一个最累，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做法——直面汉学或中国学的前世今生、起承转合。

累，首先累在“编筐”。汉学或中国学虽然从来不是什么显学，但却是学问中的学问，既深奥又琐碎。起起落落四百多年了，人物一大堆，涉及的学科也数不胜数。如何界定？如何分集？没有现成的资料与模式可资借鉴。

其次，表现也不容易。汉学（中国学）毕竟是一门“高冷”的学问，在这样一个碎片化、娱乐化的时代，要把汉学（中国学）影像化，存在很大障碍。因为想纪录片好看，就得会讲故事；而要讲故事，就得用较

少的人物来串联。有故事的人物不见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物也许没故事。况且，价值如何衡量，也还是个大问题。

前前后后，我们见了很多专家。每位专家都掌握着无数的故事、海量的人物，都是不可或缺，意义非凡。每一位专家，又都是那样地固执与坚持，让你在选择素材时，既为之敬佩又十分头痛。

其实，这也是这些年每做一部新片子，我们都会面临的困惑。不想走常规路，往往就意味着无路可走，你必须自己蹚出一条新路来。

记得多年前拍《大国崛起》的时候，摄制组同中国社科院的秦海波老师从西班牙到葡萄牙走了一路，也吵了一路。不过，到今天，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因为所有的争吵都是为了成就一部好片子，否则，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

杨煦生老师、孟华老师、耿升老师、张西平老师、许明龙老师、严绍璗老师、李明滨老师、陈开科老师……我的脑子总是会想起他们提出建议时候的语重心长与言辞恳切，又或是谈到令人激动的汉学故事的那份兴高采烈，当然，也有我潜意识里与他们的思想碰撞。

大家内心都有一个“筐”，可汇聚在我们这里，就是一团乱麻。怎样把一个个完整的“筐”撕裂，拧成绳子，再重新编一个大“筐”。这需要我们说服掌握学问的专家们，其实更需要说服我们这些手艺人。

来来往往中，成型的“筐”前后编了三个。当前两个被依次否定的时候，第三个“筐”，我们已经很坚定。它既不是按照人物的重要性来分类，也不是按照汉学或中国学的学科设置来界定，而是走了一条用大历史的脉络与国别相结合的分集方式。这大概是只有我们这些外行，才敢处理的方式了。

当一个个人物陆续在“筐”里就位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片

子。接下来，该让这个“筐”接受专家们的审阅了。一切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大家首先表示的是抗拒和批评，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尽力去丰富、完善、美化着这个“筐”。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又是一轮人物和故事的取舍。原本我们设定的容量是九集，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但因为种种原因，只能又压缩至八集。这对于四百年来汉学或中国学体系的完整展示，多少有一点伤害。我们，也只能尽力弥补了……

最初片子立项的时候，史岩和石世伦想象的是在描绘汉学的同时，尽可能涵盖几个大的文明体。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想法。一方面，能透过汉学或中国学，展示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可视的角度考虑，多些不同的国家，画面质感会更强、更丰富。

但遗憾的是，像阿拉伯地区、印度，汉学或中国学的研究还影响甚微，数得上的专家也少有。而且，以目前八集的篇幅勾勒汉学或中国学的全貌，笔墨已然是不能再精简了。遗憾，也只能留给未来去弥补了！

做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老想起一个词——国际主义。这些汉学家也好、中国学家也好，最初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出于兴趣，都超越了眼前的功利。当然，他们的学问，无疑丰富了他们母国当下的知识体系，但如果放到一个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去考量，这对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反哺。尤其是走到今天，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是人类文化基因库的标本。

有时候想想，文化还真是“闲”出来的。无目的，就是最大的目的。一晃，《纽带》的拍摄持续了两年多，甘苦自知。在编“筐”的过程中，无数的人给了我们帮助，你们的心血，观众自然会看到。这个“筐”编完了，这一段生命的体验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纽带》这部片子，究竟有没有艺术价值？算不算艺术品？我们这些手艺人说了不算，还得观众来评价。

相信《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的出版，会让纪录片《纽带》以图文的形式继续传播、传承下去，感谢每一位专家对《纽带》提供的学术支持和投入的巨大热情，感谢每一位关注这部片子并提出诚恳意见的观众，感谢《纽带》创作团队每一位辛勤付出的成员，也感谢为本书出版付出极大努力的编辑、策划人员！只要读者能从本书中了解或感受到哪怕一点点打动心灵的东西，都是对我们这些手艺人工作的认可，都是我们走下去的动力。

刘军卫
纪录片《纽带》总编导

纪录片《纽带》主创名单

总编导：

刘军卫

编导组：

孟妍 高雪崧 任志勋 屈楚 朱允 云扎布 张萁 王雪巍 唐毓珉 程方正 魏慕轩

学术顾问：

张西平 孟华 许明龙 耿昇 李明滨 严绍璗 杨煦生

历史脚本：

张西平 杨慧玲 顾钧 管永前 罗莹 刘美华 宗平